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RICHARD B. 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	3
《不断革命论》	6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10
二、孤立与劳工动员	16
革命纪律的必要性	16
以劳动力替代资本	20
第九次党代会	26
交通运输业的危机	32
孤立主义在托洛茨基思想中的重要性	41
三、融合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44
用资本取代劳力	44
资本主义衰落的周期性理论	52
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冲突	56
四、寻找新的信条	62
热那亚会议后的再评估	62
保护主义与计划	66
第十二次党代会	73
销售危机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79
英国贷款谈判	83
从不断革命论到一国社会主义	89
五、一国社会主义	96
三驾马车的分裂	97
托洛茨基对政斗派别的评价	103
斯大林-索科利尼科夫的争论	110
六、托洛茨基的替代方案	116
从帝国主义理论到融合主义	117
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战略	125
托洛茨基的融合主义评估	137
七、托洛茨基对“一国孤立”社会主义的攻击	142
1926年的进攻与反攻	142
第十五次党代会	150
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上诉	154
分裂与失败	160
八、失败与流放中的融合主义	167
评估斯大林的“左倾路线”	168
对苏联实验的最终判断	174

#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

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列昂·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与两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断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被描绘成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拒绝斯大林关于一个孤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在双重意义上“不断”。在国内，它涉及从沙皇的封建君主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中间没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在国际上，它应伴随着欧洲各地的一系列政治剧变，最终形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

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伊彻的说法，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源于他认为，除非革命冲破俄国的国界，否则它将陷入死胡同。俄国太落后，经济不发达，无法仅凭自身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总结不断革命理论时，多伊彻解释道，“俄国的工业贫困和落后……将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构成巨大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帮助下，这些障碍才能被打破和清除。”乔治·利希特海姆也同意，他声称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只能发出信号；完成主要任务的是欧洲”。罗伯特·V.丹尼尔斯在同一语境下写道，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无法在俄国单独维持。为了巩固政权，必须获得社会主义欧洲的工业资源。

尽管历史学家们观点一致，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仍然存在问题。斯大林于1924年底首次阐述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托洛茨基没有在1926年末之前做出回应，几乎两年后。在此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的前同事，大声挑战了这一新理论所声称的列宁主义正统性。托洛茨基没有公开表示他有同样的疑虑。事实上，他最初的倾向是支持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的反党派。这种明显的漠不关心，如何与托洛茨基自己观点中看似毫无含糊之处相调和？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支持斯大林的批评者，直到他们被击败之后？最

后，在没有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政治联盟的情况下，是什么说服了他，让他相信最终能够提供一个比仅仅希望国际革命更可行的政策？

亚历克·诺夫最近提出，托洛茨基的困惑可以追溯到强制农业集体化问题。集体农庄的目的是从农村经济中提取必要的资源，以维持一个快速工业化计划。托洛茨基对工业扩张的热情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将依赖于俄国在近期内不可能实现的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因此，根据诺夫的假设，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工业增长可以通过更先进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权提供的投资资本来资助。

诺夫提议的优点在于它强调了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普遍的理论设想。但它也指出了另一个不协调之处。尽管托洛茨基似乎排除了在国际革命之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却是稳步增加工业投资的最强力倡导者。这个事实引出了两种结论之一：要么托洛茨基的立场本身就是不一致的，要么历史学家们因为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而未能解释他的立场。

本书的目的是证明后者是事实。对托洛茨基来说，起作用的问题不是俄国能否在国际革命之前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如何制定一个最佳的规划策略，同时考虑到现有的和未来的劳工经济政策。迄今为止，对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国际分工的观点尚未进行详细研究，也没有将其与俄国与资本主义欧洲隔离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关联。当这样做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实际上有两个时期，隔离问题具有关键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第一个时期是 1920 年和 1921 年初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国际革命可能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不可避免。通过比较两个或多或少连贯的政党发言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在试图界定俄国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角色时，出现了两种观点。尽管这两种立场的支持者在细节问题上有所分歧；但出于分析目的，他们可以被归为两大

类：“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和“融合主义者”（integrationist）。顾名思义，孤立主义者倾向于将苏维埃俄国视为世界经济的流放者；相反，融合主义者则认为，尽管俄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秩序，但该国必须以某种方式恢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原有地位。

如果托洛茨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行为与通常对不断革命理论的解释一致，他就会属于融合主义者范畴。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他会赞同一种普遍观点，即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取国外的经济援助，包括恢复国际贸易，甚至是来自资本主义欧洲的外国投资。但证据显示，他实际上成为了经济孤立主义的中心理论家。他认识到欧洲革命最多只是被推迟，但他仍然在战时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一个旨在直接过渡到一国社会主义的连贯政策体系。1920-1921 年与列宁进行的关于托洛茨基的孤立主义信仰所导致的特殊劳工政策问题的历史性辩论，作为对俄国在整个世界中的角色存在不同假设的彻底表现，这场分歧实际上构成了对后来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隐性讨论。因此，对苏联历史早期阶段的仔细研究为解释后来与斯大林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围绕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争议，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争议非常相似。但在这一时期，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 1925 年，托洛茨基完全转变了立场，成为融合主义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列宁去世后掌握党权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则越来越多地将工业化与经济上脱离西方等同起来。因此，为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失败和流亡的辩论埋下了伏笔。

这种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它们表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吵与经常被提及的不断革命理论只有非常切题的联系，即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等到国际革命发生之后。此外，托洛茨基并未坚持认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等到国际革命发生之后。他尤

其没有预言，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变革，俄国就必然会停滞不前。相反，就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融合主义者一样，他呼吁与西方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和最大限度的外国投资。

他反对的，与其说是“一国社会主义”（Sotsializm v Odnnoi Strane）的概念，不如说是斯大林的“一个孤立国家中的社会主义”（Sotsializm v Otdel'noi Strane）概念。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将导致一个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封闭、孤立的经济；这种策略将是灾难的根源。他政治行为中那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不一致性，正是源于这些在经济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更仔细地审视不断革命理论的真正重要性，将有助于解释这种解释的背景。

## 《不断革命论》

最早对这一理论进行完整阐述的，是托洛茨基在 1905-1906 年撰写的一篇题为《总结与前瞻》（Results and Prospects）的文章。俄国是欧洲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该文提出，正因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始于俄国而非西方的工业化国家。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将封建专制制度替换为更民主的政府形式，这一阶段将会是短暂的。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后，事件的势头将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由于马克思本人曾在 1848 年预见德国类似的发展进程，这一预测并非完全异端。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所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各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度”。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俄国的落后似乎排除了它能进行一场更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大多数作者都对此立场有所保留，为欧洲可能同时发生政治动荡留有余地）。

托洛茨基认为，这种对抽象发展水平所谓的科学关注等同于“无望的形式主义”。诚然，马克思一直坚持工业增长与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但他无意让其“历史相对的”言论被转化为“超历史的公理”。俄国的历史是独特的，不能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工业是由外国投资引入俄国的；欧洲资本用最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为俄国提供了

资金，使得俄国跳过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外国投资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欧洲投资者既没有意愿也没有机会在俄国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因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比在其他国家要弱得多。同时，由于其不自然的高度集中，俄国工业很容易被罢工瘫痪。无产阶级的力量比其数量所显示的要大，并且肯定比同时期的德国或英国的无产阶级更强大。基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试图在经济中工业的统计比重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建立机械联系，是一种被简化到荒谬的“经济”唯物主义偏见。

在一个题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The Prerequisites of Socialism) 的章节中，他阐述了这些观点，并与历史学家 N.A. 罗日科夫 (N.A. Rozhkov) 展开了论战。罗日科夫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以下条件具备时才能被视为“成熟”：(1) 大规模生产必须几乎完全主导经济的所有部门；(2) 主要工业企业必须以合作社为基础进行组织；(3) 绝大多数人口必须是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在评论这种对传统方法的僵化诠释时，将罗日科夫与 1848 年的马克思进行了比较，他评论道：“很显然，同当代许多永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机械人相比，1848 年的马克思可以说是个愤青幻想家！”

据说罗日科夫背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因是他未能认识到上述过程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相互制约和限制。在他认为这些过程达到其数学极限之前，它们会经历一次质的变化，“并在其复杂的组合中，带来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罗日科夫不必要地夸大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而托洛茨基试图将其重新平衡。首先，他声称，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更具生产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其次，必须存在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然而，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补充道，“试图提前界定在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占总人口的多少比例，是一项徒劳的任务”。最后，他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其政治专政。在俄国，只有这第三个先决条件是缺乏的。

只需提及这些高度形式化和政治化的条件，便能看出它们简单表象下的欺骗性。在证明工人政府是可行的之前，托洛茨基必须否定任何强调俄国经济不发达所造成障碍的分析。他没有预期向新社会的过渡会瞬间发生；事实上，他预料到国有化只会从大型企业开始，之后会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持续下去。社会主义不会通过几项法令就被引入。尽管如此，他预测这场革命“将会比其遭遇这个国家的技术障碍更早地遇到政治上的落后”。

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主要威胁在于，一个由数量上占优势的阶级组成敌对联盟的危险。旨在保护农村无产阶级的措施可能会使绝大多数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与工人政府发生冲突。同样，资本家们预计会通过停工来应对，从而伴随可笑的失业率提出关于立法和八小时工作日的抗议。这些担忧反过来又引出了著名的结论：俄国革命必须是国际性的，它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如果俄国工人阶级仅凭自身的力量，那么一旦农民背弃它，它就必然会被反革命所粉碎。它将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政治统治的命运，以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

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资本提供资金这一事实，似乎可以保证革命不会仅仅局限于俄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会立即否认沙皇政府的债务，并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这些政策对俄国的债权人，尤其是法国，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破产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将直接在法国以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形式重演，而这场危机只能以政权移交到无产阶级手中而告终”。如果奥地利和德国的君主制试图镇压无产阶级的俄国以阻止革命蔓延，那么威廉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也会给自己带来一场来自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无论如何，欧洲的革命进程将突然被传导到欧洲主要国家。有了来自国外的无产阶级军事和政治支持，反革命的危险将被避

免；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得以巩固；而托洛茨基对于看似过早夺取政权这一大胆计划也将得到证实。有许多参考文献可以证明，在 1917 年之前，如同在 1906 年一样，托洛茨基曾多次谈到需要来自西方工人的直接国家支持。但在《总结与前瞻》中，外部支持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因素，旨在弥补俄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劣势。

“不断革命论”因此在两个方面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经济辩论无关。首先，它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夺取和维持，而非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其次，它旨在证明国际革命的必然性。强调技术落后的问题会是自相矛盾的；提出“一国社会主义”不可能的观点，在逻辑上是多余的。托洛茨基两者都没有做。他论证了俄国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而来自西方的无产阶级援助将消除反革命的危险，仅此而已。

然而，在 1930 年被流放后，他声称自己早已预见斯大林的“错误”，并且不相信如果没有一场国际革命，俄国就已经为社会主义“成熟”了。在他为《不断革命论》一书所作的导言中，他以以下对话的形式重写了 1917 年前的历史：

“但是，你们真的相信，”斯大林、李可夫以及所有其他的莫洛托夫们在 1905 年至 1917 年间几十次反对道，“俄国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吗？”对此我总是回答：

“不，我不相信。但是，整个世界经济，首先是欧洲经济，已经完全成熟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以及以何种速度、通过何种阶段实现，将取决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

从《总结与前瞻》曾预测工人政府需要依靠外部支持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说，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微弱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这都是为了进行反斯大林主义宣传而进行的篡改。

尽管其意图被误解，但托洛茨基最早的理论著作确实包含了后来他与斯大林争吵的重要元素。文章将俄国描述为被经济上更强大的敌人包围，必须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

要么屈服，要么“在经济关系的发展上超越它们，吸收比……[这个国家]在孤立状态下所能吸收的更多的生命力”。工业保护主义和鼓励外国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为的刺激，证明了历史不一定盲目地按照客观规律通过预定阶段前进。沙皇时期的财政大臣们已经表明，“国家……是组织、瓦解和重组社会关系的巨大手段”。托洛茨基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将遵循同样历史模式的印象，他写道，一个工人政府将“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也依靠整个世界的‘技术’”。如果“tekhnika”被翻译为“技术”，那么其含义就是俄国将继续进口“技术诀窍”和技术设备。当他最终意识到国际贸易应被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时，托洛茨基因经济孤立政策而与斯大林产生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总结与前瞻》暗示了追求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不合理的。但托洛茨基声称这篇文章排除了在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在试图制造一个政治神话。

这个神话之所以盛行，主要责任在于斯大林。通过认同托洛茨基曾无耻地、始终拒绝“一国社会主义”理念的虚构说法，斯大林意图证明他这位失败的对手从未停止过做一个胆怯的孟什维克，一个对俄国自身能力没有信心的革命骗子。由此产生的混乱，在几代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苏联官方文人笔下一直延续至今。在“不断革命论”的阴影下，托洛茨基的其他早期著作被忽视了。在本文所研究的两个主要时期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

##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在试图确定俄国与欧洲的关系时，布尔什维克通常首先会努力预测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俄国潜在的谈判实力，以及从各种形式的让步中可能获得的好处，被认为反映了敌对阵营可能面临的命运。在托洛茨基的例子中，《总结与前瞻》暗示俄国可能会从外国设备进口中受益。帝国主义理论则提供了分析的另一半，它表明了欧洲可能愿意或能够继续

供应所需产品的程度。在这方面，它有助于回答新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准备考虑哪些让步的问题。

对托洛茨基思想这一方面影响最大的人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伊斯雷尔·赫尔芬德 (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即帕尔乌斯 (Parvus)), 托洛茨基在 1905 年曾与他关系密切。在本世纪初的修正主义争论中, 帕尔乌斯曾为马克思的十年经济周期理论辩护, 以反驳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的批评。伯恩斯坦提出的该理论不再切合实际的观点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因为他忽略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帕尔乌斯的说法, 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 危机已经呈现出世界性的规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周期性动荡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化生产制度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 资本主义无法为其所创造的商品总量提供市场。这种长期供过于求的趋势导致了国际贸易的惊人增长, 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人为的政治壁垒, 并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通过支付低工资, 从而缩小市场, 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强国, 肆无忌惮地参与对海外需求来源的征服。正如帕尔乌斯所观察到的, 资本家们“开始将彼此挤出市场, 而当缺乏其他手段时, 他们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世界大战”。

尽管他与帕尔乌斯的关系密切, 但直到 1907 年离开俄国定居维也纳后, 托洛茨基才完全意识到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关系。1909 年 1 月, 他被巴尔干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所震惊, 写道除非建立一个类似于瑞士或美国的联邦, 否则“强大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就无法得到保障。这项提议是对帕尔乌斯早先提出的“欧洲合众国”呼吁的一种变体。后来, 在 1910 年夏天, 索非亚泛斯拉夫大会的失败促使托洛茨基写道, 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是“摆脱民族国家混乱和巴尔干地区血腥纷争的唯一出路”。

帕尔乌斯发现的最终证实似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战国无法为其全部国民产品找到市场。此后，他所有关于帝国主义主题的评论都始于这样一个观点：国际贸易已经使得民族国家在经济和历史上变得多余。垄断的兴起、工业的卡特尔化、国际金融联合体的出现、资本输出的迅速扩张：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特征，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和有效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衡相比，都被降到了次要位置。

1914年10月31日，托洛茨基明确地将战争归因于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的局限性；随着世界经济的出现，国家不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舞台”而存在。因为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定义，都被驱使进入对市场的强制性竞争，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世界经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未来发展，将意味着一场对同一世界表面作为资本主义剥削对象的永不停歇的、新的划分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诉诸武力最终是徒劳的。战争可能会扩大个别国家可用的市场；但对拯救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却无能为力。此外，殖民地工业化将迅速加剧危机。在一篇题为《民族与经济》(The Nation and the Economy)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将这一论点总结如下：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被局限在国家内部，后者通过兼并和殖民附属地来补充……对殖民地的竞争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生产力最终在国家界限内变得局促……封闭的民族国家的位置，必须被一个由主要国家组成的广泛的民主联邦所取代，并废除所有关税划分”。

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将扩大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并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经济发展中一种进步趋势的资本主义-盗窃式表达；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人类经济的趋势，它将人类从民族和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15年2月，托洛茨基敦促：

“对欧洲进行民主统一，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是无产阶级解决当代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组织局限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唯一政治形式。”

欧洲所有国家都已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并且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推测，它们都将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暂时局限革命的可能性不大，而他最主要的担忧仍然是社会主义会被武力镇压。早在1917年6月，在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三个月后，他重印了一篇他早先撰写的文章，其中他曾表示革命只有在全欧洲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并取得胜利。“如果孤立民族边界内，它将注定要失败。”他认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国主义对俄国工人的威胁不亚于德国军队。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失败了，帝国主义理论表明，俄国将被转化为一个或几个战胜国的殖民地。

正是这种对彻底殖民化日益增长的恐惧，解释了托洛茨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主义。《总结与前瞻》展示了贸易和外国投资具有促进增长的性质；而帝国主义理论则宣告了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消亡。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暗示，在一个单一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将构成一种历史倒退。困难在于，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贸易和资本进口可能促进增长；然而，现在它们也被视为帝国主义剥削的主要工具。资本主义国家间持续存在的对抗表明，无论如何，欧洲都无法满足俄国的经济需求。如果没有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注定将在一种“永久战争”状态中衰落；这个大陆将变成一个坟场。如果帝国主义地狱的噩梦导致工人阶级受到长期镇压，西方的文明将注定衰败、堕落，走向一种新的野蛮主义。在他们自我毁灭之前，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者可能会暂时搁置分歧，组成统一战线，并消灭社会主义俄国。与西方的接触将意味着社会主义独立的终结。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比托洛茨基的更具体、更务实、更具经验性。当托洛茨基专注于战前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时，列宁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其相似性更值得

注意。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其增长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企业、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和不规则是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的问题使得列宁不愿意将俄国革命的未来建立在即时国际解决方案的前景上。他得出结论，尽管他也曾使用过这一口号，但托洛茨基对“欧洲合众国”的呼吁可能会产生与其初衷相反的效果。通过将眼前目标设定得过高，它可能会削弱革命热情。革命以一种更蹒跚的方式前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可能仅限于一个国家。用列宁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的胜利首先在几个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实现是可能的。”

列宁思考当下和不远的未来；托洛茨基则关注于分析整个历史时代。托洛茨基并没有争辩说欧洲各国会在完全同一时刻经历革命。但他坚信欧洲资本主义已经为建立一个将涵盖整个大陆的社会主义秩序铺平了道路。他回应列宁时争辩说，“不平衡”的问题将证明只是短暂的重要性：

“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这种不平衡本身是极其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并不相同。但与非洲和亚洲相比，所有这些国家都代表了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资本主义‘欧洲’。”

何时以及如何发生革命这一具体问题，至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地自行解决。然而，列宁对帝国主义更深入的分析中蕴含着进一步冲突的根源。列宁的结论暗示与托洛茨基的结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它们允许有限的资本主义复苏。一些帝国主义强国可能会从战争中受益。已经存在的不平衡可能会加剧和重新安排，从而导致一个比托洛茨基所预期的更长的战后不稳定均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理论表明俄国可以通过恢复与战胜国的经济往来而获益。贸易将是这种关系显而易见的形式。但列宁也比托洛茨基更看重帝国主义对资本输出的依赖性。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与商品出口不同，资本输出获得

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可以预料，战胜国将继续进行海外投资，以维持高利润率并获取廉价的原材料进口。从列宁的立场来看，用俄国的自然资源换取资本和设备是完全合理的。当托洛茨基最终开始不同意这些推论时，他与列宁的分裂迫在眉睫。

这种分裂根植于托洛茨基对欧洲不确定的看法。西方是援助的来源还是致命的敌人？

《总结与前瞻》和帝国主义理论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答案；历史洞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冲突。这种矛盾直到 1925 年才得到完全解决，当时帝国主义理论发生了一种转变，受到国外革命失败和资本主义复苏证据的刺激，使得托洛茨基得以完成从孤立主义到融合主义的转变，并从民族国家的不足角度来看待俄国自身的经济。到那时，他的政治敌人已经达到了彻底的孤立主义立场。在考察这些平行的转变时，接下来的章节将集中讨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对布尔什维克试图将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可行经济政策基础的探索，将使重新评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可能。

## 二、孤立与劳工动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俄国遭受了几乎完全的经济封锁。德国军队切断了与欧洲的直接联系，只剩下太平洋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白海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两个偏远的港口，作为与协约国联系的据点。由于对敌对行动准备不足，政府未能阻止经济的持续恶化。对军事运输前所未有的需求导致了频繁的故障；到 1916 年，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稀缺使得运输常常无法进行。运往农村的消费品减少，与此同时，运往城市的粮食也日益减少。饥饿暴动和工业罢工随之而来。1917 年 3 月，君主制被临时政府取代，这加剧了瘫痪。

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对国际无产阶级，以及对他们在需要时制定成功政策的能力，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心。这场革命始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社会主义将以某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自发产生。但革命很快就从无政府主义的狂欢，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经济统制时期。内战带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想与经济必要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种组织模式出现了，它在许多方面为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五年计划提供了原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系统的主要设计者是托洛茨基。

### 革命纪律的必要性

党领导人最初的天真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为新秩序的建立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在革命前夕的几个里，列宁曾勾勒出一些有限的提议，但这些只是粗略的建议，绝不是为了构成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列宁设想的可能性包括银行的合并，也许还有国有化；将现有的工业辛迪加国有化；强制性地较大的独立企业辛迪加化；以及强制性地人口组织成消费者协会。土地问题，作为革命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通过简单地采纳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来解决；也就是说，事后接受了无法逆转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结果。

新政府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归咎于党自身的宣传。在 1917 年 8 月，列宁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曾宣称，一个现代国家和经济的运作，包含着“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轻松完成的登记、归档和检查”等简单任务。“我们自己，”列宁写道，“工人，将组织大规模生产。”因此，工人们夺取了企业，相信“工人掌握”这个流行口号意味着工人所有。独立的工业领地激增，而生产却持续受损。

直到 1918 年春天，列宁才接受工业普遍国有化的必要性。相反，他曾期待一个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将这个体系大致等同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工厂主和他们的员工将继续掌控生产，但要遵守一些一般性规定，比如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厂委员会和政委对账目的监督。最终的行政权力将归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esenkha），一个于 1917 年 12 月成立的笨拙的机构。当与著名实业家的谈判破裂，列宁确信责任不能与私人资本共享时，在 1918 年 6 月 28 日，几乎所有工业才终于被国有化。然而，至少有个主要原因完全是非经济的。那就是通过正式的国有化法案，可以防止俄罗斯财产的合法所有权落入德国公民手中，后者的权利即将通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补充议定书得到保障。

在这段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正忙于和平谈判。1918 年 3 月，他被任命为战争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继承了一个危急的局面。7 月，当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试图推翻布尔什维克时，政府的防御仅依赖于一个步枪分队。在西伯利亚，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战俘问题形成的反革命核心已经开始行动。恢复军队纪律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托洛茨基召集了前沙皇时期的军官，为组建红军提供组织指导。

托洛茨基对经济政策的看法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军事兴趣。1918 年 3 月，他警告说，无政府状态是对革命生存的最大单一威胁。他呼吁工作、纪律和秩序，并敦促道：“在政

治、革命和军事意义上，苏维埃政权并未失败——但它可能因其无力处理创造性的组织任务而摔倒。”与他在军队中的实验相一致，他提议，必要时可强制征募资产阶级专家来恢复和维持工业运作。工厂委员会和经选举产生的管理会议机构必须被合格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取代。革命不应犹豫，必须征用已投资于熟练资产阶级人员的“人民的国家资本”。工人们必须将自己视为士兵，记住他们的劳动义务和荣誉。如果其他手段都失败了，就应设立劳工法庭来惩戒玩忽职守的无产者。他以一种适合军事指挥官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完美运作的官僚机构的愿景：

“现在我们必须像优秀的会计师一样，做到精确和节约。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我们拥有什么财产、多少原材料和粮食、什么生产资料、什么劳动力，以及他们的技能到底是什么。所有这些都必须像钢琴的琴键一样被安排好，这样每一个经济工具都能正常运作……例如，如果必要，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可以将一定数量的金属工人从一个地方调遣到另一个地方。”

托洛茨基演讲中纪律主义的基调，与 1918 年集体决策和其他形式的激进民主普遍退潮相吻合。列宁开始强调工业中需要一人管理，以及更高效的会计和控制技术。尽管包括布哈林、拉狄克、奥辛斯基、斯米尔诺夫等一些自称左翼共产主义者的人提出抗议，认为试图通过这种反动方法恢复劳动纪律会疏远工人，但“群众掌握”的概念很快就声名扫地。年初，官方工会吸纳并限制了工厂委员会。为了阻止工会发展自己的独立观念，列宁宣称：

“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宣告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必须国家化；它们必须与国家机构融合。”但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列宁看到了避免过度冒犯有组织工人的必要性。1919 年春天通过的新党纲规定：“工会必须将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权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个自相矛盾的让步仅仅是一种形式。到 1919 年底，在饥荒和内战中，《国家与革命》中有关准工

团主义的区分几乎被党领导人遗忘。然而，平等主义的先例已经建立，当更大程度的正常化愿景回归的时候，这些先例又将重新显现。

党在劳工战线上的初步成功，并没有减轻外部威胁感。早在 1918 年 4 月，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俄国生存的看法，与他在革命前所表达的几乎没有变化。他怀疑如果资本主义留在西方，就会出现一种和平，“比布列斯特所达成的和平糟糕十倍”：

“俄国革命无法长期与帝国主义并存。目前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正在与英法进行血腥的诉讼。日本正在与美国竞争，……它的手被束缚了。这就是我们能生存下来的原因。一旦掠夺者们达成和平，他们都会转而攻击我们……那时我们就完了。”

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形成没有等待敌对行动的结束。到 1918 年 8 月，不仅是德国，而且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军队也都在占领俄罗斯领土。到了年底，当欧洲和平临近时，托洛茨基认为，挫败协约国反动计划的唯一希望在于德国革命，这将允许与身陷困境的俄国建立军事-政治联盟。届时德国的铁路设备可以用来换取俄国的粮食，从而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奠定基础。然而，在 11 月，当霍亨索伦王朝垮台时，艾伯特和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掌权。革命的时间表被大幅修正。托洛茨基不情愿地总结道：“可能要经过几年，或者几个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事实证明，即使这种有限的乐观主义也很快显得过分了。1919 年 1 月，激进的德国左翼在一次流产的起义后被镇压。4 月，巴伐利亚苏维埃也随之被镇压。到夏天结束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俄国在柏林的公使馆被关闭，仍在俄国的德国军队被用于军事干预。1919 年运往同盟国的美国救济，被刻意算计用来防止艾伯特和温和派垮台，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否则，正如美国代表布利特所警告的那样，“欧洲的其余部分将无法长期幸免于感染”。

1919年春天，协约国的封锁线取代了此前的德国封锁。托洛茨基沮丧地写道，“真正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欧洲工人阶级带着他们的组织和技术来援助俄国时才可能实现。但俄国不能再等了。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估的时候到了。无论是《总结与前瞻》还是帝国主义理论，都在对欧洲事件的估计上犯了错误。另一方面，事实也证明托洛茨基对大规模农民反革命的担忧同样毫无根据。由于土地重新分配而得到安抚，农民更倾向于红军，而非土地占有者的回归。尽管有协约国的援助，白军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很快就陷入了溃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都幸免于被占领。到1919年年底，红军于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取胜，这主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出色的军事指挥。经济组织的问题现在变得更为重要。

## 以劳动力替代资本

随着军事职责变得不那么繁重，托洛茨基转向了重建问题。和列宁一样，他确信“所谓的‘德国战时社会主义’”为俄国的情况提供了合适的组织模式。列宁最初是在其“国家资本主义”中看到了德国模式的相关性。而托洛茨基则对劳动动员体系更感兴趣，在这个体系中，德国的实业家和工会成员被吸收到与国家官员合作，以确保劳动力有序分配。受此启发，1919年12月，他起草了一份提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提案清单。他的意图是，通过效仿军事征兵来建立一个全民劳动动员体系。

在考虑这些建议之前，认识到义务劳动服务的概念在俄国也有几个先例是很重要的。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曾试图设计一个与德国类似的系统。早在1917年6月，布尔什维克的一项决议就已在彼得格勒通过，旨在引入义务劳动服务。到1918年底，落实该决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技术人员被宣布动员；并规定所有16至50岁的公民必须进行义务劳动。1919年1月，农业专家，以及铁路工人、水运工人，和某些中央机构的雇员，也同样被宣布动员。1919年11月，为了补充燃料储备和提供马匹、大车和雪橇以运输重要物

资，向农民宣布了义务劳动服务。鉴于后来的发展，应该强调的是，托洛茨基的提案代表了一系列先前未协调措施的逻辑高潮。他在 1920 年初对决策影响力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他出色地保卫彼得格勒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能干的副手，列宁准备在一段时间内授予几乎无限的权力。

托洛茨基意识到，重建必须以红军有序复员为前提。然而，军事机构是全国唯一高效的官僚机构，他不愿意看到随着和平的到来，它对大量人力资源的控制权随之消失。作为替代方案，他建议军事部门应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管理国家经济生活的责任。民用经济机构要在地域上与军事对应机构相匹配；军事纪律和迅速果断将取代此前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行的过度集权和杂乱无章的控制。军事当局将准备和维护一个全面的劳动记录档案。这样，每个地区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可以被分配到适合其资历的工作。通过将军队投射到这种独特的经济权力位置，12 月的论纲将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的阶段。战时共产主义的高潮，是在军事危险已经消退，并已开始计划用常备民兵取代红军时达到的。

战时共产主义最后阶段的严厉特征，与托洛茨基论纲中所表达的经济野心直接相关。很明显，一个系统的社会主义重建经济计划仍然是未来的事情；但该论纲倾向于认为，一个“小”计划，旨在满足有限数量的高优先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可以立即起草。在 1919 年 12 月底之前，收集必要数据的项目已经开始进行。同月，一个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全民劳动服务委员会”成立。尽管战争人民委员意识到，最近的军事胜利可能会导致民众产生松懈情绪，但他已经习惯了发布命令。他承认，劳动征兵“必然需要强制性措施的支持，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人民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法令宣布，逃避劳动义务的工人应被立即惩戒；将设立刑罚劳动分队，在极端情况下，劳动逃兵可能会被传唤

到革命法庭。为了表明党的意见一致，1920年2月5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份带有列宁签名的声明，解释了这些改革的意义。

在实践中，劳动动员的前提是仔细关注劳动力的不同技能和需求。闲置的军事单位将被改编成“劳动军”，其工作是收集食物和燃料、修建铁路，以及执行其他易于监督的任务。农民将定期被征召，在地方劳动委员会和军事当局的控制下从事类似工作。其中一支最初的劳动军，就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在乌克兰组建的。由军事单位组成的劳动军，实际上构成了复员的延期。就农民而言，有组织和持续的抵抗不太可能发生。将劳动动员的概念应用于工业无产阶级，则代表了一个更严肃、更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

理论上，革命是为了解放工人而发生的。然而，12月的论纲却威胁要让党的宣言沦为笑柄：它们完全没有为工会提供任何角色，只承诺就新政策的细节进行协商。经过讨论，中央委员会试图在最终修订的论纲草案中纠正这一遗漏。工会被要求对其熟练工人施加“影响”。新的工作人员将被招募到劳动官僚机构中，以确保“铁一般的劳动纪律”。自1919年以来偶尔使用的“劳动簿”将被普遍化。1月底的一项决议规定设立劳动法庭。在工会未能恢复所需纪律的情况下，特定的工业或经济的关键部门将被置于经济戒严之下。

托洛茨基对工会的麻木不仁，预示着未来的复杂性。1920年1月24日，他这样讨论了工会的预定角色：

“在熟练工人方面……（劳动动员的）任务将主要落在工会身上。只有在工会方法不足时，才需要一些其他补充的工具——特别是强制的方法；劳动义务假定国家有权对一个坐在村子里从事一些修补工作的熟练工人说：‘你必须收拾东西去索尔莫沃，或者科洛姆纳工厂，因为那里需要你。’”

在他 2 月 25 日的笔记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缺乏慎重。他声称，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没有“工团主义者”那种破坏性的讨价还价和罢工政策的空间；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国家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此刻，列宁同意这一观点，他宣称经济必须“用军事方法，以绝对的无情，并通过压制所有其他利益”来重建。工会领导人可想而知不那么热情。他们指责托洛茨基正试图强制推行一种新的“阿拉克切耶夫主义”（Arakcheyevshchina）。在他们看来，当前的劳工组织方法，类似于亚历山大一世的战争部长，试图将闲置的军事单位用作农业殖民者。

托洛茨基承认，他的设计与早期的希望有所冲突。然而，他断言：“我们……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而受苦，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元素与资本主义的残余交织在一起。”解决方案是努力推行一项始终如一的共产主义政策。这需要一个计划，而一个计划则依赖于劳动动员。正如他在 1 月 6 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有些漫画化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的毁灭中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必经过程。”

当时俄国面临的最严峻困境，莫过于几乎被整个欧洲所孤立。若在平常时期，这种孤立或许不至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 1920 年的俄国经济，早已在连年战火中煎熬了五年有余。工业领域长期处于资本枯竭状态，铁路运输几近瘫痪，矿井积水严重，各大城市饱受饥荒摧残。更有多数工厂因零件短缺、设备失修、原料匮乏而陷入停产状态。当时整个经济体系中最紧缺的生产要素当属资本。由于组织混乱，大量机器设备被迫闲置，这造成了资本破坏程度远超实际情况的假象。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理念在于以人力资源替代资本投入。然而，要有效调配俄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就必须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当时城市中的旷工现象已严重到令人咋舌的地步。那些在战时被招揽进工厂的农民，如今

纷纷返回农村寻找土地和食物。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尚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工人也加入了这场返乡潮。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托洛茨基勇敢地发起了一场个人运动，旨在驱散人们对获得外国援助的任何残存希望。1月6日，他告诉莫斯科党的委员会，关键技术设备持续短缺是不可避免的。他将劳动动员视为经济混乱和资本稀缺的必然结果：“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进口一些机车……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我们必须谈论在几乎完全封锁的时代，我们能在国内做些什么。”托洛茨基宣称，归根结底，“一切都归结于这个国家的活生生的力量。没有其他杠杆。”

从首都的党委员会，他转向了全俄中央工会理事会的党派。在1月12日的演讲中，他承认，如果能从英国或德国进口机械、熟练工匠、技术人员、材料和燃料，“我们的经济状况就会出现一个新因素，这将使其显著改善”。但空洞的希望必须让位于更切合实际的评估：“来自国外的各种礼物”是不会有。俄国必须依靠“社会因素”，依靠劳动力的组织。在他的总结中，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在最广泛的背景下研究引入劳动服务的实验；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设备已经磨损……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用活生生的人力来弥补所有这些短缺。”不到两周后，他在国民经济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这里所讲述的内容是相同的。经过革命、战争和内战，国家的机械设备遭受了巨大破坏。欧洲和美国只会提供微不足道的机器数量。经济的基本“热量”将变为“双倍和三倍的劳动力”，包括熟练的产业无产阶级和可以从农村地区招募的“广阔的原始劳动力资源”。12月论纲的最终版本于1月22日被中央委员会接受。同样的论点再次被用来为军队干预经济生活和劳动动员政策辩护。用第二条论纲的话来说：

“在不久的将来，没有理由指望从外部获得任何大量机器、煤炭或合格工人——这不仅是因为封锁，其未来的走向无法确定地预测，而且也因为西欧的经济极度疲惫。”

第三和第九条论纲重申了孤立主义的结论：俄国在重建经济时，必须主要依赖劳动力。

1920年1月16日，正当托洛茨基的计划被接受时，协约国委员会正式解除了对俄国的封锁，并决定允许与俄国合作社进行私人贸易。一个新的因素进入了尚未稳定的局势，列宁满怀希望地对此做出了反应，期待援助很快就会到来。他将这一决定解读为正常的国际关系和机器进口即将恢复。尽管他的评估更多是出于一厢情愿，而非对国际事件的严肃评价，但这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列宁认可了托洛茨基的计划，但他并不认同这些计划的主要论证基础。

早期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分歧，现在在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背景下重新出现了。与列宁的乐观主义相反，托洛茨基担心一旦干预失败，帝国主义者会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扼杀革命。1920年2月，他写道，如果俄国自身恢复正在进行时，与欧洲恢复经济联系，那么就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而言，结果可能确实是有益的。但他特意补充了第二种可能性：

“鉴于我们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拥有商品供应的世界商人将向我们口授条件。他们将以某种方式将我们沦为被奴役的殖民国家。”

据说英国和法国正致力于将俄国劳动人民转变为殖民地奴隶；一个饥饿的国家将无法抵挡英法资本的冲击。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同意列宁的观点，必须尝试购买外国机器。为了这个目的，他建议可以使用国家剩余的黄金储备，前提是能够规避非官方的协约国黄金封锁。为了稳定其摇摇欲坠的货币，法国和英国可能会被诱导接受俄国的金条。就俄国而言，它很快就不再

需要贵金属的货币功能了：“我们正在向共产主义结构过渡；金钱在我国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种自相矛盾的回应，是托洛茨基不确定性的体现。他无法完全放弃克服封锁的希望，但同时又对可能产生的好处深表怀疑。他认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欧洲将在战后疲惫不堪的状态中沉沦，其间穿插着周期性的危机。无论协约国委员会做出什么决定，俄国事实上的孤立状态都可能继续下去。由于自身的经济困难，英国和法国似乎都没有能力提供俄国所需的资本设备。在这方面的轻率希望将是“最纯粹的乌托邦”；俄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错误的乐观主义可能会在最大的牺牲尚未来临之际削弱工人人们的决心。他宣称，必须将协约国视为“既非善也非恶的力量”，换句话说，要对其漠不关心。在他们能够出口生产资料之前，他们的声明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必须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战略。俄国饥饿而贫穷。资本家会利用人类的苦难，提出不可能的条件，以换取“一磅茶叶和一罐炼乳”。

抛开修辞不谈，托洛茨基似乎怀疑俄国会被诱入在债务清偿和国有化这两个问题上做出妥协。这种担忧是合理的。法国政府完全打算让商业关系的恢复，取决于对前国家债务的清偿和对被没收财产的赔偿。如果缓解饥荒的代价是社会主义的未来，托洛茨基决心，俄国必须抵制这种诱惑，直到她可以从优势地位进行谈判。他这种不妥协的姿态，源于他对党内意见的危险误读。如果他事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 1920 年 3 月举行的第九次党代会的辩论，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进一步怀疑的空间。

## 第九次党代会

大会在普遍不确定的气氛中召开。布哈林此前曾呼吁对资本主义发动革命战争，或者托洛茨基曾号召无产阶级骑马对抗白军，这些豪言壮语似乎都成了遥远的记忆。代表们期待

听到和讨论的，是赞扬、安慰和一段休息的话语。但托洛茨基无视明显的不满迹象，拒绝相信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意志。对于每一个倒下的战士，他声称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用革命阶级意识武装起来的新人。“这些人，”他最近在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是我们十月革命最宝贵的成果，也是其未来成功的保证。”迄今为止，俄国已经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托洛茨基正在期待再一个奇迹。

他受命提交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官方报告，一开始就概述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分四步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就其天真而简单而言，这个计划很容易与《总结与前瞻》中列举的经济先决条件相媲美。简而言之，它规定了交通、燃料和工程工业的顺序恢复。在对外贸易开放的范围内，进口将被限制在生产资料上，并且不会对当前的消费者心理做出任何让步。在此时撰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证实了他对消费者的漠视：“我们将用我们的一部分原材料来换取机车或必要的机器，但绝不会换取衣服、靴子或殖民地产品；我们的首要项目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工具。”

在劳工问题上，托洛茨基解释了在工厂中实施军事纪律的必要性。熟练的产业工人将依据不断发展的危机，突然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他提议的大会决议要求“有计划、有系统、稳定而严厉地打击劳动逃兵，特别是通过公布逃兵名单，设立由逃兵组成的劳役队，并将他们拘禁在集中营里。”工会将扮演动员工具的角色，对其成员“拥有与以前只有军事组织才有的相同权利”。换句话说，工会“要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的工人以及单个无产者进行分配、分组、固定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列宁的态度与托洛茨基非常相似。他在大会开幕时，认可了使用武力来实施劳动征兵计划，并指出任何革命都无法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完成。和平的经济发展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就像战时纪律一样必不可少。然而，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强调强制力，但他们也意

识到，惩罚性制裁必须与以广泛宣传的奖金和津贴计划形式的积极激励相结合。消费品，尤其是食物供应，将被有区别地分配，优先给予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各部门中最好的企业，以及最自觉和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人个体。这种有组织的“不平等”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做“突击工作”，或者叫“冲击工作”。

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召开的党代会，所以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未来经济政策的整个走向。因此，这次会议凸显出几种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这并不奇怪。许多继续从1917-18年的民主经验中寻求灵感的代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独裁态度感到反感。代表新兴的民主集中派系发言的奥辛斯基抗议说，革命正因文官和军事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受到威胁。他预言，后者很快就会延伸到政治中：“红色州长”将通过接管地方苏维埃来完成向反动的漂移。新名字无法掩盖旧秩序的回归。

继承早期左翼共产主义者的传统，奥辛斯基特别批判了“突击工作”制度。他警告代表们，战争人民委员正试图将经济转变为一台军事机器。他承认，“突击工作”可能会产生积极成果，但这只有在有选择地使用时才行。不可能同时将稀缺资源集中在每一个薄弱点上。此外，在有限数量的高优先重点领域取得成功，取决于其他地方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独立性，而这反过来又必须源于合议制管理。他指出将军队作为经济工具的荒谬性，要求将劳动军转移到文官控制之下。关于工会，民主集中派谴责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法令加速有组织劳工“国家化”的企图。代表同一团体的萨普罗诺夫（Sapronov）则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使用政治部——这是在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基础上修改的——来取代既定党组织的做法。

来自学者梁赞诺夫的批判同样激烈，他强烈驳斥了托洛茨基关于工会和国家之间利益相同的假设。他认为，对不平等的错误强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个由工人英雄组成的新劳动贵族。代表新兴的“工人反对派”的卢托维诺夫（Lutovinov）也采取了类似的指责态

度，并要求党坚持其正式纲领。他建议，工会应该独自承担经济管理的责任。每个工会应负责其自身的工业分支，而中央工会理事会则负责整个工业。

在一份专门讨论工会的报告中，布哈林通过断言国家化进程已经在进行中来回应持不同政见者。他承认工会没有直接控制生产；但他们会通过派代表参加所有政策讨论，并为各种经济机构提名候选人，来逐渐渗透到经济管理机构中。布哈林承认，管理人员的选拔应在与工会官员协商后进行，但他仍坚持认为工会必须军事化，以确保“秩序和纪律、准确性和责任感”。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对俄国处境的评估相同，在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中写道：

“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无产阶级继承了一个严重受损的物质、机械和技术框架时，活的劳动力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此，过渡到全民劳动服务体系……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创造一个集体运作的、活的、大众的生产力，是进一步工作的出发点。”

党内更倾向自由主义的派系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无法与第二大批评托洛茨基的团体建立共同事业。这些是新的苏维埃官僚，他们的自主权受到了战争部野心的威胁。一个特别的怨恨源头是，托洛茨基在最近几个月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过度集权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效性进行了多次攻击。在一次讲话中，托洛茨基写道：

“中央集权在于，中央向这里（乌拉尔地区）派遣拥有无限权力的特命全权代表。但他们与中央没有联系。只有建立拥有广泛权力的强大的、永久的州（区域）中心，才能够克服混乱。”

地方层面的重组将与中央行政部门的改革相结合。1月，托洛茨基提议创建一个新的中央计划机构，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剩余职责分配给国防委员会，即军队的主要供应机构。两个月后，这项提案被接受了。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这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衰落正式化。在党代会上，托洛茨基计划巩固这些安排。当时正在运作的

六支劳动军的苏维埃将被改组为州经济局。中央各部的代表将在这些新委员会中拥有席位，在那里他们可以受到托洛茨基下属的严密监督。不出所料，新一轮的反对声浪出现了。

在大会之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他的副手之一米柳京就宣布，他们将对这一提案提出异议。米柳京在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宣称：“我确信，尽管反革命已经被击败，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和平，我们经济的军事性质仍必须得到保持。”直到国际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之后，更正常的程序才能盛行。与此同时，他巧妙地试图通过同意早先关于合议制管理的呼声来获得工会的支持。然而，这项策略注定要失败，因为米柳京心中所想的合议制，显然完全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合议制。当列宁介入辩论时，他立即谴责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试图形成一个“经济人民委员会的单独集团”的企图，这个集团将脱离军事部门。在列宁的批准下，大会认可了托洛茨基的建议。

在克服了这些行政障碍之后，托洛茨基确信，现在进行实际工作的方式已经畅通无阻了。由于交通运输是主要的瓶颈，他认为重建应该从大规模生产机车备件开始，为最终制造完整的单位做准备。革命清除了“许多陈旧和腐朽的东西”。国家正在从头开始。即便如此，新俄国在至少一个重要方面将与旧俄国相似：它将继续享有经济落后的好处，可以从一开始就基于最新的技术数据进行生产。只需要一次最后的努力就能启动这个进程。当托洛茨基预测说“在我们收集了某些物资并克服了我们可怜的贫困之后，我们将能够跨越一整系列的中间阶段”时，《总结与前瞻》的影响并不难辨认。

对于普通党员来说，托洛茨基对经济政策的控制似乎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但这种情况只能持续到辩论不涉及第一性原则之时；也就是说，不涉及俄国持续孤立于西方的根本问题。李可夫，这个经常被托洛茨基辱骂的对象，是第一个察觉到这个关键联系，并理解托洛茨基的立场取决于他对与欧洲长期分离的核心假设的人。李可夫确信自己发现了一个决定性

的弱点，他强烈谴责了托洛茨基的四阶段计划，理由是该计划未能考虑国际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带来的对外贸易扩张；它完全忽略了国际革命。因此，托洛茨基被认为提出了一个纯粹虚构的“孤立、分离的经济”理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俄国应该着手自建机器和设备的荒谬结论。事实上，李可夫声称，俄国一直以来进口高达百分之七十的资本货物。这个国家既没有机器，也没有熟练劳动力来满足其重工业需求。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很明显国际革命会在那之前发生。

在初始阶段，李可夫的质询因为他提出的劳动动员替代方案仅仅是假设性的而遭受挫折。然而，没过多久，李可夫就意识到需要对他的批评稍作修改。当欧洲的革命没有发生时，他开始力主，唯一的可能替代方案是恢复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他在第九次党代会上的演讲，也许是整个会议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它有助于扭转党的假设，并启动了一种新的整合主义思维模式，这种模式迅速瓦解了托洛茨基的整个立场。

我们将这个主题留待以后更详细的讨论，但在此刻，我们应该注意到，托洛茨基迅速察觉到了这些威胁的含义。他回应说，资本家们很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封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随着反革命在德国的胜利，封锁将被恢复，垂死的帝国主义将再次疯狂地努力。这些努力可能会持续数年。”除非能够在国内制造机车，否则俄国将在此期间灭亡。同样，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否认他打算创造一种“狭隘的‘民族’共产主义”。如果封锁解除，计划将彻底改变：

“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面对欧洲和世界革命可能的最缓慢发展——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并变得更强大。”

托洛基雄心勃勃的项目，似乎是革命反抗精神的完美体现。李可夫通过指出，它植根于最深刻的悲观主义，并建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固定假设之上，从而摧毁了这一形象。随着恢复贸易的希望越来越大，托洛茨基的固执显然是封闭思想的结果。然而，他的反对者没有成功的机会，除非他们能在列宁眼中抹黑这位战争人民委员的政策。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实际的政治议题，一个能够将工会主义者、他们的支持者和经济管理者团结在一个共同平台上的议题。在党代会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很快就在托洛茨基对交通运输业的管理中找到了这样一个议题。

## 交通运输业的危机

在所有的工会中，交通运输业的工会对党的命令一直是最不服从的。1919年1月，第一次尝试动员铁路和水运工人。一年后，第二次颁布了具有相同目标的法令，但工会继续坚持其独立性。由于人民委员会已经声明，交通人民委员应行使“独裁权力”，列宁判断托洛茨基适合担任此职。1920年3月，他要求这位战争人民委员整顿该行业。

托洛茨基的第一反应，是将该行业的恶化主要归因于工人“小团体主义”的态度。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他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第一个是“全俄运输政治部”

(Glavpolitput)，旨在全国范围内分派组织者干部。此举对工会毫不顾忌，以至于奥辛斯基问托洛茨基是否打算彻底废除工会，用政治部取而代之。8月，“全俄运输政治部”与新的铁路和水运工人中央委员会合并。那些曾阻碍托洛茨基计划的工会领导人被撤职，他们更顺从的同事接受了这位战争人民委员作为工会的名义负责人。作为“国家化”的一个试验案例，这一实验不太可能促使克制。这个口号通常被理解为工会将逐步吸收管理。而托洛茨基则在第一时间颠倒了它的含义；工人组织被国家吞并了。

铁路上的普遍异议气氛反映了物理上的瓦解。4月9日，托洛茨基宣布俄国的首要需求是和平，以便所有努力都可以集中在劳动战线上。两周后，波兰入侵乌克兰。尽管列宁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将战胜波兰视为通往德国和欧洲的桥梁，但托洛茨基并不认同他们的热情。苏联在华沙战役的失败，加剧了他的信念：一支装备精良的小股协约国军队，将在欧洲领土上击溃红军。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在国外引发革命是无望的。在绝望中，他威胁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坚持进行武装冒险，他将向“普通群众”（rank-and-file）发起申诉。

波兰战争对俄国本已破碎的交通网络造成了最后一击。在总共一万六千辆机车中，有九千六百辆无法运行。交通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试图通过起草一项名为“第1042号命令”的维修计划来应对紧急情况，该计划涵盖了直至1925年的时期。即使在这个时间框架内，托洛茨基也拒绝指望外部援助。“所有这些，”他评论道，“都是假设性的，在我们的计划中，所有假设、猜想和希望都被排除在外。”一些党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最近的灾难使得托洛茨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复无常。

第1042号命令将是系统计划中的第一个环节，该计划将迅速涵盖所有中央政府部门。机车维修计划将与粮食计划、货车生产计划、轨道维修计划以及另一项滚动库存利用计划相结合。而这些，反过来又将伴随着一个零件生产计划。工业零件将限制在最小的品种，以保证长期的生产运行和互换性。托洛茨基相信，标准化很快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标志。机车将“通过简单地组装已经在选定的突击工作工业中准备好的零部件”来制造。通过所有这些局部计划的相互关联和相互联系，一个总体计划将浮现。大胆的组织举措将克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官僚无能。

在将社会主义俄国从看似无望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热情中，托洛茨基承担了太多。特别是，他对党忠诚和纪律的纽带给予了过度的信任。到1920年夏天，由于他沉迷于抽象概

念，并故意漠视基本的人际关系，他已经树敌无数。不满情绪已经从党的边缘派系蔓延到了主要的决策机构。李可夫最近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另一个威胁来自季诺维也夫，作为彼得格勒的党魁，他此时正试图削弱托洛茨基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控制。当第九次党代会于1920年9月下旬召开时，这场个人恩怨突然以协调一致的攻击形式出现。

自这位战争人民委员向党提出他的社会主义蓝图以来，还不到六个月。现在，季诺维也夫戏剧性地推翻了托洛茨基早先的每一项建议。“突击工作”制度提出的严苛要求不能继续；优先原则必须让位于平等原则。尽管“突击工作”制度很难算作托洛茨基个人的发明，但季诺维也夫毫不怀疑最近的困境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他评论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仍然没有完全的平等，在党内也没有完全的平等”，仿佛这是他的新发现。他宣称，突击小组、对理论上可选举职位的“任命”制度、对批评的压制、奖金和津贴制度：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不满和热情下降。托洛茨基曾反复强调，迅速改变劳动力分配的能力至关重要；而季诺维也夫则提议“每个负责任的工人，都应该被固定在一个确定的细胞中”。将人们“今天扔到一个地方，明天扔到另一个地方”的做法已不再可能。

抗议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在内战期间，创建“突击工作（事实上是特权的）部门和工人小组”是必要的。但情况正在改变，这引发了“有必要再次将党的注意力，导向为实现党内……无产阶级内部……以及全体劳动群众之间更大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将特别努力致力于实现“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更大平等。会议补充说，对选举职位的“任命”应停止，转而采用“推荐”。最耸人听闻的任命案例发生在铁路和水运工人中央委员会（Tsektran）的创建中。实际上，会议决议直接否决了前一次党代会的决定。一旦起了头，这些挑战就迅速获得了更多动力。同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更具体的措施。交通运输业的政治部将被解散，并被吸收到常规的工会机构中。

党领导层中终于出现了分裂。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在工会中的一位支持者，急忙为“突击工作”辩护：

“我们被迫选择我们经济战线中最薄弱、最重要的点，并将我们的打击指向那里。今天我们清除了前线一部分的危险；明天我们将把我们的力量转移到另一部分，依此类推。今天我们以牺牲另一个部门为代价，强行向一个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明天我们将根据不断变化的任务做出新的分配。”

安德烈耶夫的文章发表在《劳动公报》(Vestnik Truda)上。同一期刊的下一期刊登了卢托维诺夫的系统性反驳。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代言人，他认为“突击工作”忽视了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并要求在广泛的战线上同时推进。目标必须是“工会的平等”和“为完成所有任务而平均分配的力量”。根据卢托维诺夫的说法，根本的困难在于工会已经与群众的健康影响隔绝。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诉诸于压制和“中央运输委员会主义”：“通过鼓动和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旧方法，正在被通告和命令所取代。”

10月12日与波兰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这些批评显得更加及时。随着全国工会会议定于11月初召开，列宁再次准备做出让步。在一份决议草案中，他呼吁结束“中央运输委员会的过度发展”，并回归涉及“更广泛地应用民主（和）促进主动性”的方法。尽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套由鲁祖塔克准备的无害的论纲，但党的派别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必须进行最积极、最有计划的斗争，反对中央集权和军事化工作形式退化为官僚主义、小暴政、繁文缛节和对工会的狭隘监护……至于中央运输委员会，特殊管理方法的时代……正在开始过去。”

托洛茨基对这些决定的反应是异常轻率的。他没有追随列宁的领导，而是严厉谴责了工会负责人托姆斯基，并要求对工会等级制度进行“改组”。由于“改组”这个不恰当的术

语后来被误解为对工会本身的攻击，其含义应该得到澄清。托洛茨基打算通过模仿中央运输委员会，在政府部门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实现人员渗透，从而完成整个工会运动的国家化进程。当中央运输委员会不民主的指控被提出时，他戏谑地建议，选举原则应该在较低层次上得到更一致的应用。理论上已经选出的工会官员，将被吸收到管理机构中。同样，专家和行政人员将被任命到工会办公室。因此，这两个结构将通过将同一个人置于劳工和管理职能的负责地位来结合。与此同时，现有的工会官员将“接受考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适合旧的组织斗争，适合领导罢工和街垒战；但并非所有人，就其资历而言，都适合组织交通运输本身”。对交通运输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工业也是如此。托洛茨基的自以为是，因他相信自己被背叛了而得到强化。正如他几周后评论的那样：

“关于……全俄运输政治部，人们说：看——他们在任命，他们在下命令，他们在恐吓我们。为了应对国家交通运输中的危急情况，我们建立了一个例外的临时机构来拯救这个行业。这个例外的机构开始其工作，然后同志们过来宣布，它正在实施劳动军事化，这个例外的机构行为异常。但你看，它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它是一个例外的机构。”

在 11 月 9 日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提交了相互对立的论纲。托洛茨基将其对中央运输委员会的提案普遍化，主张全国各地的组织者、专家和行政人员都应该接管工会办公室。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不太军事化的工作形式必须推迟。工人的心理必须重塑；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这种转变必须通过行政任命来实现。他无视最近党代会的决定，指出持续求助于像全俄运输政治部这样的机构可能是必要的。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突击工作”的必要性是现有条件的必然产物。列宁关于“平等化”的呼吁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经济纲领。在随后对中央运输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托洛茨基再次要求对工会进行“外科手术式干预”。

列宁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剧烈的反应，后来承认自己做出了一些夸大甚至错误的攻击。但由于列宁自己的突然转变如此出人意料，他未能获得党内领导层的多数支持。总共二十名成员中，有十名拒绝站队。由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的不确定派系，组成了一个“缓冲小组”，试图达成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列宁打算提交的会议报告被取消了。相反，季诺维也夫被指示向工会主义者，提供一个“务实的、无争议的”党政策阐述，以掩盖现有的意见分歧。列宁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安抚。11月9日的一项决议呼吁中央运输委员会“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突击工作”在经济规划方面将被保留；但它必须与“坚定不移地向平等化过渡”相结合。

为了确保这个问题被搁置，一个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负责进一步探讨此事。至于托洛茨基的预定角色，存在一些混乱。他自己的叙述表明，列宁希望将他完全排除在外。无论如何，当后来被要求任职时，他拒绝了。由于季诺维也夫是唯一被授权代表委员会发言的成员，这个策略显然是为了压制列宁的反对者。

在会议结束后的立即时期，试图扼杀辩论的尝试似乎取得了成功。托洛茨基被派往顿巴斯，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一系列由食物和鞋子短缺引起的罢工。但这次离开首都的逗留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托洛茨基带着强烈的建议回来了：必须应用全套的“突击工作”技术，否则将无法阻止煤炭和金属生产的彻底停止。矿工和金属工人工会应该通过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从军事干部中抽调劳工和组织者来加强；顿巴斯劳动军和政治部应该重组；该地区在食物和设备供应方面应获得特权地位。

当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公开化时，分歧达到了高潮。托洛茨基在交通运输业的反对者认为，这是一个重燃斗争的好时机。11月下旬，中央运输委员会和水运工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预见到进一步的复杂情况，11月30日，托洛茨基致信政治局，表示在未来

两到三个月内，“绝不能”解散负责水路运输的政治部。然而，当中央委员会在12月初召开会议时，一项决议获得通过，要求立即解散这些可憎的监督机构。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此外，由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七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提出要么改变中央运输委员会的人员，要么更好的是，将其彻底废除。通过与在场的另外七名成员结盟，托洛茨基得以获得一个看似可疑的妥协：在接下来的二月，将为中央运输委员会举行新的选举。

从劳工政策的角度来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始于这些决定。托洛茨基政策的人力和组织后果最终被否决了。更重要的是，正如在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他的孤立主义假设也遭到了质疑。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事实的派生品，是李可夫在第九次党代会含糊提及的整合替代方案的产物。

提及的许多政策逆转以及由此带来的态度转变，本应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需要采取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立场。然而，到了1920年12月底，这个选择已经不复存在：列宁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党的最高层，而是以一场激烈的公开争吵的形式爆发。面对越来越多的指责，托洛茨基别无选择，只能自卫。起初，他试图简化冲突，认为可以通过一个简洁的算术公式来解决。他提议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成员，安排到中央工会理事会，反之亦然。他用“融合”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政策。他希望这个新词比“国家化”更容易被接受，并相信通过在所有行政层面上的融合，现有的敌意会烟消云散。由于他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个组织的万能药，因此未能理解事关重大的问题。

他继续在报刊和公开会议上发表挑衅性言论，同时仍然拒绝在季诺维也夫的委员会中任职，这激怒了列宁。列宁指责这种行为“官僚主义、非苏维埃、非社会主义、不正确且具有政治危害”。最后一个担忧是最重要的，列宁警告说：“现在，关于‘融合’最好的做法

就是保持沉默。言语是银，沉默是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着手进行融合了。”

列宁希望悄悄地保留托洛茨基计划的许多严格特征。早在 1921 年 1 月，他就亲自策划了一项中央委员会决议，谴责反对铁路上的剩余政治委员的煽动。在另一个场合，他承认他与托洛茨基的个人争执“与一般原则无关”。他真正担心的是，不是托洛茨基的威权主义，而是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的“工人反对派”所引起的喧嚣。托洛茨基发表的每一份声明，都助长了左翼更激烈的要求，直到最终通货膨胀般的最后通牒螺旋，达到了高潮：将经济管理者的选择权完全交给工会。更糟糕的是，在努力在两个极端之间搭建桥梁时，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缓冲小组暂时发现自己被拉向了同一个方向。一场全面的、回到 1917-18 年无政府状态的灾难似乎迫在眉睫。列宁对这种灾难的后果感到恐惧。“所有这些工团主义的胡言乱语，”他坚持说，“……都必须扔进废纸篓。”他认为工会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把自己看得比这更重要，是自命不凡。

后者的建议引发了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什利亚普尼科夫的情人和工人反对派中最能言善辩的领导人——的惊愕嘲笑。她嘲讽列宁出人意料的教育学倾向，提出了一个响亮的论点，即彻底废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她声称，其下属部门是反无产阶级的、充满前资本主义董事的颠覆性巢穴。她的解决方案是“让阶级创造能力自由展现，而不是被充满资产阶级生产和控制体系常规精神的官僚机器所限制和破坏”。托洛茨基至少因其坦率而获得了赞誉；他公开承认自己计划用棍棒来教育工人。

尽管有大量的小册子和演讲，但双方的立场直到 1921 年 3 月第十次党代会前夕才发生实质性变化。会议前不久，缓冲小组转而支持托洛茨基，放弃了徒劳的调解尝试。然而，

尽管之前的交锋十分激烈，但大会上的辩论却构成了一个空洞的尾声。一场惊人的灾难突然将整个党的注意力从劳工问题上转移开了。

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堡垒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起来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托洛茨基再次呼吁纪律将是荒谬的。他的注意力被复燃的无政府主义威胁所吸引，他以敷衍了事的方式发表了演讲。地方党代表认可了列宁的立场，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在一片低语中结束了。

托洛茨基失败后，他行动的徒劳性立刻变得显而易见。通过列宁的谨慎——如果不是说两面派的话——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声誉以牺牲托洛茨基为代价被挽救了。对过去的决定，人们通过暗地里将责任归咎于一个人——尽管这些政策先前得到了整个党的领导层的认可——来回避集体责任。中央运输委员会得到了全面恢复，到 1921 年 10 月，备受争议的政治部也重新成立了。工会通过行政任命被置于控制之下，而工人反对派则通过调离而被解散，在政治上变得无害。

随着 1921 年春夏新经济政策的引入，整个事件最终以讽刺性的结局收场。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劳动动员或“突击工作”的问题完全无关。自 1913 年以来，耕地面积一直在下降。1920 年 2 月，托洛茨基曾提议通过一种类似于工业中使用的经济激励制度来扭转这一趋势。他建议，用向农民提供消费品来换取他们向国家缴纳实物税，而不是强制性的粮食征收。由于无法提供充足的制成品，这项措施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年底，成立了特别播种委员会，以强迫农民提供超过他们自己所需的粮食。当这个最后的权宜之计失败后，列宁重新提出了实物税的想法，并决定工业生产应集中于为农村市场生产商品。

1921 年夏天，许多小型企业被租赁给合作社和私人企业家，他们可以利用当地的食物、燃料和材料供应来维持运营。7 月，列宁担心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工业可能无法

在政府控制下继续运转。当实物税收缴到的粮食甚至比强制征收还少时，补贴被限制在经济的所谓“制高点”。规模较大的企业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中脱离出来，并被组建成托拉斯。集体工资协议得到恢复，托拉斯被转变为商业基础，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以取代被放弃的集中供应生产。随后旨在合理化生产的尝试导致了劳动力减少和失业。劳动动员的理由消失了。在 1921 年，至少有两次征募农民劳工。但到年底，“劳动军”和“劳动服务”的概念都已成为历史。与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痕迹。

## 孤立主义在托洛茨基思想中的重要性

根据列宁的说法，托洛茨基在此期间的行为（以及他后来对经济计划的坚持），是由于“过度的自信”和“过于被事务的行政方面所吸引”的倾向。作为对人格的评估，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对托洛茨基许多决策背后基本原理的洞察，可以在他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行政哲学中找到：

“我认为在生活和创造性工作的所有领域，都应用了某些共同的方法……在行政领域，一个工厂或车间的好管理者，也将是一个好的军事管理者。行政的方法，总体上是相同的。人类的逻辑在军事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方式大致相同；准确性、坚持不懈，这些是在任何人们希望建设、创造、学习的领域中，所必需的品质。”

但如果将这些篇章中呈现的证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就会清楚地看到，影响托洛茨基判断的最具决定性因素，是俄国与欧洲的孤立。他所采取的“突击工作”战略，是试图将稀缺资源集中于一系列无法通过进口商品、材料和设备来扩大的瓶颈。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使他相信来自欧洲的援助是不会到来的。他希望一个经济计划——最初以劳动力投入的形式构思，后来以更复杂的形式出现——能够促进一种更稳定的增长模式。到

1920 年底，他讨论计划政策时的一个关键词变成了“比例性”（proportionality），意思是工业能够满足自身和农业的需求（反之亦然）。该计划的目标将是在经济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分支中，建立必要的比例性。“突击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不能通过竞争、通过自由市场上的供需来建立这种比例性。”在实践中，“比例性”意味着一种接近自给自足的方法。在 1930 年，托洛茨基否认了这一点。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讨论仅限于以下评论：“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非基于在民族疆界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只有孟什维克为了嘲笑苏维埃政权，才将这样的计划归咎于它。”

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否认了他的政策，但它们绝非不理性。一旦假定长期孤立，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想法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托洛茨基夸大了俄国资本设备的物理破坏。但在闲置的工业设备重新投入运行之前，将劳动力视为一种“自由”的生产要素，并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应用它是完全明智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维埃工业化，就是建立在对劳动力的大量消耗之上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多余的农村人口可以在不实质性改变潜在农业生产力的情况下从土地上转移。

“突击工作”的体系也同样符合逻辑，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瓶颈式的发展方法，强调促进与关键增长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的重要性，至今仍有极具说服力的支持者。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些联系意味着“比例性”。如果他犯了错，那是因为稀缺性太过普遍，以至于无法达到他所预期的复苏速度。在俄国不同寻常的状况下，“突击工作”可能会通过低估为优先部门生产投入和加工其最终产品的工业的重要性，从而使危机局面永久化。另一方面，“突击工作”是一个程度问题。可以有更大和更小的优先事项。斯大林后来对重工业的集中，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突击工作”战略。然而，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托洛茨基认识到，为了维护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更平衡的发展模式。同样，他最终也意识到

了“指令经济”与地方主动性之间的不兼容性。在流亡中，他呼吁一种更灵活的社会主义，它基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斯大林无视了这一请求，苏维埃的计划者们至今仍在试图在垂直和水平控制与决策之间，实现令人满意的平衡。

最后，《总结与前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 1905-6 年，托洛茨基相信他已经确立了俄国“成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构成了一种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的逻辑努力，旨在冲向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工程实验。通过类比沙皇俄国向资本主义的“飞跃”，托洛茨基确信社会主义俄国也将同样“飞跃”到未来。他认为，主要的障碍不是技术落后，而是传统社会主义对民主的承诺。如果这些承诺能够被克服，人类意志的最高体现将把俄国带入一个历史新阶段。

### 三、融合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一位与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将那个时期恰当地称为“俄国革命的英雄阶段”。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到来，1920年代那种鲁莽的实验主义很快就被苏联未来的奇特（尽管同样充满想象力）愿景所取代。军事威胁进一步消退，而战争部门的主导地位也告终。寻找摆脱俄国困境的出路，导致对这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地位进行了影响深远的重新评估。

托洛茨基在慢慢适应变化的知识和政治氛围时，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他个人影响力的下降始于运输业危机之前，此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各种旨在替代劳动动员的设想，都意味着需要将俄国重新整合到世界经济中。在各种问题和事件的压力下，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作了修改。但即使他对欧洲事态发展的修正估计，也排除了获得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他不愿意支持新的融合主义万灵药，随后引发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政治对抗，这场对抗深刻地影响了整个1920年代早期的历史。

#### 用资本取代劳力

除了对劳动动员的直接政治反对之外，托洛茨基的政策从根本上与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在他的主要经济论著《资本论》中，马克思总是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许多党员来说，劳动动员似乎是前现代经济方法的一种不合时宜的倒退。社会主义革命本应标志着人类向更高社会秩序的进步；然而，军事化劳工却与十九世纪的农奴制度有着可疑的相似之处。很少有人否认特殊情况需要特殊措施；但在1920年代初，许多人开始超越当前的危机，并提出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更正统道路。

这种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表现是，关于电气化的提议所激发的兴奋。1920年3月，就在托洛茨基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取得胜利的前几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出版了一本题为

《俄国电气化的主要任务 (The Main Tasks of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的小册子。与劳工军队的方案形成对比的是，这本小册子描绘了一个工程师梦想中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它将因对发电站的大量投资而突飞猛进。尽管列宁当时全力支持托洛茨基，但他还是急忙对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著作表示赞同。

在第九次党代会的论文中，托洛茨基似乎通过加入关于电气化的一个章节来与列宁的意愿妥协。然而，在他的口头报告中，他只是顺便提到了这个主题，这表明他专注于更紧迫的问题。与电气化的技术神秘感相比，托洛茨基的提议显得越来越缺乏灵感和业余。列宁的信心发生了动摇。1920年11月，列宁给托洛茨基发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没有电气化的重建计划将一事无成；而讨论‘基本任务’却不提及这个计划，甚至是不严肃的。”

当托洛茨基继续要求增加劳工与国防委员会的权力时，这种最初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在这一年的春天，列宁曾在这个问题上与李可夫发生过冲突；但在12月，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立场，并赋予了该委员会“一个非常谦虚的角色”。列宁认为电气化已经成为党的“第二个纲领”，到1921年2月，他决定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电气化委员会 (GOELRO) 应该成为主要的规划机构。7月，列宁在政治局的笔记中指出，托洛茨基“反对 GOELRO”，并希望“摆脱电气化的想法”。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思想表明了人们普遍厌恶用劳力取代资本这一观念。在苏联思想中推动新的资本导向方面，同样有影响力的还有李可夫。由于看到电气化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这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仅限于详细阐述一项更为温和的短期机械化方案的好处。1920年11月，他列出了扩展俄国生产力的三种可能方式：(1) 可以增加受雇工人的数量；(2) 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现有劳动力；(3) 可以为每个工人提供更多的资本。前两种

可能性尽管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被排除了，因为国家甚至无法供养已经动员起来的工人数量。机械化仍然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劳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在 1920 年 12 月的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审查。会上，李可夫评论说，“其中一位军事同志”犯了将经济与军事分队相混淆的“毫无疑问的错误”。他无视托洛茨基最近关于将顿巴斯军事化的建议，认为除了进口外国机械之外，没有办法恢复该地区的生产：

“我们在顿涅茨地区进行的调查揭示了所有煤矿技术设备的严重损毁。这种状况是由于...设备历来都来自国外...我们从来没有生产过矿工用的灯具、水泵或电气设备——所有这些物品都来自西欧。”

李可夫将托洛茨基在乌拉尔地区使用戒严法比作农奴制度，他坚持认为必须用机械取代农民劳力。在同一次会议上，列宁强调了在所有地方引进更多机械，并尽可能广泛地使用机器技术的必要性。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也提出了同样的主题，详细阐述了过度依赖人力的危险。他将动员描述为一次临时性的远征。当资本家可以通过电气机械将他们的工人生产力提高数马力时，单纯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他警告说，”过度高估所谓的活力要素，指望我们这个巨大国家的大量劳动人口仅凭其数量就能取得胜利，将是极其危险的。

作为托洛茨基最顽固的对手之一，斯大林也注意到了党内意见的转变。在一份给列宁的便条中，他过分地赞扬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称其为“一个真正统一和真正具有政治家风范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他转向托洛茨基，刻薄地补充道：

“你还记得...托洛茨基提出的‘计划’，即在利用大量非熟练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劳力于战前工业的残余基础上来实现俄国的‘经济复兴’。多么可怜！与 GOELRO 计划相比，是多么落后！一个把自己当成易卜生英雄的中世纪手工业者，被召唤来‘拯救’俄国。”

尽管李可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以资本为导向的提议具有吸引力，但它们并没有立即带来任何切实的成果。原因很简单；在试图推翻托洛茨基的体系时，他的批评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俄国回归世界经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出口将会恢复，从而提供购买外国设备所需的资金。随着外国投资者再次将对俄国的投资视为一种合理的经济风险，资本进口也将恢复。信心的复苏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人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被说服来资助苏联的重建。结果是官方党派路线的一次重大修正。

在整个 1920 年，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正处于彻底且不可逆转的崩溃边缘。国际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到了 1921 年春天，列宁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评估。他告诉第十次党代会，如果认为革命在任何一个更重要的国家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那将是“疯狂的”。一年前，托洛茨基也曾做出过类似的预测。但由于相信欧洲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迫在眉睫，他曾得出结论，英国和法国将无法提供俄国所需的资本设备。现在，他和列宁再次被他们各自的帝国主义理论引向了相反的方向。根据列宁的说法，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经济和军事上增长”。资本主义被证明比最初预期的更持久；机械进口再次成为可能。

为了巩固自己的论点，融合主义者接着阐述了一个明显矛盾的主张；他们承认西方正在复苏，但认为如果没有俄国的参与，复苏就无法进行。当李可夫宣称“西欧（传统上）从俄国获得的原材料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这些材料，没有苏维埃俄国参与欧洲经济

的恢复，恢复...将是不可能的”时，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元素显而易见。列宁也表示赞同：

“为了恢复世界经济，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材料。没有它们你将无法度过难关——这在经济上是事实。甚至...一个从纯粹资产阶级立场看待事物的经济学学生也承认这一点。那个人就是凯恩斯...”

因此，鉴于俄国和西方之间明显的相互依赖关系，列宁宣称：“希望我们能实现完全的经济独立，将是绝对荒谬、空想和乌托邦式的。”只有通过进口机器和其他货物，才有可能“确保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敌人的包围下继续存在”。同样的推理也表明，资本家们为了获取俄国的原材料，会意识到经济和解的必要性。如果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到俄国，并携带他们的资本设备协助开发自然资源，双方都会受益，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出于教义上的原因，外国投资不能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出现，因此将采用租赁安排或特许权来代替。

特许权的想法源于 1918 年关于《布列斯特条约》的讨论。在德国战败后，类似的提议也曾向协约国提出。1919 年 2 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甚至同意承认沙皇时期的债务，前提是可以在一些采掘业中安排特许权。现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希望电气化所需的进口可以通过在俄国的外国投资来资助。类似的希望也指导着李可夫的机械化计划：

“一个真正的特许权政策将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源用于发展苏维埃俄国的生产力，并将使利用北方和东方广阔空旷地区成为可能...这些地区需要应用高度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技术。”

李可夫认为与资本家的合作和革命原则之间没有矛盾。当无产阶级在欧洲掌权时，俄国将继续主要出口原材料和食品，从而延续了在此期间本将运行的贸易模式。国内旨在恢复

与农民市场关系的尝试也将受益。列宁敦促，未来的特许权获得者应该被迫向苏维埃政府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将俄国重新融入世界的想法激发了对意外之财的奇妙愿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的典型表达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

“外国特许权获得者，在乌拉尔、西伯利亚、顿涅茨地区和高加索北部拥有某些大型企业可供支配，将能够带着数百车皮的粮食、食品、衣物、鞋子、工具以及必要的零件和稀缺设备迅速进入这些地区，并能够提供所需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法令概述了一个暂定的法律框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更详细的政策声明，列举了可能引起外国资本兴趣的众多项目，并随意地驳斥了“自给自足”经济的想法。

1921年3月与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进一步鼓舞了非理性的热情。当第十次党代会在同月召开时，普遍的看法是孤立问题最终正在得到解决。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命运的报告中，加米涅夫解释说，俄国面临“一场在一个国家巩固共产主义的斗争，而且...在政治上是孤立的...我们从未给自己设定在一个孤立的国家中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然而，政治孤立并不意味着经济孤立：

“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并非偶然发展，而是长期历史进程的结果。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是德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食品供应者，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在过去的三年里，欧洲试图依靠自己的资源来维持，没有这些供应。现在我们正达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如果只靠他们自己的劳动，而没有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没有原材料的供应，没有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他们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欧洲的经济。”

融合主义的核心前提，即西方对俄国的假定依赖，成为了党内官方的教条。当加米涅夫否认任何责任的共产党员曾打算建立社会主义俄国，“而不依赖于世界经济、它的发明、它的材料”时，托洛茨基静静地坐着。

会议结束后，列宁立即着手巩固新方案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声称它代表着回归 1917 年末和 1918 年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特许权将成为新混合经济中众多国家资本主义元素之一。这一论点的基础有些站不住脚，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曾见证了通过工人控制制度与私人资本合作的尝试。列宁解释说，当前的任务是“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确定我们如何通过限制来约束它，以确保它在不久的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除了少数几个党内理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外，这些论点似乎都无可非议。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复活“国家资本主义”一词的环境；在 1925 年，同一个口号在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托洛茨基没有立即对列宁的理论合理化做出评论，但很明显他并不认同党新发现的乐观主义。社会主义离不开工业，他认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技术革命的梦想正在分散人们对真正经济计划需求的注意力。一个新的国家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于 1921 年 2 月成立，但其主席职位交给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5 月，托洛茨基向列宁抱怨说，“这个计划委员会或多或少是对处理近期未来的实际和务实计划的否定。”如果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也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工业的需求可能会得到更同情的理解。三个月后，托洛茨基再次敦促主要任务必须是“恢复和加强大规模工业”。如果德国发生了革命，当前的退却就没有必要：俄国将获得“巨大的技术、生产和行政帮

助”。然而，退却正在进行中，8月，托洛茨基否认了工会国家化的概念。后来，他以军事训练会受到影响为由，抵制了动用军队进行经济工作的企图。

在特许权问题上，他的感受没有那么明确。他同样渴望摆脱封锁，他也同意像堪察加或远北地区可以安全地租赁给外国人。用国家地理上的偏远地带换取资本，将涉及很小的政治风险。此外，外国投资比武装干预更可取：如果能吸引美国资本到远东，就可以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一种制衡。

然而，就像1920年2月盟军首次解除禁运时一样，他感到不安。他担心特许权可能被推行得太远，党可能会忘记外国资本的影响将取决于俄国国内复苏的步伐。如果在“长期崩溃”时期施加欧洲资本的压力，就不可能“逃脱欧洲殖民地的命运”。理想情况下，特许权被认为是劳动动员的替代品。但如果俄国沦为殖民地地位，那么“在日本人或其他人的统治下”将会发生第二次“军事化”。“我们将对此无话可说。法国人统治下的黑人不会谈判：他们流血和屈服。”被占领的德国已经成为协约国的“特许权”。波兰正通过更间接的金融纠缠途径遭受同样的命运。至少，托洛茨基似乎相信特许权必须仅限于自然资源的联合开发，而将工业牢牢掌握在苏维埃手中。铁路就是一个例子。正如他在1920年底告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样，可以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无法触及的地方”给予临时租赁；“但我们绝不会将我们的俄国工农铁路网作为一个特许权交给任何人。”

然而，列宁在同一次会议上表示，经济独立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式的错觉，而托洛茨基则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在所有不属于胜利者团伙的国家中，有一个是真正独立的，能够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那便是工农俄国。”在回答人们熟悉的抱怨，说他将机车进口的可能性最小化时，他抗议说，他支持在国外下的订单，并希望这些订单能够得到履行。但依赖它们是不明智的：“我们可能无法收到（机车），因为新的国际纠纷，因为新一轮的疯

狂，这可能会表现为新的封锁时期...同志们，我们没有人拥有预言的天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调整，这强化了他对资本主义意图所持有的这种独特的负面看法。

## 资本主义衰落的周期性理论

由于不相信欧洲会主动促进俄国的复苏，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的一次报告中含蓄地解释了他的怀疑来源。这份报告于 1921 年 6 月发表，专门讨论了资本主义是否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正确解读敌人的行为及其动机，并有助于确定俄国最明智的回应。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托洛茨基提出，必须更清晰地定义均衡的概念。它有三种可能的内涵：首先是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均衡；其次是每个国家的城乡均衡；最后是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或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均衡。

他首先审视城乡均衡，指出了当时欧洲肉类和谷物的短缺。在他的论点中，他将这个问题归因于劳动力短缺；牲畜数量减少；缺乏化肥；制成品供应不足；以及农民为应对战时征用而故意减少生产。由此产生的城乡不平衡是欧洲完全复苏的第一个障碍。

据称，一个更具后果的不平等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它导致了资本的贬值。托洛茨基解释说，在战争期间，实际资本被以货币工具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所取代。国库券、债券和货币发行被用于为战争提供资金。商品的无情破坏导致实际价值与纸面价值不匹配，并推迟了投资：“战争和战后政权都靠牺牲欧洲的生产资本来生存和继续生存。”

但这三个不均衡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层面上的。在 1913 年之前，“世界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持德国、英国和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托洛茨基回到他革命前的帝国主义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再与被人为划分为民族国家的市场相兼容。一场灾难之所以得以避免，是因为战争通过其大规模的破坏，清除了充斥市场的滞销商品。

尽管有战后调整的困难使问题变得复杂，但当前的危机只能在其国际背景下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体现在“世界劳动分工和世界产品交换”中。然而，自1918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战前，帝国主义扩张倾向于将经济力量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进步的历史趋势导致了一个爆炸性的矛盾，现在世界劳动分工已经“从根本上被切断了”。威尔逊对欧洲的干预已经被新一轮的孤立主义浪潮所取代：欧洲和美洲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经济鸿沟。正如托洛茨基所观察到的：“欧洲的购买力已经萎缩。她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换美国的商品...当欧洲正遭受贫血时，美国今天却同样遭受着过剩的痛苦。”

《凡尔赛条约》在欧洲内部造成了关税壁垒的扩散，这使得国际收支困难雪上加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边界和关税壁垒”的欧洲大陆已经被巴尔干化了。贸易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充满不必要的经济瓶颈：“欧洲...将不得不按照最落后、即最破败的地区和工业部门进行自我调整。这将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反向调整。”资本主义的长期衰落是必然的。

然而，无论是长期衰落的证据，还是这三个不均衡的累积效应，都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体系会立即解体。回顾帕尔乌斯早期与伯恩施坦的争论，托洛茨基现在在他之前的单线崩溃理论上叠加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他宣称，资本主义是靠着繁荣和危机的周期而生存的。因此，不应夸大欧洲目前的困境。周期性波动将继续发生；对商业周期的分析意味着西方即将迎来有限的复苏。在这一点上可以向列宁让步。

不过，融合主义者将西方的复苏与俄国的原材料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即将到来的周期性上升，不是由贸易恢复产生的，而是由周期本身所固有的纯粹自主因素产生的。无论有没有俄国，欧洲都不会面临最终的毁灭：

“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以至于欧洲或美洲的帝国主义会为了从资本主义陷入的困境中寻求拯救而向苏维埃俄国投怀送抱...情况还远没有那么糟糕，而我们国家...也还远没有那么破败，以至于能吸引（大规模的）外国资本。”

融合主义者现在已经抢占了单线崩溃理论（除非俄国拯救欧洲），而托洛茨基对周期性现象的关注则得出了不那么乐观的结论。在苏联国内条件改善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将对俄国的困境漠不关心。但俄国的复兴，在没有大规模外国资本流入且新经济政策（NEP）退却的情况下，注定会是缓慢的。另一方面，即使资本家们有此动机，欧洲自身的资本短缺也会阻碍大规模的外国投资。融合主义者试图通过将俄国描绘成欧洲过剩制成品的一个巨大自然市场来避免这个难题。正如克拉辛在 1921 年 9 月所写：

“现在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有数十万辆汽车、数十万台拖拉机，以及各种运输机械、机车、工具、科学仪器、铁、钢等，它们根本没有销路...，一个想法已经开始在最有远见的资本家领导人脑海中形成，即没有俄国的经济重建，就不可能实现这个伟大的世界经济组织的血液健康循环。”

对于这个论点，托洛茨基回应说：“在不久的将来，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重新出现不会对其产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克拉辛陷入了不合逻辑的推论。俄国无法购买，原因非常明显：这个国家因内战和饥荒而变得一贫如洗。美国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认为，俄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真空。事实是，无论出口还是进口，在几年内都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融合主义建立在虚假的假设之上。

由于确信情况如此，托洛茨基。。抵制了将特许权变成另一场轰动事件的任何诱惑。事实上，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特意否认了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导致布尔什维克

领导层分裂的报道。然而，一年后，当国内情况的改善减轻了党的自我怀疑并允许采取更客观的方法时，他坦率地承认了他最初谨慎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特许权政策无限地增长，不断增加和积累；如果我们开始出租越来越多新的国有工业企业；如果我们开始在采矿业或铁路运输最重要的分支中设立特许权；如果我们的政策在特许权的重力滑道上继续下滑几年，那么一个时刻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当经济基础的退化带来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

卸下被迫的沉默后，他继续重申他的信念，即与俄国的合作不会给帝国主义者带来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俄国回归世界经济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国家只有在多年后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大规模的资本进口是不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被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所麻痹，不再能够制定长期的政策。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就会想象英国资本家会竭尽全力把他们的资金投资到俄国；人们就会想象法国资产阶级会把德国技术导向同一个方向（以确保赔款支付）...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情况。”

如果欧洲对苏维埃的福祉没有真正的经济利益，那么近期发生的事件就必须用更险恶的词语来解释。在西方为缓解饥荒所做的尝试被理解为阴谋。1921年8月，托洛茨基声称美国救济总署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个反革命机构。同样，他将“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由前临时政府部长普罗科波维奇创立）与所谓的流亡者阴谋联系在一起。当其他苏维埃领导人转向西方寻求救赎时，他警告了新的军事干预的危险。1921年10月，他将即将到来的时期描述为一个充满惊喜和反复的时期：

“包围圈会收紧，会有新的干预，新的军事干涉，新的攻击和新的扼杀我们的企图。包围圈也会扩张，会有贸易协定。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斗争时期。”

对于西方的无产阶级，他预见到“浪潮会上升，也会下降。这将持续多久很难预测。”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欧洲的变化意味着工人们应该放弃玩弄革命，与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并着手进行更严肃的组建联合政府的工作。至少民主左翼的温和派不会对俄国发起军事冒险。

通过重新唤醒托洛茨基对国际现象的兴趣，这份共产国际报告与战时共产主义的传统有了显著的决裂。俄国的孤立现在被视为一个更大框架的一部分，即一个被倒退势力分裂和区隔化的整个世界。最终，资本主义的衰落将允许更进步的长期趋势重新显现，以一种新的统一性恢复破碎的世界经济。但在那之前，预言是徒劳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时期，凡尔赛的理想与历史进程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别无选择，只能谨慎等待，直到国内外的事件呈现出更明确的模式。天真地恳求外国援助可能会是灾难性的。特许权可能会成为一个特洛伊木马。

## 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冲突

党内融合主义共识的出现，并没有阻止其他人分享托洛茨基的疑虑和担忧。列宁的笔记提到了布哈林最初的怀疑。卡尔·拉狄克担心俄国可能会沦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无产阶级可能变得与“白人黑奴”相差无几。在他看来，劳合·乔治和其他协约国首领们指望着重特许权获得者来承担俄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担心，社会主义国家与外国资本的“不自然联盟”可能会破裂，并被“后者与俄国所有资产阶级力量之间的自然联盟”所取代。然而，少数派的批评无人理会。

1921年末，列宁在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身上找到了一个新的门徒，他迅速脱颖而出，成为融合主义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索科利尼科夫比托洛茨基小几岁，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于1922年初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在这个职位上，他成功地将新的国际观转化为

具体的政策目标，旨在加强国内新经济政策并与农民建立稳固的市场关系。索科利尼科夫对未来充满无限信心，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泥足巨人”。欧洲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它被俄国的原材料所拯救”。作为新乐观主义的完美代言人，他向党的领导层保证“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普遍哀号是‘我们的救赎在俄国’”。

对托洛茨基来说，这种毫无根据的热情既荒谬又危险。在 1921 年 12 月下旬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他告诉代表们，资本主义将经历有限的重建。欧洲可以期待“商业-工业复苏的真正迹象”。最近的事件没有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本质上，对俄国的封锁仍在继续。”

索科利尼科夫因为知道列宁的完全支持，对这种悲观观点反应激烈。他指责托洛茨基过于迷恋数据和统计，以至于未能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欧洲正处于一场普遍的危机中：

“如果说工业复苏现在正在开始，那将意味着它是在没有你我，也就是没有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下开始的，没有资本主义世界被迫与我们达成协议。但如果工业复苏的开始，是在没有资本主义美洲和欧洲被迫与我们建立某种协议的情况下，那将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我们不需要去启动资本主义机器。”

当然，在索科利尼科夫看来，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对革命的悼词还为时过早。因此，他的结论与托洛茨基的结论恰恰相反：

“我们的观点如下：资本主义没有经历任何工业复苏，而且没有我们它就无法运转。整个欧洲都在为此而哭喊，任何关注欧洲媒体的人...都说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在哀叹，除非俄国发挥作用，否则他们无法摆脱经济危机...这就是他们被迫与我们达成协议的原因。”

托洛茨基认为，在这表面上的浮夸背后隐藏着一张投降主义的空头支票。他提醒代表们，索科利尼科夫是 1918 年《布列斯特条约》的苏维埃签署人。凭借在国际事务中如此令

人厌恶的训练，“他（索科利尼科夫）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托洛茨基随后质疑为了换取正常关系而将从俄国榨取的价格——协约国将要求取消共产国际、放弃高加索的产油区、解散红军。如果这些“小小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新的军事干预就不能被排除。

1921年12月这场激烈的争论，是托洛茨基和索科利尼科夫之间众多此类争论中的第一次。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声称，“工业经济状况的上升，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落和革命时代的进程，比某些简化主义者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索科利尼科夫也同样固执。在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他辩称欧洲的危机仍在继续；资本主义可能自行实现新均衡的想法是荒谬的；它忽视了现实。事实上，“战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没有稳定，没有稳定性。声称有稳定将是最纯粹的幻想。”很明显，这是党希望听到的预测。索科利尼科夫的优势通过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正式确定。托洛茨基被排除在经济议题之外，留下来监督战时部门的和平时期的运作并抚平他的怨恨。

索科利尼科夫坚信战时共产主义是对历史的歪曲，并开始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清教徒式的孤立”只会产生一个结果：“贫困的共产主义。”然而，与李可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不同的是，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对进口用于工业的机器或用于电气化的技术设备兴趣不大。他赋予对外贸易的角色是由1920年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决定的。1921年的一场干旱带来了灾难性的歉收，除非能通过提供消费品来鼓励农民生产，否则政权的生存将受到威胁。通过恢复国内工业这种迂回途径来满足农村的需求似乎是不可能的。时间至关重要，索科利尼科夫斩钉截铁地要求从国外获取制成品。

他认为，贸易的主要障碍在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在克拉辛领导下的笨重机制。为了改善出口的惨淡记录并获得外汇，他提议解散这个官僚垄断机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混合公司”体系。这些公司将由外国资本家与苏维埃政府合作出资，并通过关税制度进行调节。

不太直接的控制似乎符合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1921年末，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批准了这项措施，呼吁工业和合作社在此基础上与西方重新建立自己的直接商业联系。这项改革只进行了一半，因为它允许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继续进行贸易业务。尽管如此，克拉辛部门的权力在1922年3月被进一步削弱。同月，一项批准混合公司的法令颁布，从而落实了由索科利尼科夫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当有两家这样的公司在木材工业中获得了荷兰和英国资本的帮助时，这项政策首次显示出成功的迹象。

除了为进口提供资金，通过关税收入赚取的外币还旨在支持俄国自身回归一种经过修改的金本位制。从粮食征用转向实物税，使农民在缴纳税款后能够处理他们的农产品。最初希望这个过程可以局限于地方规模的“商品交换”，因为以物易物在意识形态上比正常的商业交易更不应受到谴责。但是耐普曼的回归意味着传统资本主义做法的巩固。因此，没有一个可靠的货币单位，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就无法进行。当农民收到的钱因猖獗的通货膨胀而在他们花掉之前就失去价值时，他们就不会扩大谷物和工业材料的生产。同样，如果有一个稳定的记账单位，工业中的“经济核算”制度才能实现合理的生产。

索科利尼科夫不认为俄国的货币有必要在内部可兑换成黄金或外汇。国家掌握的硬通货储备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足以恢复国内信心。一个金属担保的真正基本原理源于更具冒险精神的目标，并突显了这位财政人民委员方案的统一性。资本家们显然不会接受苏维埃纸币；而对外贸易也不会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增长。因此，索科利尼科夫的最高抱负，秉承其沙皇前任的传统，是利用一种在欧洲证券交易所可接受的货币，来象征俄国重新获得的稳定性和信用度。这个目标是他个人对托洛茨基早期机车建造计划的对应。虽然它激发了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的活力，但却引起了他的批评者的沮丧。斯特鲁米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

既不认同他的融合主义愿望，也不认同他对硬卢布的设计，将对黄金的迷信视为一种奢侈且完全不理性的古怪行为。

索科利尼科夫在特许权问题上的立场可能比他的货币改革计划更具煽动性。当该方案在 1921 年产生微薄的结果时，他计划一举实现两个主要目标。通过租赁制造业以及自然资源矿床，他将同时重新激活闲置的工厂，并减少支持摇摇欲坠的托拉斯所需的通货膨胀补贴。这个建议被巧妙地提出，以消除任何反对意见。所涉及的工业不会被国有化；它们将简单地转换为类似于混合公司的合资企业。前所有者将被允许购买“参与权”，从而消除达成友好国际和解的最后一个障碍。

一旦同盟国政府摆脱了本国被没收公民的压力，索科利尼科夫相信他们会追求自身利益，并向俄国提供一笔可观的贷款。1921 年 12 月，西方已经提出了一个短命的项目。这是为了建立一个跨国财团，其目的之一是在俄国进行投资。该计划后来被庞加莱否决，但在此之前，它已经为融合主义者的主要论点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即欧洲和俄国是相互依赖的。第十一次党代会确信回报的巨大将完全证明风险是合理的，因此谨慎地接受了将外国资本引入国有企业的必要性。在各国为规划欧洲重建而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前夕，这位精力充沛的财政人民委员就这样完成了俄国的准备工作。除了拉林（Larin）的一次耸人听闻的爆发之外，党纪压制了国内的分歧。

就在热那亚会议召开前不久，列宁宣布，国家即将经历一个新的考验，“由俄国和国际市场设定的考验，我们受制于它，我们与它相连，我们无法将自己孤立于它之外。” 1922 年 4 月，考验的性质变得更加清晰。前住意大利解释俄国和解立场的契切林，同意承认对沙皇时期债务的责任。但和解必须基于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公式：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同盟国给予政府信贷作为回报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承认债务。

在一份致劳合·乔治的照会中，契切林表示，只要给予财政援助，俄国准备要么恢复国有化财产，要么在不可能恢复的情况下与前所有者达成“相互协议”。在私下交谈中，契切林的副手李维诺夫似乎已经建立了一个可接受的交换条件。如果英国还能为荷兰皇家集团获得一项石油特许权，他们就会认为相互协议是令人满意的。有一瞬间，苏维埃的希望上升了，认为索科利尼科夫的预测将得到证实。然而，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因为风险比英国人更大，除非完全恢复国有化财产，否则他们什么也不会同意。会谈陷入僵局。各国拒绝提供贷款，而俄国于5月11日发表的声明有效地结束了会议进程。

6月，第二轮讨论在海牙举行。在这里，李维诺夫提交了一份精确的油田、矿山、化工和电气工业以及其他潜在外国投资领域的清单。他甚至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同意接受带有政府担保的非官方私人信贷。然而，在两次会议之间的几周里，美国的压力说服了英国放弃了他们获取独家石油特权的企图。他们现在也支持法比两国的立场。俄国在两次会议后唯一的成就是与德国在热那亚签署的《拉帕洛条约》。除了对军备工业的援助之外，德国没有能力提供所寻求的那种或那种程度的帮助。

随着热那亚会议的失望，俄国突然再次被推到一个完全依赖国内经济的位置。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没有一位最杰出的党领导人曾考虑过会议可能会以如此彻底的失败告终。一夜之间，李可夫、列宁、克拉辛和索科利尼科夫的夸大预测被无可辩驳地驳斥了。由索科利尼科夫设计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协调体系的理论基础消失了。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孤立主义极端和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的单一融合主义之间剧烈摇摆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两种取向的元素必须结合起来，以寻求一个可行的妥协方案。

## 四、寻找新的信条

本书的前三章考察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孤立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融合主义。这两种国际观及其相应的政策体系，为接下来逾五年之久的政治冲突提供了经济背景。虽然已有不少优秀著作专门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史，但没有一部从这种经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材料。正因如此，它们都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冲突的起源或意义。用这种视角来解释政治事件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自己就坚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也许这句名言如果反过来说会更准确；也就是说，经济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但事实是，这两个行动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 1922 年至 1928 年间从未如此明显。

党的纯真时代于 1922 年春天结束。此后不久，列宁的绝症引发了其潜在继任者之间为争夺全面政治权力而进行的一场恶毒且旷日持久的斗争。经济政策几乎立刻成为争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列宁曾带领他的追随者进入荒野，却在能将他们带出荒野之前就去世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需界定。一种信仰最初催生了对确定性的渴望，最终则滋生了一种以武力补充的混乱。这种混乱始于 1922 年索科利尼科夫的失败，直到 1924 年底斯大林宣告“一国社会主义”的新正统观念时，混乱才得到部分缓解。

### 热那亚会议后的再评估

当索科利尼科夫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早期形式时，他刻意将融合主义与恢复俄国农业经济联系起来。国内经济失衡将通过进口消费品来为农民纠正。在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业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低优先级。一旦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的计划失败，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村地区，除了官方的善意承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内部紧张局势重现的所有先决条件都已存在：党内领导人无一人能够立即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索科利尼科夫暂时被迫承认他的计划在内部遭受挫折。他所指的是“正在持续、变得更强的挫折”，并且“目前的重点在于最终成功实现货币稳定”。在1922年11月，他最终成功发行了第一批切尔文券（chervonets），这是一种有黄金担保的新货币。他希望外国对俄国未来的信心最终能得以恢复，从而允许通过在欧洲市场出售证券来引进资本。<sup>2</sup>在那之前，他承诺不会为了外国信贷而进行资本化。<sup>3</sup>

列宁的幻灭感则更为强烈。在1922年9月中旬，他告诉第五届全俄工会大会，“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漫长而极其艰辛的道路，即慢慢积累我们的储蓄，并提高税收，以便能够逐步修复我们被毁坏的铁路、机器、建筑物等。”在对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的讲话中，他声称关于特许权的骚动“几乎不比写它的那张纸更有价值”。他认为，俄国现在必须通过自身的“独立”努力来恢复。<sup>4</sup>在1922年10月，他推翻了中央委员会接受与莱斯利·乌尔夸特（Leslie Urquhart）和俄亚联合公司（Russo-Asiatic Consolidated Company）达成特许协议的决定。乌尔夸特曾要求对内战期间从他曾拥有的矿场开采的矿物进行赔偿。列宁拒绝接受这个先例。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与热诺瓦（Genkova）和加米涅夫（Kamenev）则认为应该抓住乌尔夸特的提议。季诺维也夫已经确定俄国在债务和国有化问题上不会让步。托洛茨基急于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准备好保持理智。甚至在热那亚会谈结束前，他就同意与个别资本主义利益方进行“单独交易”和“实际妥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sup>5</sup>当一项初步石油特许权被授予一家美国公司在北萨哈林（目前由日本控制）时，他像他曾说过的那样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在近期会议上的行为表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情绪会阻碍形成统一战线。为了利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劳合·乔治同意达成一项“军事-政治”协议，就可以给予他所要求的石油特许权。<sup>6</sup>

尽管他的态度变得不那么消极，但这位军事人民委员仍然将俄国视为一座“被围困的堡垒”；只有当特许权足够现实，能够接受现行秩序时，才能被接纳。否则，最好的政策是“在不过度紧张的情况下，等待资本家们情绪上的改变”。<sup>7</sup> 无论有没有援助，社会主义的建设都将继续：

“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和贷款时，我们指的是加速我们的增长和恢复的步伐。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涌入将使我们能够更快地克服混乱和贫困。没有它们则意味着更大的痛苦、贫困和更慢的发展——仅此而已！我们正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谈判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对世界资本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展示了我们无法用它的铁拳来粉碎我们。<sup>8</sup>”

特许权计划迄今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将来也不会与资本主义和解”。<sup>9</sup>

为了完成他的概括性总结，党内多数派托洛茨基也开始意识到国内新经济政策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1922年秋季的丰收为遵循列宁的建议、提高税收和实施一项“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计划提供了机会。富裕的农民和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特别是国内的富农（新兴的资本家），可能会被迫资助社会主义工业。如果市场得到适当的引导和控制，它甚至可能为投资决策提供一个理性的指导。艺术（原文应为 Upturns）只能通过瓶颈和军事需要来影响剧烈的调整。但统一工业核算产生的数据将使查明最高效的企业并集中生产成为可能。成本降低可以通过标准化实现；优先原则可以被投射到市场环境中。<sup>10</sup>

然而，只有当新经济政策服从于一项计划时，它才能被转变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1922年2月，托洛茨基写信给列宁，坚持认为**经济核算**（khozraschet）体系必须通过中央组织的簿记来完成。<sup>11</sup> 5月初，他的抱怨激怒了列宁，后者否认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不参与日常工业管理而遭受‘学术方法’的困扰”。<sup>12</sup>

托洛茨基对工业需求的顽固执着，不可避免地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关系恶化。在 1922 年春天，工业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洗劫”（razvorovivanie）或“大肆破坏”的严重资本消耗时期。由于前一年的歉收，大部分农民无力购买制成品。为了维持市场，各托拉斯通过一系列降价来耗尽其资产。1922 年早些时候，市场营销集中到辛迪加手中，价格得以稳定。1922 年的丰收扭转了局面，创造了一个卖方市场或“商品荒”，并使辛迪加能够抬高工业品价格。但由于工厂的开工率远低于满负荷，成本仍然异常高，损失也在继续。索科利尼科夫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他竭尽全力减少工业补贴，以实现货币稳定。

毫无疑问，如果市场要以他所提议的方式服务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理解货币克制的重要性。在 1922 年 10 月一次鲜为人知的对工会听众的演讲中，他以一种堪比财政人民委员本人的口吻提出了反通胀的观点。<sup>13</sup> 1922 年秋，他再次强调，市场必须有一个普遍等价物。“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个普遍等价物（货币）状况相当糟糕”。<sup>14</sup> 即便如此，工业的货币需求仍然是第一位的。托洛茨基抗议称财政人民委员部正在破坏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剥夺了对金融政策的任何控制权，财政部的做法是以“混乱、脱节和进一步的崩溃”为代价来平衡预算。国家计划委员会，而不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才应该是“直接控制、连接、规范和指导经济”的机构。<sup>15</sup> 只有中央计划机构才可能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广阔视野。

据说，财政人民委员的视野被纯粹的货币考量所蒙蔽，以至于他对经济中起作用的真正因素不敏感。当时，农业收成已达到战前标准的 75%；而工业生产的相应数字为 25%。如果不能恢复更合适的比例，过剩的农民购买力，以可销售的谷物形式存在，将为私营企业、“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提供肥沃的土壤。

“每个经济体只有在其各个部门之间存在某种比例时才能存在和增长。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动态和相对关系。必须存在某种比例……农业与工业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关联。”<sup>18</sup>

事实上，托洛茨基和索科利尼科夫都只掌握了部分真相。财政人民委员明白，持续的通货膨胀会阻碍农民进入市场。他希望通过谷物出口换取外国商品，从而为农业提供真正的激励。托洛茨基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为了工业保护主义而抵制消费品进口，并认为农民会忍受短缺，直到苏联工业扩大生产。1922年底，这些意见分歧导致了一场关于贸易垄断这一悬而未决命运的决定性争论。

## 保护主义与计划

这场关于贸易垄断的新争论最初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继承自过去，并由战时共产主义与早期新经济政策的融合主义之间的对比所引发。这场争论的界定将取决于在列宁继承斗争初期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两种相互矛盾的世界观之间的不兼容性产生了其首个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政治后果。

在贸易垄断最著名的捍卫者中，有两大主要工业保护主义者群体。首先是工会成员，例如霍尔兹曼（Holtzman），他表达了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的恐惧。在1922年5月和6月，霍尔兹曼声称对外贸易是资本家的阴谋，欧洲以俄国的“朋友”自居，坚信不受控制的外国商品涌入苏维埃共和国会消除任何独立的工业增长机会。<sup>19</sup> 什利亚普尼科夫

（Shlyapnikov）也持类似立场，指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在下令削减苏联生产时，进口机车、铁轨、管道和其他物品是愚蠢的。<sup>20</sup> 1922年，托拉斯的混乱状况促使拉林、皮达可夫、米柳京、博格丹诺夫（新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工业发

出了无数次呼吁。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第二个群体的核心，这个群体很快发展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

托洛茨基对保护主义机制的理解，源于他对《总结与前瞻》中关税政策的分析。他相信，如果贸易垄断被削弱，那么“比例性”和计划都将无法实现。计划者将无助地被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突发奇想所左右。他写道：“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人知道并决定可以进口什么，必须出口什么，以及必须保留供我们自己使用的东西。”<sup>21</sup> 这种重大决策不能委托给私人商人、合资公司，甚至不能委托给国有企业；它们必须由中央决定和实施。只能在“被工人国家认为可取的限度内”向农民提供廉价的外国商品。<sup>22</sup> 他从计划和生产而非消费的角度评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急于克服融合主义的偏见，并以明确的经济边界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化。

然而，贸易垄断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苏联工业，而是为了集中国家的购买力，以打破封锁并获得尽可能好的贸易条件。索科利尼科夫认为，一套关税和合资公司的制度能更好地服务于俄国。他在其著作《国家资本主义与新金融政策》(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New Financial Policy) 中解释了他的立场：

“无产阶级国家代表了一条将俄国内部的小商品生产者与世界市场隔开的经济界线。它站在他们和……世界资本之间。然而……如果将这条‘界线’变成一道长城，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以阻止资本主义关系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溢出’到俄国田野的农民海洋中，那将是错误的。”<sup>23</sup>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索科利尼科夫坚持不懈地试图削弱克拉辛的部门。热那亚会议后不久，克拉辛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抱怨，莫斯科正在掀起一场困难的“大惊小怪”。<sup>24</sup> 在财政人民委员的鼓励下，工业经理和部门负责人组织了一场针对剩余

的进口数量管制的持续批评。1922年10月，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仅能对一些中央和地方机构的独立交易行使否决权。这些改革的灵感显然来自索科利尼科夫最近就此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在他新的建议中，财政人民委员包含了“暂时”允许在某些边境，某些商品可以没有任何直接监管地流通。彼得格勒和新罗西斯克的港口将完全脱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这些改革获得了中央委员会在10月6日的一项决议通过。

列宁因中风未能出席会议。近几个月来，失业和保护主义压力已让列宁担心国有工业正被危险地忽视。<sup>25</sup> 当他得知这一决定时，他立即起草了一封致党书记斯大林的抗议信，认为关税收入永远无法与垄断所带来的收入相媲美；尽管索科利尼科夫确实将他的项目描述为临时的，但列宁认为它们等同于破坏垄断。“索科利尼科夫同志一直在试图达成这一点，他成功了。他一直支持这一点；他喜欢悖论，并且总是试图证明垄断对我们不利。”<sup>26</sup>

列宁突然抛弃了财政人民委员，就像他曾经抛弃托洛茨基一样，他将自己的信与克拉辛对索科利尼科夫提议的反驳一同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中传阅。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这一举动收效甚微，地位较低的人看到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斯大林评论说：“列宁同志的信没有说服我……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误的。”<sup>27</sup>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同样支持财政人民委员。这个小集团很快催生了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

在列宁反对之后，最终决定被推迟到定于12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1922年12月12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列宁，提议结盟。信中建议，贸易计划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和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执行。<sup>28</sup> 列宁回信说，除了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上的细微分歧外，“你我之间达成了最大程度的一致。”他同意托洛茨基应该捍卫他们的共同立场。列宁写信给克拉辛的副手弗鲁姆金（Frumkin），表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必须单独

讨论，尽管我敢说，如果他将他的要求限制在提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在国有工业的旗帜下，应该对工作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那么托洛茨基和我可能不会有分歧”。<sup>29</sup>

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冲突，列宁第二次写信给斯大林，反驳了布哈林为支持索科利尼科夫而提出的各种论点。列宁担心，削弱垄断不仅会像所提议的那样，允许私人资本获取本应归属于国有工业的利润；但更糟糕的是，工业复苏将变得不可能。<sup>31</sup> 反垄断派对列宁的毫不妥协感到惊讶，试图推迟这场关键会议，直到这位党的领导人能够出席。列宁不愿听到这个主意。抵抗瓦解了，列宁口述了一封信给托洛茨基，祝贺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地取得了胜利。<sup>32</sup>

这次胜利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列宁的——不是托洛茨基的。而且，矛盾的是，其影响不是为了加强托洛茨基在党领导层中的地位，而是灾难性地削弱了它。这位军事人民委员密谋挫败中央委员会合法决定的恼人景象，只会证实人们对他即将到来的接班人斗争中可能抱有的野心的怀疑。党的领导集体已经两极分化。一边是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是布哈林、索科利尼科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列宁在 1922 年底第二次中风（紧接着是第三次）后，这种最初的政治分歧演变为更明确的派系联盟。由于对托洛茨基的恐惧和嫉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联手，形成了一个互相防御的同盟。三驾马车仅凭三票就可以使政治局陷入僵局。如果得到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托洛茨基早期的敌人——的支持，他们就能彻底孤立这位军事人民委员。

如果托洛茨基是一位更老练的政治家，他本可以获得继承权，或者至少推迟自己的政治没落。即使在那个早期，斯大林也是三驾马车背后的真正权力。季诺维也夫更华而不实且广为人知，但却很迟钝。加米涅夫虽然头脑更敏锐，但缺乏意志和野心。列宁在病床上为托洛茨基提供了可能导致斯大林垮台的议题。1923 年 2 月，列宁对斯大林监督下发展的党机

器进行了一场毁灭性的批判。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尽管政治局其他成员试图压制，这份文件还是被发表了。一个更精明的政治家会抓住这个机会，以列宁的忠实弟子自居，大声而愤慨地谴责这种奸诈的不忠行为。但托洛茨基让这个机会溜走了。3月5日，列宁再次请求托洛茨基继续担任他的喉舌，攻击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托洛茨基依然无动于衷。

历史学家们对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无能进行了大量猜测。被提出的解释主要包括他虚假的安全感以及对他智力上不如他的人的蔑视。然而，更可能的解释是，托洛茨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兴趣，超过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望。一旦贸易垄断问题得到解决，他就急于在更宏大的层面上重新定义新经济政策，根据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来重新制定内部政策。三驾马车看到了这个弱点，于是故意鼓励他们的对手，让他以为只要达成政治休战，他就可以在经济政策上获得完全的自由。这个策略源于1923年初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1920年的记忆依然鲜活：当时托洛茨基同样忽视了明显的政治困境迹象，只为推行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措施。

现在与索科利尼科夫结盟的斯大林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他提议改组经济机关，从而增强财政部门的影响力。劳动与国防委员会（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将与副总理团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合并，创建一个新的最高决策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两个本应偏向工业利益的机构，被排除在拟议的安排之外。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斯大林就能在政治上完全控制财政人民委员；如果失败，他还有其他选择。

托洛茨基立即抗议，称该项目是“财政与工业之间普遍存在的‘不正确关系’”的组织表现。一场“金融独裁”将意味着持续无视苏联工业的资本需求。卢布太不稳定，无法像索科利尼科夫所希望的那样来调节市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处于行政中心。为了确保其工作是实际而非“学术”的，这个计划机构应该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共同设一位主席。<sup>33</sup>

它的决定应该具有法律效力。<sup>34</sup> 至于计划者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类似于总参谋部与最高军事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当原则问题解决后，具体操作决策应该留给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这些反建议，斯大林将他的阴谋推进到第二阶段。托洛茨基最近一直主张将国家计划委员会置于党的一位政治领袖的领导下。由于目标是让计划者和工业在最高决策层拥有直接发言权，不难想象托洛茨基希望看到谁承担这一责任。当时，每位副总理都名义上控制着一个或多个政府部门。斯大林两次建议托洛茨基接受他在 1922 年两次拒绝的副总理职位。然后，他可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行使管理权，甚至成为它们的主席。<sup>35</sup>

托洛茨基陷入了一个没有可接受行动方案的境地。如果他拒绝这个提议，他将把经济控制权拱手让给索科利尼科夫，失去批评的道义权利，并显得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本可以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以如此明显的干劲行使的部分影响力，可能会永远失去。但如果他接受，他肯定会招致列宁的愤怒，并危及他最近与这位病重的党领导人达成的和解。众所周知，列宁认为克日扎诺夫斯基是管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最合适人选。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列宁认为托洛茨基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担心他过于倾向于“管理主义”

(administratorstvo)。<sup>36</sup> 一个更适合他、争议较小的职务，可能是像教育这样的部门。

<sup>37</sup> 实际上，斯大林是在建议托洛茨基拿列宁的死亡来赌博，做出第一个明显的分赃举动，并招致一个“过早申诉遗产之人”所应得的所有谴责。此外，即使他做出积极回应，能否获得真正的权力也是一个问题；三驾马车仍然控制着政治局。出于希望（或害怕）列宁可能还会康复，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

如果他当时知道列宁思想的最新方向，托洛茨基的决定可能就不会如此困难。列宁对索科利尼科夫“国家资本主义”的解读感到幻灭，他已经承认这个词必须按“字面意义”来解释。<sup>38</sup> 在1922年12月底的一系列笔记中，列宁还表达了通过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来“朝着托洛茨基的计划方向发展”的愿望。<sup>39</sup> 计划者的决定将具有约束力，除非被最高政府机构推翻。有了这些文件，托洛茨基本可以在不承担任何个人风险的情况下让他的对手感到困惑。然而，这些笔记直到1923年6月才为人所知。因为列宁曾要求不要发表这些笔记（这可能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他个人反复无常的更强烈印象），斯大林成功地将它们悄悄压制了。

在托洛茨基1923年初的激进反应之后，斯大林一度急于避免引起太多怀疑。作为一种“和解”姿态，他显然鼓励托洛茨基担任2月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旨在规划工业政策。托洛茨基因此被安抚并被转移了注意力。托洛茨基接受了这项提议。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决定将使党陷入一个僵化的经济分歧，这恰好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完全对应。

在国家复苏过程中，农业或工业应扮演主导角色，两种思想流派已然形成。从他早期融合主义的模糊遗产出发，索科利尼科夫持有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在农村购买力得到充分扩张之后，工业生产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并最终得到所有托洛茨基敌人的拥护。工业支持者的立场则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当工业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消费品时，才能避免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如果商品短缺被允许继续，尽管1922年大丰收，谷物和原材料的生产仍会再次下降。他们以保护主义为由排除了大量进口的可能性，并认为索科利尼科夫通过削减对托拉斯的补贴来稳定货币的计划是自杀行为。然而，他们急于弥补“洗劫”造成的资本消耗，却未能注意到辛迪加正在把价格抬得太高，以至于即使是适度生产的商品也无法售出。农民对飙升的工业品价格的抵制，正导致

市场崩溃。如果热那亚会议意味着国家的增长必须主要依赖自给自足，那么这些矛盾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因此，一个命运多舛的工业委员会被任命成立。

托洛茨基接受委员会主席一职后，建议允许托拉斯以固定资产作抵押来换取营运资本贷款。托拉斯之间可以互相提供信贷，如果无法偿还，较弱的托拉斯将落入较强者的手中，从而形成更有效的垂直整合。<sup>40</sup> 但在斯大林投下决定性一票后，这项提议被否决了。1923年2月下旬，委员会扩大了规模，加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的忠实支持者皮达可夫。但力量对比悬殊：李可夫、索科利尼科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同时被吸纳。<sup>41</sup> 后面这些人全都无意支持他们名义上的主席。最终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僵局。

该委员会在3月提交了其最终的论文草稿。其中充满了妥协和犹豫不决。对索科利尼科夫的金融方案的认可，被一种要求工业“大力发展”的呼声所抵消。关于工业不能落后于农业的警告，与“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最紧密的依赖关系”这一观察并列，显得格格不入。一个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措辞谨慎的部分，使用了“总参谋部”和合资公司这样的说法。<sup>42</sup> 简而言之，这个委员会只取得了一项成就：它加剧了现有的意见分歧。对立的双方都决定在1923年4月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各自的论点。

## 第十二次党代会

在对大会的开幕致辞中，季诺维也夫就每一个主要争议点阐述了三驾马车的立场。他支持索科利尼科夫，宣称：“列宁说新经济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这完全正确，它首先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行联盟。”<sup>43</sup> “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必须从农民经济开始。”<sup>44</sup> 农民问题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

题”。<sup>45</sup> 显然，不能通过重税和社会主义积累来牺牲农民以发展工业。此外，特许权计划已经带来了三千万金卢布。从外国来源积累资本的希望绝不能被否定。

与此同时，党应该避免托洛茨基所倡导的那些冒险的计划。列宁本人曾“嘲笑一些对‘纸上’计划过于兴奋的同志。我们从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日常工作中知道，没有人像他那样嘲笑那些‘新’、‘伟大’、‘肥大’的‘计划’。”<sup>46</sup> 只有两个计划是名副其实的：电气化和索科利尼科夫的预算。一场“工业独裁”会破坏货币稳定并危及联盟。目前关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言论是鲁莽的。没有必要放弃一项正确的政策，只需要发展它，使其更精确。

托洛茨基关于工业的报告以令人信服的论点回应了季诺维也夫的陈词滥调，他指责新经济政策迄今为止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大型工业已被证明无法与小生产者竞争。由于1922年的丰收，工业品价格飞涨，而农产品价格却在下降。由此产生的“价格剪刀差”必须通过降低工业成本、合理化和集中生产以及使用适当的会计技术来弥合。预算应被视为总体计划的一个从属部分。对重工业的预算补贴必须继续，银行信贷的衡量标准应该是长期的盈利能力。索科利尼科夫以向轻工业贷款的形式发行了第一批切尔文券，并期望能快速收回。托洛茨基讽刺地指出：“融资必须基于对未来多年的预见，而不是仅仅因为一家香肠厂正在盈利就决定它有权获得信贷。”<sup>47</sup> 还有一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更重要的工业；特别是为军事提供需求的交通和冶金。

托洛茨基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对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表述，这可能导致误解”。<sup>48</sup>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修正市场，还需要克服市场：

“归根结底，我们将把计划原则推广到整个市场，从而吞噬并消除它。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取得的成功会自动走向它的消亡，被一种更新的经济政策所取代，而那将是一种社会主义政策。”<sup>49</sup>

索科利尼科夫对托洛茨基的回应进一步破坏了脆弱的政治休战。为了维持市场激励并增加农民收入，这位财政人民委员认为，对农民征收最低限度的税收“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符合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符合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sup>50</sup> 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迈进需要剥夺工业的补贴：

“我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透明……如果我们选择不从农民那里拿走十万普特谷物，这意味着明年我们将剥夺我们的冶金、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工业、我们的交通……来自国家资源的六万卢布的支持。”<sup>51</sup>

在关于农业的报告中，加米涅夫也辩称，政权的稳定取决于联盟，而非某种虚构的“工业独裁”。<sup>52</sup> 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那么无论纸上写了什么样的计划，工业品销售危机都将不可避免。无论如何，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无论制成品来自何处，其供应量的增加都有助于降低工业品价格。而靠通货膨胀致富的剥削性高利贷者，才是更合适被敌视的对象。

加米涅夫正确地看到了托洛茨基立场中的内在矛盾。如果社会主义要通过对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征税来提供资金，那么似乎应该在某些限制内鼓励后者发展。同样，如果没有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的服务，销售危机也无法避免。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此外，托洛茨基似乎误解了货币稳定优先于工业扩张的逻辑顺序。如果要通过核算和合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核算单位。正如李可夫后来所说，制定一个虚构的计划是件简单的事：“当我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时，没有什么

比获得一个计划更容易的了。每个部门和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的文人。你给他打电话，计划在字面上三个小时内就准备好了。” 一个真正的计划，依赖于资金、组织和信贷，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sup>53</sup>

在几乎所有争议点上，对立的领导人只能同意彼此存在分歧。工业委员会论文中的不一致之处被允许重新出现在国会决议中，这些政策继续漂浮不定。只有一个提议获得了普遍共识：无论复苏之路如何，都必须动员国家的谷物储备用于出口。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大丰收的迹象预示着俄国自身的稳定，因此他现在不那么不愿接受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谷物销售将提高农产品价格指数，并有助于缩小剪刀差。同时，俄国可以迈出谨慎的第一步，回归《总结与前瞻》中讨论的贸易模式。欧洲的持续复苏意味着可以恢复机械进口。一场“谷物封锁”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无法支付北美作为战前俄国供应替代品的费用。苏联谷物可以用机械和制成品来支付，其中制成品的采购量将尽可能地少。

托洛茨基通过限制消费品进口，希望避免俄国农民与欧洲资本家之间的联盟。因此，降低工业品价格变得尤为重要。国内外价格的显著差异会导致走私，并颠覆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托洛茨基对走私的恐惧变成了一种痴迷。在党代会上，他概述了这种危险：

“如果内部和外部价格之间的差异超过了某个限度……走私是不可避免的，同志们……走私会破坏和冲垮垄断……如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被一种宿命论的心态所感染，如果它容忍这种状况太久……他会说：‘开放边境’，‘打倒这种对外贸易的宿命论’；他想要廉价商品……那么，如果农民说：‘打倒对外贸易垄断’——那将比我们在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和犹豫要糟糕得多。”<sup>55</sup>

尽管托洛茨基对贸易垄断表示了这种焦虑，但他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关于俄国与欧洲贸易潜力的评论，标志着他进一步实质性地脱离了早期的孤立主义观点。在这方面，这份关

于工业的报告是一份重要的过渡性文件，预示着他随后朝着坚定的融合主义方向发展。然而，这种演变又过了两年才完成。在 1923 年，托洛茨基坚信，贸易的恢复绝不能掩盖来自国外的军事威胁。

随着帝国主义力量的恢复，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意也会增长。1923 年 1 月法国对鲁尔地区的入侵表明，军国主义仍在欧洲游荡。2 月 15 日，托洛茨基曾警告说：“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冲击的时代不会持续数月或数年，而是数十年，它将在短暂的喘息之后，以新的、日益严峻和痛苦的痉挛笼罩世界。”<sup>56</sup> 几天后，他指出俄国正在建设其武装力量，“这是在深刻认识到，只要阶级社会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前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时代告诉我们，武装冲突之间的间隔，通常比我们预期的要短。”<sup>57</sup>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似乎还不太可能发生；欧洲工人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类似于俄国斯托雷平时期的阶段。最好的情况是，苏联政府可以通过贸易利用这一过渡时期。外国投资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将无法克服其货币危机。<sup>58</sup>

托洛茨基对谷物出口的支持与索科利尼科夫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兴趣相符，本应消除一个敌意来源。但索科利尼科夫最近也在对自己贸易观点进行重新评估。在 1922 年底与保护主义者的不成功对抗之后，他被迫放弃了进口外国制成品的想法。到 1923 年春天，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反驳批评者关于贸易会加剧工业失业的论点。俄国可以通过购买原材料和半成品，让本国闲置的工厂重新投入运营。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业专业化已经消失了。曾经用于种植工业作物的土地被转为种植谷物或被弃耕。通过进口原材料，可以为农民提供消费品，农业最终将恢复正常。正如索科利尼科夫在大会上所说：

“如何为我们的工业提供棉花，为我们中部地区、为我们的制造业提供工业材料？只有通过以下方式：……在突厥斯坦的棉花生产恢复之前，我们必须出口谷物并用获得的货币

在国外购买棉花。这样我们就能确保纺织工业的生产，而这些产品将回到农民手中。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循环。但在我看来，尽管这个循环要求工业和农业必须通过世界市场，但这并不会构成农民与西欧或美国资本之间的联盟……我们可以在与世界市场隔绝的情况下存在的想法——如果这算得上是一种想法的话，那它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sup>59</sup>

在当时，索科利尼科夫利用俄国进口能力的方式比托洛茨基呼吁购买机械更为合理。工业集中化的基本原理是更充分地利用该国现有的部分工厂。托洛茨基的立场只能通过假设他心中有一个长期的工业再装备和扩张计划来解释。

索科利尼科夫更关心眼前。他认为，当需要新的工业设备时，黄金货币会提供解决方案。这将是获得长期和短期贷款的关键，“在资本主义国家眼中，这是我们经济形势改善的主要指标”。<sup>60</sup> 当潜在的特许权持有者看到俄国通过黄金实现复苏时，他们会变得更加灵活。切尔文券将充当“我们外部和内部市场之间的货币中介”。<sup>61</sup> 用财政人民委员的话说：

“只有稳定货币的存在，才能使内部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得到显著恢复……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的……货币将进入国际流通……这就是为什么，考虑到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前景……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发行……黄金钞票。”<sup>62</sup>

不同的愿景、不可调和的个性和政治仇恨导致了僵局；第十二次党代会加剧了党领导层的混乱。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未找到。后来，试图使工业合理化的努力引发了一波罢工。价格剪刀差也加大了。1923年秋，托洛茨基继续他徒劳的要求，“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中，而不是财政……恢复稳定货币必须严格服从于国有工业的利益”。<sup>63</sup> 但事态正在超越他而发展。随着收获季的到来，新经济政策早期的主要经济难题，即建立工业和农业

之间可行的关系，被明确地尖锐化了。在最终采取决定性措施之前，政治上的不和必须得到解决。

## 销售危机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1923年的谷物丰收（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0%）掩盖了实际的灾难。从相对复苏程度上看，农业与工业的比例与托洛茨基一年前讨论“比例性”时提到的比例大致相同，约为3:1。但另一方面，相对价格正好是相反的比例。与战前相比，工业品零售价格比农产品价格高出三倍。农民为国家提供食物的努力，得到的交换条件是他们完全不愿意接受的。

通过推行货币改革，索科利尼科夫无意中为这种抵制提供了表达方式。为了实现从实物税到货币经济在农业中的过渡，他给了农民用现金向国家支付的选项。因为货币税是根据正在暴跌的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富裕的农民干脆囤积了他们的谷物。工业的市场力量阻止了制成品降价，城乡之间的贸易流通因此停止。在绝望中，政府被迫再次诉诸于印钞机。一场雪崩般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卢布彻底崩溃，甚至威胁到了切尔文券。

在9月的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新的经济委员会。像1920年一样，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过错完全在于他的对手未能执行工业委员会先前报告中的建议。由于最近有人试图将斯大林纳入军事人民委员部，他感到很恼火，于是在10月8日将他的抱怨写成信。他宣称，这场危机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的结果。列宁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议被无视，金融政策是在没有参照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制定的。他认为进一步的临时措施将等同于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由于他的组织地位受到削弱的威胁，他谴责了“任命”，抨击了书记处利用调动来清除批评者的做法，并发表了呼吁工人民主的声明。<sup>64</sup> 似乎忘记了交通委员会、戒严令和工会辩论的经历，当自己的委员部受到“改组”威胁时，托洛茨基改变了想法。在年初，继承权还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他拼命

试图扭转过去疏忽的后果。三驾马车平静地回应道，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后，他们无意接受“托洛茨基在经济事务中的独裁”。<sup>65</sup> 想象中的“休战”结束了。

托洛茨基 10 月 8 日的信是一次考虑不周的冲动行为。没有证据表明他甚至花时间事先警告自己的支持者。然而，连锁反应迅速发生。10 月 15 日，反对派集结力量，向政治局提交了《四十六人声明》。该声明支持托洛茨基对当前党体制的攻击，并带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萨普罗诺夫、弗·斯米尔诺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签名。出于一种奇特的命运转折，它成功地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与前民主集中派的领导人联合起来。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同情关系一直持续到 1927 年初。

托洛茨基 10 月 24 日的另一封信对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进行了带有威胁性的提及。<sup>66</sup> 如果民族政策和斯大林对党机器控制的问题早些时候被提出，它们可能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到了 10 月，已经太晚了。仿佛这些交锋还不足以考验人们的耐心，月底时，共产国际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在汉堡，德国共产党被击溃。这次起义在看似为革命量身定制的条件下失败了。托洛茨基毫不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敌人们组织不善造成的恶果。

从这一点开始，事态发展与 1920 年类似。当领导层中日益扩大的分裂蔓延到党的基层时，一次公开的“讨论”被宣布，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这场公开争议的宣称目的，是发现更有效的方法来保障工人民主。而真正的意图，是鼓励反对者暴露自己的位置。为了在政治上削弱托洛茨基，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还建议他将名字附在一份旨在启动党内事务“新路线”的妥协决议上。12 月 5 日，托洛茨基签署了。三天后，他写信给地方党会议，表示“思想保守的官僚”们在将新政策付诸实践方面存在犹豫。<sup>67</sup> 针对“老近卫军”的“堕落”，他提出了需要“集体倡议”和“集体意志”。<sup>68</sup> 这封信出自一个曾威胁对劳工逃兵进行惩役的人之手，显得很不协调。很难将这位军事人民委员想象成民主的捍卫者。托

洛茨基转变的不可信以及书记处的人事操控，共同确保了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三次党代会选举中，反对派将面临压倒性的多数反对票。

当混乱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因复发性高烧病倒，保卫反对派立场的重任落在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和奥辛斯基身上。这场辩论几乎总是停留在琐碎和无差别的个人谩骂层面。布哈林过发明著名的指责——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做出了他的独创性贡献<sup>69</sup>。斯大林回忆起了这位军事人民委员的孟什维克过去<sup>70</sup>。李可夫怀恨在心引用第 1042 号命令作为托洛茨基规划风格的一个例子<sup>71</sup>。托洛茨基回应道，如果李可夫在 1920 年没有负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修复计划本会取得圆满成功<sup>72</sup>。

在大量的指控和影射中，只有一个有分量的新想法浮现出来——即“商品干预”的概念。在 10 月 20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拉林提议允许辛迪加进口外国商品，然后将这些商品与他们自己生产的国内产品一起出售。从低成本进口商品销售中获得的利润将用于补贴俄国产品的降价，从而建立一个中间价格并帮助降低工业指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当前的销售危机使得托洛茨基呼吁购买机械的请求看起来很荒谬，因此他们将商品干预视为调和工业与农业矛盾的机会。进口必须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但如果这项政策得到适当监管，它可能会安抚农民并挽救谷物出口的希望<sup>73</sup>。

索科利尼科夫对成品进口的传统态度，使得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项提议会被接受。11 月 10 日，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公开暗示，国内市场将从这一政策中受益<sup>74</sup>。但此时，这场争论已经掌握在职业政治家手中。反对派的支持，足以成为商品干预被普遍谴责的充分理由。拉林将自己的想法斥为一种富农倾向，是对富农的让步，以及一个旨在毁掉俄国工业的阴谋<sup>75</sup>。李可夫惊呼，在销售危机期间进口消费品，就像在洪水高潮前洗刷街道一样毫无意

义<sup>76</sup>。官方总路线认为，商品干预与实现贸易顺差的需求背道而驰。为了维护切尔文卷，有必要保持国际收支盈余。直到 1925 年，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拉林的想法才得以复兴。

这场政治闹剧在 1924 年 1 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达到了高潮。托洛茨基缺席，反对派仅获得三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地表明托洛茨基个人失败的巨大程度。在过去的一年中，索科利尼科夫一直是三驾马车的主要思想来源，他现在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制定政策。会议决议规定，可憎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概念将从今往后被工业追求“最低必要利润”所取代。在 1924 年最初的几个月里，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的立场似乎得到了事态的完全证实。通过谷物出口（尽管总量仍然不大），市场逐渐被重新控制，这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银行信贷变得不那么容易获得，导致库存积累过程被逆转，工业指数因此得以降低。进口账单集中于原材料。最后，货币改革完成，俄国自战争以来首次拥有了稳定的货币。在热那亚受挫之后，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再次显得掌控了局面，证明了他那些更注重政治的盟友所托付的责任是正确的。他的计划在随后的两年内没有再受到严重的挑战。

总结该计划的要点，可以说它的主要特点是自 1922 年初融合主义期望达到高潮以来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元素。尽管特许权和外国贷款仍然是索科利尼科夫的首要目标，但现在它们是国内整合和稳定货币的结果。对来自国外意外之财的虚幻希望已被一种更务实的意识所取代，即需要以正常方式恢复国际贸易。在这方面，货币也被赋予了关键作用，因为持续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谷物罢工。简而言之，索科利尼科夫的融合主义已被剥离了其过度的部分，现在简化为他在热那亚之前发展的、最基本的统一货币前提。

因此，1923 年可以被恰当地视为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整合的一年。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谈托洛茨基，尽管他的想法尚未如此连贯地形成。特别是托洛茨基尚未成功确定一种利用苏联进口潜力的令人满意的方法。进口外国机械的想法直到 1925 年国内

工业生产接近战前水平时，才重新获得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重要性。然而，托洛茨基已经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欧洲与美国之间不利的国际收支平衡，在 1921 年的共产国际报告中首次被提及，这暗示了俄国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存在经济共生的可能性。到 1925 年，托洛茨基将更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将遇到党领导层中新的孤立主义思潮，这主要源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

我们可以通过现在考察 1924 年的三件大事来完成对孤立主义与融合主义冲突如何再次出现的调查：旨在获得英国财政援助的计划失败；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论的出现；以及关于不断革命的辩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正是从这三个来源中产生的。

## 英国贷款谈判

1924 年初，索科利尼科夫推动的国内改善，伴随着一系列外交胜利。2 月 3 日，《真理报》欢欣鼓舞地宣布，苏联获得了英国的法律承认。随后，意大利、希腊、挪威、瑞典，最终还有法国，也相继与苏联和解。尽管列宁在 1 月去世，但他的继任者们仍夸口并有充分理由地向党保证，革命是安全的。他们炫耀自己的自信，并抨击反对派是可怜的失败主义者。

由于托洛茨基曾坚持认为苏联工业无法与小规模制造商竞争，季诺维也夫构思了一场宣传妙计。在 1 月的党代会上，他声称反对派曾提议通过“向国际资产阶级做出更大的让步”来获取投资资本<sup>77</sup>。他承认外国资本的流入会加速俄国的增长，但他现在警告说，如果反对派成功，“社会主义祖国”将被出卖给国际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季诺维也夫大胆地彻底改变了党对特许权的官方立场。他宣称，现在与外国人谈判需要更加谨慎。他提醒听众列宁对乌尔夸特（Urquhart）的看法：“宁愿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无知、依然贫穷、伤痕累累，但它是我们自己的……也比把乌尔夸特这样的野兽放进它的菜园里好。”<sup>78</sup> 如果资

本家们准备承认俄国，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的眼睛颜色”，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复苏已经开始。“我们能看到，”季诺维也夫继续说，“我们正缓慢地用自己的力量，将国家从它所陷入的境地中拉起来。我们的观点是，俄国……将找到自己的道路。”<sup>79</sup>

这种新态度在拉姆齐·麦克唐纳和第一届工党政府在英国当选时公布。英国的高失业率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为了获得市场，英国可能会考虑向俄国提供一笔长期贷款。在他的左翼压力下，麦克唐纳按照索科利尼科夫的预测行事。双方就相互金融索赔的谈判定于1924年4月14日开始。根据苏联的解读，麦克唐纳和工党只是在表达他们的资本家主子的意愿，后者最终意识到英国和欧洲依赖于俄国。

季诺维也夫确信客观经济因素已经对俄国有利，他呼吁采取强硬的谈判立场。英国对苏联政府的索赔，将与俄国在内战和外国干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相抵。英国声称，由于国有化和债务废除，俄国欠英国公民110亿卢布。季诺维也夫反驳说，讨论必须从一张白纸开始：“我们认为，根本不能谈论我们支付110亿，或10亿，甚至半个10亿。”英国资本家必须认识到，他们的钱只有在苏维埃的条件下才能被接受。“他们不是随便给谁，”季诺维也夫猛烈抨击，“而是给苏维埃政府——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政府。”<sup>80</sup> 如果英国不接受俄国的条件，俄国将依赖“自己的努力”。

伦敦并未意识到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同样毫不妥协。4月4日，劳埃德银行（Lloyds）、巴克莱银行（Barclays）、威斯敏斯特银行（Westminster）和米德兰银行（Midland）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董事们向内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提出，只有当苏维埃政府对国家和私人债务承担应有的责任、将私有财产归还其合法所有者、保障苏联内部合同的神圣性、保证不再有进一步的没收、解散贸易垄断并停止所有针对其他国家机构的宣传时，对俄国的信心才能恢复。即便俄国遵守这些要求，金融家们也不会承诺提供贷款。

伦敦的报纸在4月14日发表了这份声明。季诺维也夫不为所动，于4月20日回应道，时间在苏维埃一边。他重申了另一句归于列宁的话，警告说：“你们越晚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对你们来说就越不利。”<sup>81</sup> 5月8日，加米涅夫表示赞同，他辩称“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内部力量的增长”。他尽职地效仿他的政治同伴所设定的榜样，他确认一笔贷款可以在互利的的基础上被接受：

“但如果英国银行家想以奴役或使苏联的无产阶级劳动农奴化的条件给我们钱，那我们就需要他们的钱。没有它我们也能活下去。希望那些正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先生们能意识到这一点。”<sup>82</sup>

俄国出口对外国市场的征服，“是与国际市场的一个联系，很可能比所有正在进行的谈判都要强大”。索科利尼科夫对他的同事们立场发生的这种不可预见的转变感到沮丧，他避开直接提及这个话题，而专注于货币改革。

苏维埃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好战态度，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对俄国经济恢复的信心。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在国内外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形象。通过这样做，他们会向伦敦传递一个信息，即他们期望获得比在俄国饥荒时热那亚会议上更好的条件。他们对实际谈判的态度更为现实。5月20日，也就是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开幕前几天，他们一致努力达成协议。俄国代表团——其中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巧妙地将他从国内政治舞台上移除——提出拨出一笔一次性款项，以支付对外国公民的战前债务。作为交换，英国政府将担保一笔贷款。伦敦的猜疑让俄国人相信，没有担保，这个项目不会成功。然而，这些举措未能获得超过官方支持苏联私下争取贷款的承诺。作为俄国谈判代表的拉科夫斯基再次提出了特许权的前景，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党代会的基调已是预先确定的。由于无法向代表们展示所希望的胜利，季诺维也夫再次警告不要片面理解列宁关于特许权的观点。像 1920 年的托洛茨基一样，他将国际局势概括为“既没有直接威胁，也没有直接帮助”。<sup>83</sup> 五天后，5 月 29 日，《真理报》报道称，苏联代表团再次试图通过提供特许权来打破僵局。但在其间，大会已经呼吁在与外国人谈判租约时“最大限度地谨慎”。<sup>84</sup> 第二项决议，以工业保护为由，带有重要的孤立主义色彩。鉴于伦敦谈判未能成功，大会要求“在苏联内部生产生产资料”。<sup>85</sup>

从 1924 年 5 月底到 7 月底，英苏谈判陷入僵局。当拉科夫斯基提出以沙皇债券面值 16% 的比例进行赎回时，债权人拒绝了这一提议。在没有最终决定的情况下，官方的党声明单调地重申了俄国需要自力更生。季诺维也夫陈词滥调背后最初的策略动机逐渐被遗忘。这个国家的心理氛围开始改变。党领导人本打算说服他人相信他们的力量，结果却说服了自己。李可夫，作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首批建议引进外国资本的人之一，现在同意“必须比我们目前经济状况更差时，更严格、更谨慎地考虑特许权问题。吸引资产阶级力量必须被限制在严格必要的范围内。”<sup>86</sup> 两周后，他在共产国际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我们的]积累足够快；它正在进步，逐年增加，使我们能够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大意是我们现在必须在给予特许权时更加谨慎。因此，我们将比我们早些时候与乌尔夸特谈判时，更谨慎地与麦克唐纳进行谈判……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现在，鉴于我们内部力量的发展，我们正以足够的速度向前迈进……我们现在将比过去更严格地评估特许权的优缺点。我们的要求提高了。”<sup>87</sup>

7 月 26 日，索科利尼科夫迟缓地加入了这一合唱。因当前切尔文卷的成功而感到兴奋，他赞扬了俄国不断发展的内部储蓄能力：

“通过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资源进行适当的动员，有可能确保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直到我们足够强大，能够在对我们足够有利的条件下获得信贷。这种支持将会到来，因为当向那些有能力提供外国贷款的圈子提供贷款变得有利可图时，那个时刻就会到来。”<sup>88</sup>

8月10日，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科夫斯基已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该拟议条约规定，如果某些关于国有化的剩余难题可以解决，将提供一笔有担保的贷款。苏维埃政府同意承认的义务将通过对贷款的额外利息支付和特许权来履行。在近几个月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之后，许多俄国工人对这一宣布持敌意态度，这并不奇怪。梁赞诺夫公开谴责了该协议，他认为通过等待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条件<sup>89</sup>。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苏维埃政府没等多久，条约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10月8日，英国工党在议会中失败。臭名昭著的《季诺维也夫信函》，据称其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呼吁英国共产党颠覆皇家武装部队，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丑闻。在随后的选举中，保守党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民众反苏愤怒的浪潮下，鲍德温-张伯伦内阁不想与那些阴险的克里姆林宫阴谋家有任何关系。11月21日，外交部通知拉科夫斯基，议会拒绝批准麦克唐纳的条款。

布尔什维克只有一个回应。在一次纺织工人会议上，李可夫概述了他自己以及整个领导层的态度：

“我们国际关系稳定性的基础是内部条件的稳定性。毫无疑问，许多国家对苏联的承认是我们经济重建成功的成果。认为贷款是提供给穷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贷款是提供给富人的。欧洲现在拒绝给我们贷款；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未来几年的经济重建……他们会给我们贷款的。我们会得到一笔。因此……重心在于我们的内部政策。”<sup>90</sup>

这种反应让人想起热那亚会议之后的情形。在对重工业支持者发起新的攻击时，索科利尼科夫采取了他 1922 年夏天所持的相同立场。他承诺，党无意为了贷款而卑躬屈膝，也无意将俄国出卖给欧洲和美洲的政客和银行家<sup>91</sup>。

尽管公开对伦敦谈判采取了负面态度，但苏联领导人确实对英国的行为感到困扰。热那亚会议两年后，欧洲有能力提供财政援助的事实，打破了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融合主义理论。布哈林在 1924 年春天得出的一个结论，现在具有了新的意义。布哈林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实现“某种稳定化”。许多国家的失业率有所下降，总体而言，西方的财政状况正在改善。导致该体系衰落的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但通过使群众贫困化，资本家们将不可避免的灾难转变为一场“缓慢发展的危机”。<sup>92</sup>

在 1924 年 6 月，季诺维也夫对自己的早期言论感到不安，他也声称看到了“资本主义整合的某些迹象”。<sup>93</sup> 到年底，索科利尼科夫尽管仍在强调帝国主义的矛盾，但也同意德国和中欧已经取得了有限的稳定或“喘息机会”<sup>94</sup>。斯大林的评估与托洛茨基两年前对资本主义的预测相呼应。这位党的书记认为，“稳定化不是停滞；它是对当前地位的巩固和进一步的发展。”<sup>95</sup>

稳定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路线的基本前提，就像列宁在 1921 年否定托洛茨基的单线崩溃理论时所做的那样。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修正评估，是在俄国持续的孤立已无法再被否认时提出的。英美合作向德国提供道威斯计划援助，使得莫斯科最近的挫折显得尤为痛苦。此外，中欧更大的稳定似乎使成功的欧洲革命的任何剩余机会降到最低。当麦克唐纳下台时，俄国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同情者之一消失了。1924 年最初几个月的自信现在被一种日益增长的忧虑所笼罩，这与托洛茨基在 1920 年名义上解除封锁时所经历的感受并非不同。许多党的发言人得出结论，大帝国主义阴谋家张伯伦将协调欧洲进行新的干涉主义阴

谋。封锁甚至可能被恢复。加米涅夫将道威斯计划称为对苏联安全的直接威胁，是“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先决条件。<sup>96</sup>

斯大林将这一推理更进一步，宣布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他以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最初分歧的新见解，正确地指出“说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列宁的资本主义衰落理论排除了……发展，这是不正确的。”<sup>97</sup>然而，问题是这两个体系是会像列宁曾经预测的那样在相互伙伴关系中发展，还是会发现自己陷入殊死搏斗，直到其中一方屈服。1924年底与托洛茨基的一次重大争论澄清了资本主义稳定化的含义。

## 从不断革命论到一国社会主义

在1924年全年，托洛茨基的对手们不懈地削弱他的政治实力。伏龙芝，作为季诺维也夫的亲信之一，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部副委员，分化了该部门的权力。斯大林对党机器的操控，导致没有一名反对派成员作为有投票权的代表被选入第十三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扩大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纳入了长长的、斯大林自己培养否则便默默无闻的人物的名单。当列宁的《遗嘱》在大会上被宣读时，其中要求将斯大林从书记处移除，季诺维也夫冲出来为他的盟友辩护，这一问题被掩盖了。布哈林被提升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索科利尼科夫获得了候补委员身份。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则遭受了持续不断的辱骂。

托洛茨基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回击这些诽谤。但他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选择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他的攻击目标，而不是斯大林。在一篇名为《十月的教训》的文章中，他提醒党，这两位三驾马车成员曾经表现出的优柔寡断。在1917年，当列宁首次呼吁夺取政权时，现在自诩为他继承者的两个人曾因这次冒险的巨大风险而绝望退缩。季诺维也夫关于失败主义和缺乏信心的指责因此被反向抛回给了他的始作俑者。据说，同样的性格缺

陷在 1923 年再次暴露。托洛茨基以 1917 年为例，将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优柔寡断。在托洛茨基的笔锋下，季诺维也夫精心构建的自信形象土崩瓦解。他和加米涅夫都再也未能恢复他们之前的公众地位。

立即而来的结果是引发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诽谤风暴。托洛茨基据称与列宁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被反复提及。在提出的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有人宣称托洛茨基的“悲观主义”源于不断革命论。他的敌人宣称，这位军事人民委员的主要理论成就，如果革命未能输出，将给俄国带来灾难。

这些指控有足够的事实基础，使其看起来言之凿凿。大约在 1922 年的某个时候（日期不确定，但很可能是秋天），托洛茨基为他的一本革命前小册子《和平纲领》

(Programma Mira) 写了一篇附录。这篇原始文章遵循了《总结与前瞻》中的分析，预测如果革命没有向国外传播，俄国将会军事失败。托洛茨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依赖于不断革命的概念，他通过指出俄国在热那亚之后所经历的经济困难来使他对失败的预测合理化。社会主义没有被推翻；但托洛茨基暗示，该理论在强调国际革命方面是有效的，因为俄国经历了“生产力的异常削弱”<sup>98</sup>。如果欧洲合众国（正如《和平纲领》所预测的那样）出现，俄国就不会遭受热那亚的屈辱。在资本主义包围时期，与资产阶级签订的特许权及其他协议被认为其效果可能微乎其微。1922 年，托洛茨基写道：

“只要资产阶级在其他欧洲国家仍掌权，我们在对抗经济孤立时，就不得不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这可以帮助我们治愈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创伤，迈出这样或那样的一步，但在俄国，只有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腾飞才可能实现。”<sup>99</sup>

1922年1月，托洛茨基无意中提供了额外的证据，来支持他缺乏对俄国革命信心的论点。他的著作《1905》的新序言对不断革命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包含了以下评论：“一个落后国家，拥有压倒性的农民人口，其工人政府所处的矛盾，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在国际背景下才能得到解决。”<sup>100</sup> 尽管这篇序言是在农业发展超过工业的时期写的，但这只是一个梗概而已。托洛茨基没有试图将其与当时的普遍环境联系起来。如果不是他的对手们如此勤奋地挖掘这些晦涩的引文，历史会忘记它们。然而，由于《十月的教训》所引发的辩论，它们的意义被不合理地夸大了。它们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权威定义。

这场关于谁更优柔寡断和悲观的荒谬争论，在加米涅夫解读不断革命理论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将其解读为“苏联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于俄国”。他认为托洛茨基忽视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

“在这样的条件下，世界革命的拖延或长期化将意味着俄国工人专政政府的迅速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不断革命论者’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绝望和深刻悲观的发作，到试图通过军事命令来强制应对国家经济落后的痉挛式转变。”<sup>101</sup>

11月30日，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类似的指控。《总结与前瞻》曾认为需要来自欧洲的国家支持。季诺维也夫抗议说，七年过去了，俄国革命生存了下来，而从西方得到的只有鲍德温和张伯伦的侮辱性言论。季诺维也夫还指出，托洛茨基最近将道威斯计划描述为美国试图在西方建立一种“腐朽的平衡”。他在此看到了证据，证明托洛茨基高估了“美国极端帝国主义奇迹般的和平制造特征”。<sup>102</sup> 由此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的悲观主义并非源于一个，而是两个来源：他坚信俄国不可避免地会失败，以及他假定美国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对不断革命理论最严谨和最精明算计的攻击来自斯大林。他说托洛茨基的理论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腐烂，要么堕落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sup>103</sup>斯大林超越了加米涅夫的理解，在12月，他突然想到了将托洛茨基的绝望与列宁关于“不平衡性”的观点联系起来。他暗示，当列宁拒绝普世革命理论并宣布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潜在威胁。俄国工人不必感到沮丧；他们只需要遵循列宁所规划的、确定无疑的道路。苏联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然而，就在1924年春天，斯大林还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

“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对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而言，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几个主要国家的无产者们的努力是必要的。”<sup>104</sup>

通过纠正这一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草率失误，斯大林通过引用列宁1923年的文章《论合作社》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立场。他现在相信，俄国拥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要和充分的一切”<sup>105</sup>。

没有人之前意识到，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回应竟然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考虑到从托洛茨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及之后的言论中，本可以为一国社会主义构建出多么更好的论据，那么斯大林的解读是多么荒谬，这简直显而易见。但在1924年，党宁愿被蒙骗。通过仔细搜寻列宁的著作，斯大林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公式。他巧妙地运用引文，为一个本会被斥为可鄙欺骗的论点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法庭辩论般的复杂性。斯大林这次涉足理论领域所可能带来的后果难以预见。当然，正如李可夫坦率承认的那样，当前旨在抹黑托洛茨基的运动与政策问题没有直接关系<sup>110</sup>。然而，一个科学怪人已从列宁的文学遗骸中被创造出来。

作为第一个反思新理论实际意义的党领导人，布哈林立即强调了其内在的孤立主义。1925年1月，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对派经济提案的文章。他批评皮达可夫认为俄国将从融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受益的观点，布哈林提出，外国援助在欧洲革命发生之前或之后都不会实现。目前，欧洲正忙于恢复自己的固定资本。在西方革命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内战，这将带来类似于俄国1917年后所遭受的严重经济混乱<sup>107</sup>。

布哈林总结说，索科利尼科夫的国内政策必须进行修改。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农民。他解释道，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当工人的政治权力得到巩固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的范围和强度将逐渐减弱。尽管托洛茨基曾对富农和耐普曼发出警告，但布哈林认为，可以预见一场“和平的、经济的、有限的”阶级斗争。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将构成“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sup>108</sup>。如果一贯遵循新经济政策和销售危机的教训，党将能建设新社会。在1922-1924年间，国内贸易的扩张导致国民收入普遍增加。同时，工业中的资本周转期（即生产期加上分销期）被缩短。其效果仿佛是可用的总资本增加了<sup>109</sup>。基于这些理由，布哈林认为，主要的新工业投资可以推迟相当长一段时间。俄国工业的整个问题被误解了：国家的资本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当充足的。真正的需求是更严格地控制垄断价格，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从而加强与农民的联盟。

鉴于1923年当时的短期问题和危机氛围，索科利尼科夫做出这种分析是合理的。但布哈林现在将低价格和低工业利润率作为长期增长的方案。与乡村的贸易扩张政策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被放大。农民，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富裕或贫穷，都将被鼓励进行积累。农村收入和储蓄的增加将意味着对消费品和农业机械的更大购买力。更大的农村购买量，即使工业只获得适度的利润率，其总收入也将比工业价格维持在高水平时更高。因此，更高的农村收入将对城市产生有益的影响。此外，通过鼓励农民将他们的资源集中到合作社和其他储蓄

机构，将有可能使富农的储蓄为贫农的利益服务。通过税收，进一步的收入转移最终将成为可能。因此，根据布哈林的看法，工业和农业，就像俄国的不同阶级一样，将以和平的方式逐渐共同成长。然而，这项政策预设储蓄过程必须从农业部门开始。布哈林通过重新诠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使合作社（主要是富农）储蓄所扮演的角色变得合理。

他认为，最初，列宁将合作社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元素，而这个体系主要建立在特许权之上。然而，在1923年，列宁写了《论合作社》，并将合作社描绘为“与社会主义的成长……完全相同”。为什么列宁的态度改变了呢？布哈林回答说，从西方引进资本的计划是幻想。列宁转向了社会主义合作社，作为唯一可以想象的、产生新资本池的替代方式：

“[到1923年]，已经很清楚，外国资本……不太愿意将自己安置在我们[苏联]的范围内。我们的特许权协议异常稀少……我们的第二个事实是，我们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内部资源……我们正在足够快地爬出腐朽、恶臭、饥荒和寒冷，没有外部帮助，也没有支付利息。”<sup>110</sup>

在1925年春天，布哈林解释了他的国内政策建议、“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稳定化理论之间的联系。他指出，西方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考虑我们内部经济状况问题的方式”。有必要加快资本周转，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难指望从外国资本那里得到太多。”<sup>111</sup> “西欧资本的某种稳定化”，意味着俄国“几乎完全孤立”。资本家们已经克服了他们最严重的困难，尽管他们对俄国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冷漠。俄国孤立的看似不可逆转的事实，要求对革命的未来进行一次信仰宣言：

“如果承认西欧的资本主义正在复苏，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终结了吗？换句话说，没有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我们能成功吗？这归结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sup>112</sup>

布哈林嘲笑“不断革命论者”的宿命论，同时对党早期融合主义的提及也毫不留情：

“它不会从天而降；外国人不会给我们……资本。[但]我们并不因此得出结论，即没有任何外部帮助（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就会灭亡。不！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源，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将会拥有它们。它们由什么构成？……这些资源是通过更积极地运用劳动而获得的，这是加速周转的结果。”<sup>113</sup>

布哈林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也危险地带有时代错位。假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降低成本，但强制逐步降低工业销售价格，将消除或限制国有部门潜在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对现有资本更密集的使用，在大多数行业中也会导致设备更快地耗损，更频繁地出现生产故障，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讽刺的是，布哈林开始制定这一策略，恰恰是在轻工业达到战前生产水平的前一年<sup>114</sup>。此后，闲置设备的缓冲作用不复存在，以对抗资本消耗，布哈林被迫重新考虑国家对工业投资的需求。与此同时，通过法令降低工业销售价格的尝试，反而增加了数量不断减少的私人商人的利润。

尽管存在这些疏漏，对许多人来说，布哈林似乎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前景，没有重大的社会或政治斗争。在1925年，布哈林的观点对党的决策产生了强烈影响，新经济政策的重新诠释也因此完成。列宁曾将国家资本主义等同于融合主义，此后，新经济政策将被等同于孤立主义。但传统的思维模式并不像布哈林想象的那样容易逆转。托洛茨基的“比例性”问题仍有待解决。索科利尼科夫的融合主义信念没有被考虑在内。而斯大林也很快就会意识到，在一个孤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布哈林所传播的那些自信宣言。

## 五、一国社会主义

与布哈林共同撰写“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斯大林在1925年春天将自己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虚构危险的充满争议的论文，转变成了一个关于俄国和世界的连贯观点。在那些争夺列宁衣钵的人中，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权力工具。列宁自身的权威，既基于他的论辩技巧，也基于他的组织和操控洞察力。他的继任者同样需要被认可为组织者和思想家。通过赋予斯大林最初有限且纯粹抽象的论点以更广泛、更实际的意义，布哈林极大地推进了这位党书记实现全面个人权力的计划。早在1924年6月，斯大林就已经开始“纠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偶尔出现的理论错误。现在，在布哈林的帮助下，他似乎正在采取自己的创造性举措。

一国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纲领：它是革命史上一个心理分水岭。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许多人渴望重新确认目标。三年里，在索科利尼科夫设计的维持运转的操作中，一种漂泊、漫无目的和困惑的感觉逐渐蔓延。新理论帮助恢复了在1921年失去的使命感。在192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一种变革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工业恢复的完成，许多旧的恐惧似乎不像过去那么巨大了。斯大林将索科利尼科夫的谨慎抛诸脑后，宣告一场新的英勇战斗的开始——通过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他的对手们出于个人生存的冲动，带着忧虑看待这些举措。

围绕“不断革命”的“辩论”有效地摧毁了托洛茨基作为理论家在党内群众中的声誉。在《十月的教训》之后，恼怒且充满报复心的季诺维也夫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并永久性地消除其政治威胁。斯大林，早已预见到他可能需要托洛茨基的支持来对抗季诺维也夫，因此只同意剥夺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位。他以一种精心算计的宽宏大量姿态，确保托洛茨基保留了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席位。

斯大林拒绝完全羞辱托洛茨基，这给他“三驾马车”中的前同事们提供了更实质性的怀疑理由。1924年秋天，他安插了一位自己的支持者担任地方党书记，削弱了加米涅夫对莫斯科党组织的控制。1925年初，他开始着手削弱季诺维也夫在后者的两个主要权力基础——列宁格勒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中的势力。同年晚些时候，他试图通过渗透列宁格勒书记处来复制他在莫斯科的成功。尽管季诺维也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举动，但他和加米涅夫已经被托洛茨基的惊人揭露严重震撼。由于无法冒险进行直接对抗，他们决定通过贬低斯大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来反击他的举动。结果是，1924年党领导层所维持的一致性戛然而止，当时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所有人都异口同声。

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曾驳斥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怀疑观点，现在他通过暗示布哈林的观点是堕落的声音，间接地批评斯大林：尽管新党政策的解释可能与“一国社会主义”相符，但这是一种对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不合理的投降。出于他自己的原因，索科利尼科夫同情并最终加入了正在出现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随着这些政治重组与当前的理论观点转变相平行，继承权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三驾马车”明显解体。这个联盟因恐惧而生，无法在托洛茨基被打败后继续存在。托洛茨基观察着权力分配的变化，保持着超然立场，直到他能确定竞争派系的意义。

### 三驾马车的分裂

1925年1月10日，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立场进行了首次试探性探究。他采用了最近用来对付托洛茨基的文本批评策略，对莫斯科的听众说，列宁将在一个“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只视为唤起国际革命的一种手段：“列宁说，我们必须开始，但我们只能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共同继续和完成，或者至少是结合在一起……因此，当人们说伊里奇的教导不是……

在一个单独国家胜利的理论时，这是正确的。”<sup>1</sup> 这次讲话旨在提醒人们，斯大林也是脆弱的，他故意曲解列宁著作的行为既独特又可疑。

尽管冒着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风险，加米涅夫未能成功阻止斯大林。第十四次党代会的筹备加剧了政治局内部的不信任。1925年4月下旬，季诺维也夫详细阐述了加米涅夫1月份表达的思想：

“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表明……初步的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在有利的情况下，这个第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定支持下）长期维持和稳定自己，即使这种支持不是以其他国家直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出现。但与此同时，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完全保障不会恢复资产阶级关系，只有在国际背景下（或在几个主要国家）才有可能。”<sup>2</sup>

4月29日，季诺维也夫告诉党代会，列宁曾相信，只要没有来自国外的军事干涉，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取得“完全胜利”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名国际革命家……[列宁]从未停止强调一个事实，即没有国际革命，我们的胜利是不稳定和不完整的。”<sup>3</sup> 一个“完全”的胜利却是“不完整”的，这是一种只有季诺维也夫才能理解的微妙之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季诺维也夫在不同时间预测，俄国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孤立期，稳定可能持续数年，除了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但他又自相矛盾地坚持希望获得外国援助，并坚称“普遍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仍然存在<sup>4</sup>。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警告党要提防一种他称之为“民族局限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已经“弥漫在空气中”<sup>5</sup>。然后，他继续强调俄国事实上的孤立，否认这个国家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sup>6</sup>。这种试图让人们怀疑斯大林的做法，反而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即真正不一致和

不确定，甚至可能“悲观”的是季诺维也夫。这位名义上的党领导人无意中证实了托洛茨基对他优柔寡断的指责。

1925年夏天，他试图澄清自己的立场，结果加剧了混乱。在他的著作《列宁主义》中，季诺维也夫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行为和成品进行了仔细区分。“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是可以想象的；而“社会主义政权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建立”则不是<sup>7</sup>。本质上，季诺维也夫认为俄国的落后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因为它使维持与农民的联盟变得复杂。“如果我们能够在主要国家取得胜利，”他写道，“……我们将立即能够利用他们巨大的工业和我们自己的工业，这将使我们能够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我们与农民的联合。”<sup>8</sup>自然而然的回应是，俄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始工业化进程。这正是季诺维也夫自己在一年前所持的立场。然而，工业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季诺维也夫现在却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建成。他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套里。

与第十四次党代会讨论的工业扩张的首批实际措施相比，这些宣言的徒劳性显得更加清晰。1925年1月，中央委员会已经提高了冶金工业的生产目标。会议再次向上修正了这些数字。捷尔任斯基，当时是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预计1924-25年度的机器制造计划将增加不少于83%。为了协调扩张，他概述了一项三年工业计划，这是后来五年计划的先驱，并强调需要从冶金部门的额外工厂和设备开始。

布哈林试图尽量减少对工业新投资的需求，但李可夫同样没有理会，他专注于工业化这一主题。他告诉会议，苏联轻工业现在正接近其全部生产能力：“重建进程的快节奏已使我们耗尽了在继承自资产阶级俄国的旧技术设备所施加的限制内，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需要扩大基本资本再生产的巨大任务。”<sup>9</sup>5月13日，李可夫吹嘘说，俄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国家。这样一个

国家不会“跪着”向欧洲乞求帮助。尽管需要“巨大的资本投资”，但过去的苏联胜利是应对工业化新挑战的成功保证。“将自己从这样的贫困中提升到我们目前达到的水平，比基于这些成就向前迈进要困难得多。”在1923年，李可夫曾对托洛茨基对经济计划的要求嗤之以鼻。现在他指出，工业化将需要“一个用于我们所有经济部门重建的单一协调计划。”<sup>10</sup> 国营经济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会议都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计划工业增长的问题。

斯大林完全同意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的看法。他认可增加对重工业的预算支持，并引用列宁的话，大意是如果俄国没有自己的冶金和机器制造，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会灭亡<sup>11</sup>。工业化将是党对悲观主义的回应，无论它从何处出现，也是这个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回应。对1925年又一个好收成的预期，凸显了现在就开始为未来工业增长进行规划的必要性。1924年的部分农作物歉收曾限制了农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但迟早，轻工业必须得到扩张。在与麦克唐纳的令人失望的经历之后，斯大林相信俄国必须用自己的资源来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预算补贴很快就到位了。在1925年初的几个月中，银行信贷也自由地流入轻工业和重工业。5月，李可夫满意地指出，市场井然有序。增加的财政宽松没有引发通货膨胀，1923年的价格剪刀差仍然牢牢地合拢着<sup>12</sup>。

然而，一个可预见的刺耳音符来自索科利尼科夫。早在1924年12月，这位财政人民委员仍然坚信，目前甚至没有必要将固定资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更不用说超越它们。他声称，苏联工业的基本资本是完全充足的。“我们的经济遭受的不是基本资本的不足，而是更多地遭受……[工业]与疲弱复苏的市场缺乏对应。”<sup>13</sup> 像布哈林一样，索科利尼科夫回顾的是1923年的销售危机，而不是展望新的事业。因此，他将斯大林和李可夫对重工业投资的强调解读为一种涉及不必要经济风险的政治举动。他认为，如果沉溺于这种奢侈，财政人民委员部不应该为此负责。俄国应该再次尝试获得外国贷款。

索科利尼科夫尚未意识到，根据斯大林的设想，外国资本在俄国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1925年3月22日，斯大林将德国对资本进口的依赖描述为“金融奴役”<sup>14</sup>。两天后，财政人民委员反驳了俄国可以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他宣称：“为了从国外获得贷款，只要[这些贷款]能保证我们经济获得足够的利益，并且不影响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给予一些让步是允许的。”<sup>15</sup> 5月1日，他明确警告不要被动接受孤立：“如果说我们基本上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发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孤立中发展。”<sup>16</sup> 俄国越快接近战前生产水平，外国投资就越重要。必须采用一切手段来消除金融封锁的威胁。只有与世界经济建立联盟，苏联工业才能得到重新装备<sup>17</sup>。从斯大林和布哈林那里听到的孤立主义，与来自托洛茨基的一样令人厌恶。对索科利尼科夫来说，这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将自己与全球剩余的六分之五隔离开来。它就在我们周围存在。”<sup>18</sup> 1924年，这位财政人民委员通过指出俄国未来自己积累储蓄的能力来回应英国的背信弃义。他担心自己的言论被误解，因此澄清了自己的立场：“我关于内部信贷的评论绝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没有外国信贷，特别是在未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sup>19</sup>

然而，到了1925年中期，党内的政治局势过于不确定，无法证明过早冒险是合理的。6月，一项由财政部监管的长期重建贷款计划启动，旨在为工业和农业提供资金。索科利尼科夫不情愿地同意监督该项目。两个月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年度控制数据的形式发布了其第一个框架计划。令索科利尼科夫震惊的是，其中包括工业总支出估计为9亿卢布。如果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预测，货币供应的危险扩张将不可避免。索科利尼科夫抗议说，计划者正在侵犯金融当局既定的特权。他回忆起过去与托洛茨基的冲突，警告说工业对信贷的需求绝不能干扰货币的稳定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立场“完全错误”；这些控制数据是毫不

掩飾的通货膨胀方案。<sup>20</sup> 索科利尼科夫现在与党的氛围完全格格不入。他未能领会“一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徒劳地试图通过诉诸金本位来对抗这一愿景：

“我们为什么不能脱离黄金基础？一般的回答……是黄金仍然是世界市场上决定性的因素；而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脱离世界市场的经济规律。”<sup>21</sup>

斯大林对他这位前同事的抱怨可以理解地无动于衷。很明显，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缺乏信念。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关系不那么紧张，尽管这里也存在未来冲突的潜力。两人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是统一的；但他们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不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布哈林则将首要地位赋予轻工业和农民。1925年，谷物、亚麻、大麻和一般食品的农村销售水平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由于土地重新分配划分了那些曾生产可销售盈余的大庄园，布哈林希望将小农地重新整合为更大的个体，并最终整合为合作社土地。斯大林同意这些政策，只要可以合理地假设它们将为工业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原材料。1925年4月，布哈林为国家最高效的农民——富农——争取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特许权。雇佣劳动被批准；土地租赁权被扩大；第十四次党代会宣布减少农业税。索科利尼科夫最初支持减少税收的提议。但他厌恶富农，信奉一种民粹主义的农民平等理想，并主张采取一种更具累进税制的阶级导向政策。布哈林邀请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发家致富”，进行储蓄，并为工业提供市场。

传统上，富农被认为是村里的主要敌人。现在布哈林声称发现了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方式。合作社将允许富农成长为社会主义者。<sup>22</sup> 他和斯大林都假设富农愿意与国家“合作”。他们也假设党会容忍他们对农民的亲和过度行为。然而，对富农的特赦提议为季诺维也夫提供了一个他迄今未能找到的切实问题。通过攻击布哈林，他可以隐晦地质疑斯大林的

领导权，同时避免与“三驾马车”的最终、公开决裂。他将布哈林的政策贴上“背离”社会主义的标签，将其归因于国际革命的延迟和俄国未能达成外国贷款。<sup>23</sup> 据说列宁在几年前就预见到了布哈林的不可靠，当时布哈林首次未能理解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根据列宁的看法，新经济政策，尽管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但会导向社会主义。“某些年轻同志”被这种辩证的洞察力所困惑，现在通过接纳富农，将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为资本主义工具。<sup>24</sup> 季诺维也夫的攻击成功地迫使布哈林撤回了关于富农发家致富的争议性建议。但斯大林解释说，与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仅仅是一个误解。

1925年充满了误解。索科利尼科夫同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他犹豫着是否要公开表态，因为他担心失去财政人民委员的职位。李可夫和布哈林成为斯大林的新盟友，但布哈林和斯大林显然是心存芥蒂的搭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可合法的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两人都声称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建成。托洛茨基试图理清这大量的矛盾，他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

## 托洛茨基对政斗派别的评价

在之前的几年里，托洛茨基曾是首批警告富农威胁并阐明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人之一。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本应有理由期待他会支持季诺维也夫对布哈林的谴责。然而，在他1923年关于工业的报告中，托洛茨基也预见到了通过从西方购买机器来进行工业扩张的必要性。既然进口的前提是出口，托洛茨基现在同意布哈林的观点，即季诺维也夫的猛烈抨击构成了对进一步经济增长的严重威胁。

像布哈林一样，托洛茨基认识到“地主的清算……导致了大型庄园的清算，其中[包括]一些最先进的农场。这是……农业暂时衰退的原因之一。”<sup>25</sup> 因此，布哈林的补救措施似

乎相当合理。如果粮食产量能够增加，出口就会成倍增长，工业机器就可以被购买。正如托洛茨基在《消息报》中所写：

“是否有可能避免扩大在农村更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机会？不，因为那样农民经济就会衰败，市场会萎缩，工业发展也会放缓……没有……小麦种植面积的增长……就不可能有出口；没有出口……也不可能有进口；没有进口，我们就无法获得工业设备。”<sup>26</sup>

与季诺维也夫相反，他谴责“剥夺富农”的想法，因为“第二天这就会打击中农，扼杀[他]……的个人利益……并使农村回到 1920-21 年的水平”。尽管托洛茨基会更倾向于看到农业以集体、社会主义模式发展，但他认为，在苏维埃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机械设备之前，这是不可能的<sup>27</sup>。至于目前存在的少数集体农场，他认为它们与个人激励不兼容<sup>28</sup>。除了布哈林推荐的方案之外，似乎没有明显的困境解决方案，特别是未来几年大部分新的农业机械也必须进口<sup>29</sup>。

在 9 月 1 日的一次讲话中，托洛茨基总结说，当务之急是鼓励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借助资本主义方法。这是我们当前时期政策的本质。”他补充道，这个对富农的赌注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我们需要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富农，那个富裕的农民，通过国家销售粮食，使国家能够获得外汇，用以进口我们工厂所需的机器。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它推动了向社会主义的迈进。”<sup>30</sup>

托洛茨基相信，季诺维也夫及其盟友过度强调了农村阶级分化的危险；对农业的新刺激将带来普遍的改善，惠及农民的所有阶层，并导致富农在总销售量中所占的份额下降<sup>31</sup>。在他的著作《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中，他表示有信心，“农业中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在可预见的近期内不可能失

控”<sup>32</sup>。这种对扩大出口和购买外国机器的首要关注，是托洛茨基最初拒绝与季诺维也夫和新反对派结盟的主要原因。

1925年秋天，商品短缺的严重加剧，更突出地强调了重新获得欧洲资本设备的必要性。计划早些时候已经制定，旨在显著增加向外国市场的粮食运输。但这些计划是片面的；没有为市场准备充足的工业制成品。再次像1923年那样，富裕的农民囤积了他们的粮食。索科利尼科夫试图约束计划者的努力失败了；采购机构的大肆支出和新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这一年以李可夫冷静的保证开场：“在我们整个七年历史中，我们从未面临过更好的经济恢复前景。”<sup>33</sup> 却以惊人的失望告终。

对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来说，这场混乱来得再及时不过了。加米涅夫抓住机会将责任归咎于富农，声称仅仅百分之十二的农民控制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粮食供应，为了投机利益而挟持政府<sup>34</sup>。曾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控制数据委员会的斯米尔加，对此指控表示赞同，并将其声望借给了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乐于无情地拉响针对富农的警报。后来，加米涅夫将批评多样化，认为没有为加速工业生产做出充分准备，而这场危机凸显了“扩大我们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的必要性<sup>35</sup>。从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性拒绝，新反对派转向了对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全面攻击。

他们指控的普遍性使得季诺维也夫联盟呈现出某种无定形的状态。托洛茨基判断，如果反对派要成功，索科利尼科夫将把他们的抱怨塑造成一个他自己更系统的纲领。而索科利尼科夫仍然否认商品短缺的存在，他将这场危机解释为购买力过剩和计划者干预所致<sup>36</sup>。他指责国家计划委员会，嘲笑他认为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成熟度”的过高估计，并普遍嘲笑所有计划<sup>37</sup>。季诺维也夫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贬低布哈林所发起的退却；而索科利尼科夫则将其解释为恢复国家银行的权威，并通过货币控制来监管经济<sup>38</sup>。在私人笔记中，托

洛茨基写道，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在所有场合都将错误解读的农村利益……与工业的切身利益对立起来”。如果允许他这样做，他将“以恢复一般商品流通的名义，损害工业利益和外贸垄断”。12月22日，托洛茨基将索科利尼科夫描绘为“一个在面对农村时主张解除无产阶级经济武装的理论家”<sup>39</sup>。

托洛茨基根据阶级背景来解读这两个联盟，他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扭曲的、旨在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关系的尝试。但这场冲突的发生“没有……以原则性的纲领对立”<sup>40</sup>。商品短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的第十二次党代会。考虑到季诺维也夫曾深度参与破坏关于工业的报告，这表明没有理由期望他在1925年会有彻底的态度转变。然而，季诺维也夫的地盘列宁格勒，却是对富农充满敌意的关键焦点。这似乎表明，季诺维也夫是在无意识地表达列宁格勒工人的不满<sup>41</sup>。如果情况属实，那么索科利尼科夫与布哈林批评者的结盟，只能被视为“最纯粹的个人无原则主义，同时也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例子<sup>42</sup>。在粮食采购运动中遇到的挫折，使托洛茨基从短暂地与布哈林和富农调情中清醒过来；但只要列宁格勒人容忍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在他们中间，他就认为他们是不可信的。

他们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草率提及表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在偏离轨道；他们两人对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正确关系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为了急于嘲讽布哈林的农业政策，季诺维也夫表现得如此鲁莽，以至于暗示整个经济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正如托洛茨基在1925年12月14日所写：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续将工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在两三年前很普遍……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工业是一个附属部分，这个体系还包括……农民经济、金融、合作社、受国家监管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在这种框架下，

工业的调节作用完全消失了。计划原则几乎完全被金融信贷调节挤压出去，后者扮演着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之间的中介角色，将两者视为相互诉讼的当事方。”<sup>43</sup>

托洛茨基总结说，“金融和信贷调节……不、也无法保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如果不是索科利尼科夫将金融控制作为真正计划的替代品的误导性观念，布哈林“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其对工业的不敏感性，就永远不会出现。加米涅夫批评布哈林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布哈林在坚持俄国工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非国家资本主义时，是站得住脚的。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撕裂了索科利尼科夫在1923年设计的方案。例如，加米涅夫曾做出某些有利于工业的意外言论，托洛茨基将其视为“无疑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加米涅夫尚未将工业的需求与当前的农业困难联系起来：他不明白农村的分化和富农的权力是稀缺性、缺乏农业设备和普遍的工业不发达的衍生物。一个根本性的优先事项改变是必要的，在任何和解达成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必须放弃他们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所采取的立场。“必须，”托洛茨基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彻底清算1923年的立场，而不是零敲碎打地清算。”否则，工业增长的持续滞后将不可避免；农业将飞速发展，而商品短缺将严重恶化。

面对两种非定形、都不令人满意的政策前景，托洛茨基犹豫着是否要支持任何一方。

然而，即使他避免个人表态，也无法逃避卷入其中：他的沉默将被视为对斯大林和党领导层的默许。布哈林是其中一个联盟中不可预测的因素；索科利尼科夫是另一个。在这两者中，托洛茨基认为索科利尼科夫代表着更大的威胁。斯大林和李可夫对工业的同情，很可能会盖过布哈林在农业上的愚蠢。布哈林的错误只不过是索科利尼科夫概念的荒谬演绎。无论如何，在采购危机之后，政策改变是可能的。在权衡两个弊端之后，托洛茨基试探性地决定支

持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讨论这个决定时，托洛茨基的一位支持者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后来写道：

“我知道你曾计划在 [1925 年 12 月] 第十四次党代会上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盟。我当时深感遗憾，现在依然如此，因为那些目光短浅的派系朋友们说服了你（在你不小的反对之后）放弃了这一行动（这本已是决定好的）。你知道我当时反对你[后来]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认为那完全是无原则的。<sup>44</sup>”

托洛茨基从未否认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信件的真实性，这可以作为它确为真迹的充分证据。然而，托洛茨基最终的优柔寡断可能与其同事提出的论点关系较小，更多地是出于他对贸易垄断的关注和他对进口生产资料的渴望。11月6日，《真理报》发表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决议，这是自1922年以来首次涉及贸易垄断问题。决议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尽管这个问题似乎是由克拉辛提出，以逃避对出口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决议特意引用了列宁1922年的言论，唤起了人们对托洛茨基早些时候与财政人民委员冲突的回忆。决议还特别强调了机器进口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解决我们工业基本资本的问题与外贸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出口……[出口的发展意味着]为我们的工业购买国外设备，以及为农业购买机器和工具的可能性增加；也就是说，它允许我们经济加速向新的技术基础过渡。”

同月早些时候，外贸人民委员部被撤销为一个单独的部委，并与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但国家控制的原则被严格维持，如果这份中央委员会决议是由托洛茨基本人撰写，其内容也不会有实质性差异。保留垄断的决定给了托洛茨基额外的鼓励，让他更倾向于支持斯大林而非季诺维也夫。

然而，当布哈林对采购危机做出反应，向自觉的孤立主义又迈出一步时，这个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他拒绝使用行政压力来对付富农，认为这种反应会激怒农村，并危及整个农业。此外，他反驳了粮食采购计划因阶级敌人囤积而失败的论点。他断言，真正的问题是多雨的天气，这导致了部分收成减少。脱粒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推迟；而采购机构无协调的活动导致了价格上涨和对后续涨价的预期，从而为农民提供了不销售的动机。<sup>45</sup>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这场灾难，但布哈林忽略了核心问题：即工业商品的稀缺性。

他从进口计划的中断中得出结论，俄国必须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贸易增长得越多，国家就越依赖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就越容易受到再次封锁的威胁。在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前夕，布哈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说：

“主要危险是国际性的。我们现在正在靠近世界市场。我们现在正在与世界经济进行一系列交易……因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我们的生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国外进口多少以及出口多少。但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发生了金融和经济封锁……我们那时将不得不重组我们的整个经济计划。这难道不会带来最大的困难吗？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础上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脆弱。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可以通过确保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国家在任何方式或程度上，都不会过分依赖外国市场来避免它，只要它仍然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控制。”<sup>46</sup>

在1925年12月的党代会上，布哈林重申了这一说法，即“我们有许多新的危险……因为我们正在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变得更加脆弱”。<sup>47</sup> 在同一次讲话中，在评论托洛茨基所谓俄国落后使得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的信念时，他发誓，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将继续进行——即使只能以“蜗牛般的速度”。

托洛茨基相信，“蜗牛般的速度”正是如果失去购买新工业设备的机会所必须预期的结果。他对布哈林在富农面前表现出的明显软弱感到愤怒，他预测，对工业扩张速度的漠不关心将导致“逐渐倒退到一场农民的热月政变”。布哈林患有“民族-乡村局限性”，并且正在成为苏维埃民粹主义的毫不掩饰的理论家。简而言之，通过将“一国社会主义”转化为一个经济纲领，布哈林已成为一个荒谬理论的建筑师，该理论主张“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和一个封闭的社会主义建设”。<sup>48</sup> 如果斯大林和李可夫被诱惑接受布哈林的观点，商品短缺将继续存在，农民将摧毁贸易垄断。社会主义将失败。革命将退化。当斯大林在党内会议上对工业化战略的描述与布哈林的孤立主义相符时，托洛茨基最终决定，他不能支持任何一位前“三驾马车”成员。

## 斯大林-索科利尼科夫的争论

除列宁格勒代表团外，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挑选的。新上任的革命领袖拥有的党内支持足以在任何问题上压倒季诺维也夫，他利用这次大会作为论坛，首次直接涉足经济政策问题。他一贯地将问题简化，以适应现在已确立的悲观或乐观主义类别，并将工业化理念转变为一个旨在团结全党在他领导下的政治号召。

他宣称，俄国必须在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中做出选择。第一条，斯大林将其归咎于L.沙宁，该道路基于苏联应保持农业出口国和工业品进口国的地位这一建议。斯大林反驳道，这条路线“要求我们结束自己的工业”。如果党采取这一路线，那将意味着俄国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实体”，而会被转化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外贸将迅速增长；而“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增长得越多，我们就越依赖资本主义西方，就越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

斯大林以以下方式概述了第二条、也是更乐观的替代方案：

“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圈存在，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独立……这条路线要求我们的工业实现最大程度的扩张……它坚决拒绝将我们的国家转变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的政策。这是我们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圈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须的。”<sup>49</sup>

为了走上社会主义独立的道路，俄国首先必须提供防止未来封锁的保障。必须以牺牲进口来换取贸易顺差，以便积累预防性储备。没有这些保障，“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将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阵营”毫无防御能力。斯大林宣布：“我们自己将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sup>50</sup> 在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中，这位党书记主张：

“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将苏联从一个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将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sup>51</sup>

关于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可以在一个国家建设的问题，斯大林将他的新理论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在经济建设领域，大会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国家……拥有‘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而无需所谓的外国资本‘帮助’。”<sup>52</sup>

当革命在法国或德国到来时，问题就会不同。那时，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的政策可以被放弃，转而“将我们的国家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潮流”。但在此之前，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给自足。实际上，斯大林的讲话重新确立了1920年的党路线，当时托洛茨基首次提议在孤立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1921-1924年，即融合主义共识的那些年，已被遗忘。

通过以这种方式掌握主动权，斯大林让季诺维也夫在他自己创造的理论泥沼中无助地挣扎。慌乱之下，这位列宁格勒的头领抱怨自己被误解了。他并不是真的认为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只是在争论，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国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结构，而且不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我们不是在争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不可能：苏联的无产者数量足以做到这一点，经济先决条件也存在。总体的政治局势非常有利于成功建设社会主义——记住，我们有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最终将在国际背景下完成。”<sup>53</sup>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是一场修辞上的灾难。然而，大会的人员安排得如此严密，以至于斯大林没有理由对季诺维也夫会说什么表现出任何超过远程的兴趣。一个更有趣的对手是索科利尼科夫。斯大林通过将第一条总路线归咎于沙宁（一位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来淡化他早些时候对这位财政人民委员的提及。但毫无疑问，索科利尼科夫才是真正目标。他的回应难以预测；近几个月来，索科利尼科夫拼命地试图保住他的纲领。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决定。

1925年夏初，他遇到了一本由利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和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Moulton）合著的书，名为《俄国的债务与俄国的重建》（Russian Debts and Russian Reconstruction）。帕斯沃尔斯基和莫尔顿都认为欧洲需要俄国，既作为制成品市场，也作为原材料和食品来源。他们还声称，向俄国提供商业贷款不会有任何有用的目的。既不会显著改变该国的进出口比率，也不会改变其支付新信贷利息的能力。<sup>54</sup>此外，根据可疑的统计数据，两位作者声称，沙皇俄国在一段时间内向国外借款，只是为了支

付之前贷款的利息。鉴于伦敦谈判后党的态度，这本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索科利尼科夫突然而明确地否定了他自 1921 年底以来整个战略的基础：

“在热那亚，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为俄国重建提供 30 亿卢布贷款的请求。结果一无所获，这很可能是一件好事……如果这笔贷款实现了，它将对苏维埃俄国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sup>55</sup>

在未来，外国贷款不应被允许承担超过索科利尼科夫所称的“补充意义”的地位。在 1925 年下半年的几个场合，他重申了同样的论点，赞同短期信贷，欢迎黄金开采业的特许权，以此作为扩大切尔文卷储备的手段，但拒绝积累长期债务。在 1894-1913 年期间，沙皇俄国的总债务费用似乎比其借款多出了 5 亿卢布。<sup>56</sup> 财政人民委员现在提议扩大出口顺差，这代表着外汇的明确收益，而不是可悲地追逐外国资本。

第二处同样重要的、索科利尼科夫立场的逆转，涉及到出口所应服务的非货币目的。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他主张进口消费品。在 1923 年与托洛茨基的辩论中，他将工业原材料作为主要重点。对工业材料和半成品的需求依然明显；但斯大林的介入、国家计划委员会日益增长的声望以及 1925 年的灾难，都要求他重新评估。尽管工业化的理念在政治上过于重要，不容忽视，但事实是俄国农民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短缺。斯大林的自给自足经济计划会增加危险，因为内部生产额外的工业设备将导致不必要的延误和无法接受的开支。此外，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工业化应如何融资的明确建议。索科利尼科夫越来越意识到工业投资的必要性，他担心斯大林的梦想将导致不间断通货膨胀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三年工作的毁灭。他只剩下一个希望：如果俄国的大部分资本货物能在欧洲购买，农业、工业和金融的利益或许还能得到调和。在大会前夕，索科利尼科夫写下了他最后的重要声明之一，重新提出了李可夫在 1920 年首次用来反对托洛茨基的论点：

“根据帝国主义战争前进行的计算，该国百分之六十三的工业设备由从国外进口的机器组成……为了现在在没有外国进口的情况下实现我们工业的完全重新装备，有必要在苏联建立所需的新技术装备的工程工业分支。”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为了生产新的、更现代的机器，就必须先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

“但试图用我们自己的资源解决这一任务……将预设一系列生产和再生产周期的组织，而这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因此，重新装备我们工业的任务必须通过从国外进口更现代化的机器和设备来完成。从时间上讲，这将为我们节省数十年。<sup>57</sup>”

在某一方面，索科利尼科夫允许自己夸大其词。苏联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工程能力仍然闲置，而这种闲置可以通过比这位财政人民委员暗示的少一些的新建设来减少。除了这种论辩上的简化，他的推理是合理的。

在党代会上，索科利尼科夫以一种愤慨的口吻，鲁莽地宣布斯大林对两条总路线的阐述“完全是错误的”。俄国被降格为殖民地的问题根本不存在：相关的选择是资本进口和粮食销售，作为进口材料和机器的载体。排除了外国贷款，这位财政人民委员坚持认为，农业的进步可以在没有工业所需的巨额资本支出的情况下维持。国民收入最快的增长将来自“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路线”。<sup>58</sup>

解决了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没有心情容忍这种批评。“每个人都知道，”他告诉党，“我们目前有义务进口设备。但索科利尼科夫将这种必要性转化为一个原则、一个理论、一个发展前景。这正是索科利尼科夫的错误所在。”俄国必须实现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巨大转变。“难道，”斯大林问道，“索科利尼科夫不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情吗？”索科利尼科夫正在提议“对我们国家进行道威斯化”。他会顺从资本家，允许德国

通过向俄国出售机器来满足其赔款支付。但俄国无意“为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而继续是一个农业国；……我们将自己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斯大林断言，这“是我们的总路线的本质，是其基础……索科利尼科夫同志不愿理解这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sup>59</sup>

苏联的工业化现在被牢牢地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而“一国社会主义”反过来又被定义为经济自给自足。第十四次党代会确认了斯大林对经济政策的新权威，并重新分配了许多职务，以反映改变了的权力分配。加米涅夫失去了对莫斯科苏维埃的控制，并失去了他在政治局的席位。季诺维也夫保留了他在政治局的职位，但失去了列宁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得到了扩大，以容纳新加入的斯大林亲信。

索科利尼科夫失去了他在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资格，并被解除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职务。此后，他被派往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在那里他看着切尔文卷首先被剥夺了它的黄金平价，随后又受到出口禁令的限制。作为他保持沉默的奖励，托洛茨基毫发无损。但这种喘息是暂时的。在几个月内，由于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原因，他也卷入了一场与斯大林类似的、力量悬殊的斗争。

## 六、托洛茨基的替代方案

根据大多数历史记载，托洛茨基在 1925 年至 1927 年间的观点是一种奇特的组合，融合了季诺维也夫的理论抽象和神话般的“托洛茨基主义”，后者被理解为 1924 年底“三驾马车”所给出的定义。托洛茨基被描绘成相信俄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以与社会主义欧洲的经济联盟为前提。“不断革命论”被当作需要西方无产阶级经济支持的证据。由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不断革命论”重要性的评估与这一分析不符，因此它被忽略了。1925 年初，托洛茨基写道，该理论的相关性“完全属于过去”。这是一个党史问题。它没有为“对我所谓的‘悲观主义’态度的影射和提及”提供任何理由。<sup>1</sup>

正如本研究第一页所指出的，与斯大林的辩论的真正起源具有更实际的性质。在 1922-1923 年，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达成了和解，条件是通过原始社会主义积累使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在 1924 年底，布哈林通过否认短期内资本稀缺的存在，“解决”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当时没有意识到任何矛盾，于是承诺党将进行快速工业化，却未能挑战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的概念。有一段时间，对富农征收高额税收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托洛茨基认为，只要布哈林-斯大林的伙伴关系存在，工业化就无法从苏联的资源中获得资金，因此他得出了列宁在 1920-1921 年得出的结论：俄国必须通过重新融入世界经济来增加其资本存量。

在所有可能的时间中，1925 年是最不合时宜的，托洛茨基经历了一场既突然又彻底的融合主义转变。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是，融合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争议再次浮现，动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根基。一些因素促成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这一年春天被任命到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尽管第十二次党代会的工业报告见解深刻，但它主要是政治理论家直觉性的工作。被调任到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使托洛茨基自战时共产主义以

来首次直面经验性的经济问题。他在主要特许委员会、电气技术委员会和一个专门的价格和质量委员会任职，试图重新审视苏联的政策。他几乎立即修改了自己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特许权、外国贷款以及工业化期间外贸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1925年令人震惊的理论和政治重组宣告完成。在几乎凭习惯性地鄙视索科利尼科夫的政策之后，托洛茨基现在取代了他这位幻灭的对手，成为与西方达成和解的最坚定的支持者。随着布哈林和斯大林支持孤立主义，1920-1921年的分歧在每一个重要细节上都得到了再现。1925年充满了历史重演的怪异氛围，托洛茨基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立让位给了托洛茨基与布哈林之间的新敌意。斯大林，凭借其自给自足的工业化计划，得以抓住并占据令人羡慕的政治中间立场，这个位置他后来用来平衡布哈林对抗托洛茨基，并完成了对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的积累。在通过参考对资本主义稳定的恐惧来讨论“一国社会主义”的起源之后，我将以类似的方式分析托洛茨基的立场，从他评估欧洲最新发展开始。

## 从帝国主义理论到融合主义

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他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及之后的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本书已多次提及。在1925-1927年，这种影响仍然存在；托洛茨基用他1921年在共产国际报告中首次设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稳定化问题。方法论是相同的；但通过考虑新的因素，它得出了与1921年制定的结论直接矛盾的答案。分析中的关键变化再次涉及商业周期问题。

托洛茨基承认欧洲已经成功地重整了其事务。然而，他仍然否认实际资本或生产力一直在增长。由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恢复正常投资将使欧洲回到一个常规的、传统的周期。事实上，这个周期并不明显，托洛茨基将其缺失归因于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基本改变。直到1913年，欧洲国家享受了数十年的扩张，在寻找市场的过程中征服了世界。这个时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结束。在增长时代持续期间，马克思的节律周期理论是有效的。

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贫瘠而不充分的市场似乎已经阻止了欧洲的复苏，导致“停滞……伴随着剧烈的上下波动，使得甚至无法辨别一个正常的景气”。马克思的理论需要修正：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表明，景气变化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改善的可能性。但健康人的心跳和病人的心跳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没有死亡，它还活着——我们在 1921 年说——正因为如此，它的心脏会跳动，并且会有景气变化；但当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处于不可能的环境中时，它的脉搏跳动不规则，很难检测到正确的节律等等。这就是我们在欧洲所目睹的。”<sup>2</sup>

资本主义体系的驱动力已经被麻痹；新投资被推迟，因为现有工业部分闲置。美国的贷款将促进货币稳定和国际金融结算；但它们不会减轻欧洲的长期困难。美国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却拿走，通过入侵欧洲战前市场来加剧欧洲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道威斯计划”不能被视为“治疗”；它是一种化妆品，掩盖了资本主义走向不可避免毁灭的趋势。就像一个在多个信托公司有投资的金融家一样，美国正试图从每个欧洲国家榨取利润。没有一个国家被允许建立哪怕是暂时的优势；竞争正在大西洋彼岸得到监管；市场被小心翼翼地分配，以维持一种“腐烂的平衡”。<sup>3</sup>

平衡的目标是一个美国的幻想。市场的丧失将导致欧洲的对抗在达到可比生产水平之前，就达到战前的激烈程度。狭窄的市场将更快地被过剩的滞销商品所淹没；更低的国民收入将激起更暴力的阶级斗争。<sup>4</sup> 除非美国允许欧洲在世界需求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否则国际革命将恢复其进程。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在不将同样的矛盾转移到其自身经济的情况下从其新地位上退缩。无论哪种方式，资本主义都无法实现持久的稳定化。<sup>5</sup> 世界事务中唯一真

正稳定的因素是“军事主义的不间断、自动化增长”，这是由资本主义无法将消费与生产相匹配所导致的。<sup>6</sup>

与布哈林-斯大林对西方的预测不同，托洛茨基在欧洲的衰落中看到的不是封锁或孤立的威胁，而是一个独特的俄国机会。自 1920 年以来，那些强调资本主义黯淡未来的党的发言人，同时都指出了苏联市场的巨大潜力。1925 年，托洛茨基遵循了这一模式。工业报告已经提到了欧洲对俄国粮食的兴趣。现在，西方重工业的困境和欧洲对出口的挣扎，正值苏联需要新工业设备的时候变得尖锐起来。既然这两个体系的需求如此便利地互补，托洛茨基推断俄国可以为欧洲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将超过所有英国殖民地的总和”。<sup>7</sup> 例如，如果英国投资了用于武装干涉的 1 亿英镑在俄国，“我们现在无疑已经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战前生产水平，向英国资本支付了高额利息，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已经提供了一个巨大且持续增长的市场。”<sup>8</sup> 在另一个地方，托洛茨基写道：“毫无疑问，英国经济将从与俄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好处……但这需要一个宏伟的计划、大规模的信贷，以及让英国工业的重要部分适应俄国的需求。”<sup>9</sup>

从这个角度看伦敦谈判，托洛茨基没有将其视为绝望的原因。恰恰相反：与麦克唐纳的讨论标志着西方第一次觉醒，预示着历史正在不可避免地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发生，为欧洲合众国制造了政治障碍。但托洛茨基从未放弃最终客观经济力量将战胜人为障碍的信念。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暂时扭曲了他的判断。然而，到了 1925 年，他认同了加米涅夫在 1921 年向第十次党代会汇报孤立问题时所表达的观点。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世界分工和由此产生的交换，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盛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其他国家盛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被破坏……我们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掌握国家政权并拥有信托公司和辛迪加这

一事实，丝毫没有扰乱世界分工，因为世界分工源于自然环境和民族历史的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sup>10</sup>

换句话说，俄国的政治孤立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孤立。斯大林意图在国际革命发生之前将俄国与西方隔绝，这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欧洲政权的更迭将是一个事件，一个时间点。而历史的力量是通过时间发挥作用的；欧洲合众国未来的基础，就蕴含在当前世界经济的需求中。沿着这些思路推理，托洛茨基正在完成一场个人演变，这场演变早在 1917 年之前就随着帕尔乌斯的国家理论而开始。

麦克唐纳的下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将对苏联发展的整个阶段产生不利影响。托洛茨基意识到保守党不会永远执政。随着他们的离去，会谈可能会重新开始。与此同时，其他机会也会出现。间歇性的金融谈判在巴黎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1926 年 2 月，当这些谈判即将恢复时，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描述了法国可以从对俄国出售机器中获得的巨大好处。为了鼓励苏联购买，他建议法国应该借给俄国 3 亿卢布。作为回报，苏联政府可以遵循拉科夫斯基在伦敦开创的先例。俄国可以支付高于市场利率的利息，差额用于解决沙皇债权人的索赔。托洛茨基计算，这种安排的额外成本每年仅为 1200 万卢布，这对于一笔等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希望在 1925-1926 年投资于新工业建设总额三倍的贷款来说，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价格。<sup>11</sup>

国际经济的普遍状况，促使人们得出乐观的结论，即甚至美国也可能被说服，通过与俄国达成协议来缓解竞争和战争的威胁。尽管美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但他们与欧洲同行一样，不愿意忍受利润率下降。在讨论美国的全球地位时，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必要修改他前些年所做的分析：

“美国正在遭受过剩之苦。在内部市场的范围内，它已经达到了某个极限。只剩下小幅发展的空间，然而直到现在，美国一直在以一个不断扩大的半径持续螺旋式发展。为了防止螺旋在突然撞上世界市场强加的障碍时破裂，美国资本必须将其他所有人都推到一边并扩大市场。但仅仅通过经济手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市场是零散的——必须通过武力将其他人推开，向后推。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军事主义的真正疯狂发展。”<sup>12</sup>

托洛茨基的世界观在逻辑上过于完美，以至于与现实世界不符。在 1925 年夏天，他勤奋地告诉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如果美国向俄国提供信贷，就可以制定一个为期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联合经济计划。<sup>13</sup> 美国人于 1926 年 2 月做出了回应。一位匿名的华盛顿发言人指出，美国没有动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工业已经完全就业，而且苏联政府欠美国 4 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sup>14</sup> 纽约州商会主席欧文·T·布什则更加不客气：

“俄国的当权者嘲笑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然而他们却带着空空的金库和伸出的双手来乞求资本。他们说：‘我们已经拿走了你们在俄国投资的东西，请再来投资一些吧。’托洛茨基先生，世界上有太多其他地方是尊重义务的……我们基于道德理由拒绝承认俄国。我们指责那些对美国理想一无所知的人，除了美元之外没有别的理想。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屈服于贸易收益的微妙论点，并承认了俄国。从肮脏的商业角度看，他们获得利润了吗？他们除了麻烦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吗？他们为了国际法而卖掉了自己的遗产。”<sup>15</sup>

托洛茨基认为这种道德说教与斯大林试图通过理论上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来阻碍历史的做法一样荒谬。在索科利尼科夫被迫从融合主义后退的几个月中，他这位昔日的对手看到了新的特许权可能性。在四年的时间延迟之后，托洛茨基决定，如果俄国率先采取更灵活的态度，资本家可能会被鼓励表现得更明智。这里应该指出，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估并没有与他之前的观点相矛盾。在 1920-1921 年，他曾认为俄国太穷，无法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自那

时以来，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一场更明显的帝国主义斗争也将伴随着争夺和垄断原材料的激烈竞争。随着美国侵入欧洲既定的供应来源，似乎有理由认为俄国现在可以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1925年7月，托洛茨基在对一个德国工人代表团讲话时主张：

“我们自己对特许协议一直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过于谨慎。我们太穷太弱了。我们的工业和整个经济都被摧毁了，我们害怕外国资本的引入会破坏仍然脆弱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我们在技术上仍然落后。我们有兴趣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速我们的技术进步。特许权是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尽管我们的经济已经巩固，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巩固，我们现在比几年前更倾向于向外国资本家支付巨额资金，以换取他们参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sup>16</sup>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党对特许权计划的幻灭感明显变得更加强烈。托洛茨基忽视这种趋势是一种纯粹的愚蠢行为。仅仅六周前，斯大林还故意将特许权与旧政权的污名和资本家命令下的“奴役条款”联系在一起：

“沙皇俄国……向西方列强授予特许权并接受贷款，从而给自己套上了半殖民地存在的枷锁……几乎不需要证明，这条道路……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没有在三年反对所有国家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流血，只是为了在内战胜利结束后第二天就自愿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sup>17</sup>

斯大林发表这样的评论是意料之中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假定工业投资可以凭空变出来。托洛茨基更关心索科利尼科夫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如何融资？正如他对德国代表团所说：

“当我们认真地着手更新我们的基本资本时，特许权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一定的积累……但我们的储蓄不足以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工厂的更新和扩张。我们需要信贷，也需要特许权，以加速我们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群众的福祉。”<sup>18</sup>

尽管特许权计划失败了，托洛茨基仍然满怀希望地寻找它可能被证明有价值的迹象，认为“一个更活跃的特许权政策时期”可能即将来临。他对他在被任命到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时正在进行的两项谈判感到特别鼓舞。其中一项，利纳金矿项目，于1925年4月30日被暂时接受。协议中包括主要矿区，作为回报，苏联政府获得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并且英国特许权人承诺提供冶炼厂和采掘设备。第二项重要协议于1925年6月签署，给予W·A·哈里曼在高加索的恰图里锰矿20年的租约。当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时，关于库页岛有争议的归属权也通过石油、煤炭和木材租约的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资本家能被说服参与俄国的工业建设，托洛茨基预见到“外国工厂、外国生产技术，以及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储蓄的资源为我们的经济融资”将被转移到我们国家。<sup>19</sup> 第聂伯罗斯特罗伊联合体，是迄今为止计划中最大的电气化项目之一，似乎非常适合外国合作。效仿列宁在1920-1921年的例子，托洛茨基认为邀请资本家来更新和扩张扎波罗热地区的冶金及其他工厂是很自然的事情。铝厂和化工厂的建设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融资。重型电气设备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外国信贷购买。<sup>20</sup>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主义的债权人。“好吧，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从封建主义的乳房中获得滋养的吗？历史已经偿还了这笔债务。”<sup>21</sup> 托洛茨基迟来的赞同了一项即将被废除的政策，他正在犯下他之前在1920-1921年和1923年犯过的错误。他正在让历史的辩证法掩盖目前在党内运作的远为重要的辩证法。

他代表主要特许委员会，尽职尽责地努力消除外国对征用的担忧，并说服西方俄国将履行其义务。他驳斥了斯大林的孤立主义，否认党曾有意，甚至曾认为俄国可能在经济上成

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他徒劳地附和索科利尼科夫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已经进入了世界分工体系，因此受制于管理世界市场的法则”。<sup>22</sup> 试图将俄国与欧洲有意识地分离的想法，是对过去低贸易水平的一种复古反映。“然而，随着进出口的快速增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个高度个性化但仍然是组成部分。”<sup>23</sup>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经济生活报》上写道，“我们正在从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有机体，转向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sup>24</sup> 工业未来的增长将带来外贸的巨大增长和“进口的巨大扩张”。如果国民收入翻一番，托洛茨基预测外贸总额可能会增长十倍。<sup>25</sup>

只有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短视下，任何党员才会在 1925 年认同这种令人反感的观点。索科利尼科夫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他正在捍卫自己创立的既定立场，以对抗他认为在经济理论领域是傲慢的暴发户的批评者。但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表达的任何观点都可能立即受到怀疑，仅仅因为它来自他。索科利尼科夫可以声称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但恰恰是在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影响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曾发现自己处于彻底的冲突中。托洛茨基本人曾创立了斯大林目前正在使用的整个理论武库。在 1921-1922 年，他曾贬低特许权，并阐述了最早的稳定化理论版本。在 1923 年，他曾接受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概念，并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样，主张俄国的资本需求必须在国内得到满足。当斯大林和其他人开始对索科利尼科夫的融合主义吹毛求疵时，托洛茨基已经用他反复的军事干预预言铺平了道路。这个人的整个形象已经变成了一个顽固的革命者，在欧洲无产阶级解除围困之前，捍卫着堡垒俄国对抗真实和想象中的外国威胁。然而，到了 1925 年，甚至托洛茨基对军事危险的评估也完全被重新制定了。

军事力量依赖于工业；而工业依赖于外国机器。因此，俄国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外贸易关系多元化：“我们的国际关系越是多种多样，”托洛茨基解释说，“我们的潜在敌人就越难打破它们。并且……即使战争或封锁真的发生，我们仍然会比在一个‘自给自足’因而发展迟缓的情况下强大得多。”<sup>26</sup> 据说德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子。在工业化时期，德国积极地扩大了对外贸易。然而，当 1914-1918 年的敌对行动导致几乎完全的封锁时，德国拥有一套异常灵活的生产设备，这套设备被充分利用于军事目的。如果俄国处于战争状态，试图规划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是合理的。然而，托洛茨基现在觉得在和平时期效仿德国的经验并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是势在必行的。为了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将融合主义概念转变为一个系统的工业增长战略——并犯下了政治自杀。

## 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战略

从工业化辩论的第一阶段开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并非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在俄国建成，而在于如何构想这项任务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从孤立主义前提出发，主张重工业必须比消费品部门发展得更快。对轻工业的投资要推迟，直到国内工程工业能够提供所需的资本设备。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颠倒的优先次序。到 1925 年春天，当党获悉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关于冶金业的计划时，他的不满已经很明显了。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抱怨说，计划中的承诺过多：它们基于“不真实的信贷”，并将导致一场危机。<sup>27</sup> 他含蓄地评论了后来的货币扩张，警告说所涉及的证券并不代表真正的储蓄。它们只是“计算和分配真实价值的辅助工具”；它们没有增加“作为生产扩张基础的实际商品总量”。在 1924-1925 年，存款和活期账户平均为战前水平的 11%，<sup>28</sup> “这是我们储蓄量小的显著迹象之一”。

托洛茨基和索科利尼科夫都意识到，仓促尝试扩张工程和冶金工业不仅会引发通货膨胀，还会干扰未来的粮食采购，扰乱出口，加剧不理性的自给自足冲动，并导致对其他工业部门的严重忽视。托洛茨基展望未来，意识到在“基本资本”被用于建设工作期间，轻工业将受到影响。“商品荒”会加剧，而“比例性”将被破坏：

“如果我们突然将我们的资源……转移到制造新机器上，我们要么会破坏经济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一个给定部门中基本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必要比例，要么如果我们保持这个比例，我们将大大降低整体发展系数。对我们来说，发展速度的降低比进口外国机器和我们通常所需的外国商品更危险得多。”<sup>29</sup>

这段摘录的最后一句话为理解这场历史性对抗提供了关键。必须非常强调的是，到1925年，托洛茨基相信俄国必须回到他在《总结与前瞻》中讨论过的传统贸易模式。在这一点上，他与索科利尼科夫完全一致：

“我们绝不能……忘记沙皇俄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之间存在的巨大相互依赖性。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我们工厂和作坊近三分之二的技术设备过去是从国外进口的。这种依赖在今天几乎没有减少，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在国内生产我们所需的机器，在经济上几乎是不划算的，无论如何，超过总量的五分之二，或者最多超过一半。”<sup>30</sup>

在电气技术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提供了他设想的斯大林政策替代方案的更具体例子。他对发电站建设所涉及的漫长建设周期已经感到担忧，在1925年7月，他提出如果对保护主义的理解过于死板，这个计划将被进一步推迟。俄国不应该要求国内工业生产所需的多样化设备，而应该集中生产需求量最大的项目，进口那些更复杂和昂贵的。在不切实际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如果组件可以在西方购买并由苏联信托公司组装，至少部分工作可以在国内完成。“电气工业，”托洛茨基宣称，“绝不能因盲目保护主义措施而阻碍

电气化……最重要的是……电气工业绝不能……立即承担太多新任务。”他继续说，“我们必须……专注于必要的最少产品，但在其生产中努力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巨大成就。”<sup>31</sup>

就像在沙皇时期一样，俄国应该进口技术“诀窍”，通过“技术帮助特许权”或技术援助协议来使工业现代化。在1927年初，托洛茨基举了一个这种安排可以带来的好处的例子。外国专利、蓝图和说明书将一台涡轮机的规划成本从总成本的7%降至2.5%。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接受外国监督代表着一种“残酷的依赖”。但他问道：“哪种更好；独立生产一台质量差且昂贵的涡轮机，还是依赖性地生产一台更好的涡轮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他写道：“那种以蜗牛般的速度让我们前进，并附加乐观主义的独立性，是一种反动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哲学是一种反动的哲学。”<sup>32</sup> 俄国必须“通过巧妙地利用源自……世界分工的资源”来跃入未来。<sup>33</sup>

投资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托洛茨基敦促，社会主义规划者应该学习资本主义信托公司的行为。为了防止过度资本支出的危险，信托公司在繁荣时期故意让小竞争对手成长起来。当随后出现收缩时，那些规模较小、不稳定的企业就会崩溃，落入工业巨头手中。通过这种方式，信托公司以完全虚构的成本扩大了它们的生产能力。“换句话说，一个资本主义信托公司努力只满足现有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增长进行扩张，尽可能地将与波动条件相关的风险转移给较弱和偶然的的企业，这些企业仿佛形成了一个生产性储备。”<sup>34</sup> 托洛茨基认为世界市场可以为俄国执行完全相同的储备功能，从而允许最经济地使用国内储蓄，并防止通货膨胀性的超支。

这个类比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如何提高苏联整体增长的速度。正是对速度和节奏的强调，促使托洛茨基的敌人指控他是一个“超工业化者”，一个不加选择的工业化拥护者，不惜侵犯农民的福利。然而，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对增加粮食出口的焦虑也促使

他将世界市场作为消费品工业的“储备”潜力来考虑。为了维持联盟，他现在准备采取一个更永久的“商品干预”计划。在1923年，他对俄国农民和欧洲资本家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盟持批评态度。但到了1924年4月，当他反对采取积极贸易顺差政策时，他评论道：“我们不能封锁自己；我们必须借助外国商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相应工业部门的利益行事。”<sup>35</sup>一个月后，他暗示可能有理由对贸易垄断进行某些“改变”和“改进”，目的是使其更加“灵活”和“有弹性”。<sup>36</sup>在1925年，他以一种新的、面向外部的“比例性”解释表达了同样的情绪：

“问题在于，通过及时帮助加速世界经济中那些有助于全面加速发展的要素的比例，来保持工业主要部门和整个经济之间进步的比例。”<sup>37</sup>

这种对工业化期间外贸作用的强调，凸显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差异，并澄清了对托洛茨基立场传统解读中的误解。季诺维也夫担心联盟的命运，除非国际革命为俄国带来欧洲的工业资源。托洛茨基同意俄国农业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由欧洲工业来平衡。但他认为没有理由因为欧洲落后的政治发展而阻止贸易的完全恢复。从经济角度来看，欧洲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几乎没有实际后果。如果革命明天到来，同样的分工仍然会盛行。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在提供信贷方面可能会更自由；除此之外，不会有实质性区别。着手实施自给自足的发展计划将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符。

至于党对商品干预的不信任，托洛茨基将其归因于“对外国市场的被动恐惧……这导致了封闭的国民经济理论”。<sup>38</sup>托洛茨基认为，所有类型的进口只有在贸易没有得到适当规划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负面后果，他将完全的内部比例性视为一个错误的目标：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独立的含义：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还是一个强大的经济……我们对独立或自给自足的理解是什么？自然……没有所有基本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没

有电气化，就不可能获得经济实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未来几年承担起实现所有经济部门的比例性，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外国市场的任务……

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储蓄分配给太多新的产品、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这真的会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蜗牛般的速度。在这条路上，毁灭正在不可避免地等待着我们。我们经济政策的基本标准必须是速度——积累的速度，物质价值增长的速度。”<sup>39</sup>

真正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制定一个贸易计划，使其能够惠及俄国自己的工业。答案将通过一个比较系数系统来提供，该系统将俄国的生产与世界的价格和质量标准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俄国商品与一个类似的外国产品在质量上的比例是 1:3，而相应的成本价格比例是 3:2，那么通过将这两个比例相乘，可以得出系数，即  $1/2$ ；这是一个衡量俄国生产效率与外国生产效率的指标。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没有必要“为每一个单一商品建立一个系数，只需要为那些可以作为代表的‘接头商品’建立系数”。质量系数比成本的相应数字更难得出，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以纺织品为例，这是农民预算中的主要项目之一，质量可以通过耐用性和颜色牢固度来衡量。结果将是“一个用数量来描述质量的描述”。<sup>40</sup> 进口计划将重点关注那些苏联工业显示出最不令人满意的系数的商品。

为了维持贸易垄断，这些系数也将作为投资决策的指南。托洛茨基写道，苏联工业是“一个正在受到世界资本攻击的战斗前线”。<sup>41</sup> 一个糟糕的系数将标志着工业战线上的一个薄弱点，并提醒规划者需要进行资本增援。这个过程将如下运作：

“如果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我们的比较系数特别不利，那就需要从国外进口成品、专利、技术和新设备；或者我们可以求助于外国专家或邀请外国利益方接受特许权。因为……特许权政策只有在基于广泛阐述的比较工业系数系统时，才能……得到适当的规划。”<sup>42</sup>

一旦系数投入使用，衡量走私对国家经济防御造成的压力将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较系数对我们来说，就像机械师在机车上用的压力计一样。外国生产的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经济存在的基本因素。如果我们与这种生产的关系是 1:8 或 1:5，那么外国生产迟早会刺穿贸易垄断。”<sup>43</sup>

虽然系数将起到预警系统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国内市场必须通过真正努力为农民提供可接受质量的低成本消费品来确保。托洛茨基担心斯大林对轻工业的漠视会完全切断与农村的商业关系。1925 年的采购运动表明，只有当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措施时，粮食和原材料才会自愿地被带到市场上。而且激励措施必须是真实的；农民不会因为囤积无用的现金而无休止地信任国家。据估计，非法的进口现在每年达到 1.5 亿卢布，大约是 1924-1925 年记录进口数字的 20%。<sup>44</sup>

利用对外贸易作为轻工业储备来阻止走私的想法，证明了托洛茨基忽视农民的指控是错误的。他渴望节约稀缺资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投资的政治和经济回报最大化，这实际上直接导向了将大部分投资用于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消费品工业的结论。同样的推理也有重要的政治含义，这将对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后来的观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战时共产主义初期的极权主义是源于对消费者的冷漠态度。然而，当 1925 年的商品荒使工业能够继续制造劣质商品时，托洛茨基顽固地试图向管理者灌输认识到“消费者观点”的必要性。<sup>45</sup> 当然，他的直接动机是维护垄断。然而，通过承认消费者的利益，他意识到俄国的政治退化与错误的经济决策程序有关：

“我们绝不能通过官僚主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拥有最大主动性、个人活力、毅力和意志的数百万群众，他们感知并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

就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致命敌人……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成长下才有可能。”<sup>46</sup>

在他的个人笔记中，托洛茨基写道，一个有效的经济政策“没有国家舆论，尤其是党的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控制是不可能的”。<sup>47</sup> 这些评论与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在关于**突击**的辩论中采取的立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然而，无论一个人对消费者抱有多大的同情，都必须与俄国的客观环境做出某种妥协。托洛茨基承认，消费者的需求仍然必须被技术上的必要性所修改。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满足个人的每一个奇想，而是缓解无法忍受的短缺。俄国不需要一个适合不同社会阶层的产品的贵族：需要的是“大众”产品，“民主”产品。<sup>48</sup> 就像在1920年一样，托洛茨基敦促产品标准化和工厂专业化。<sup>49</sup> 理想情况下，他期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品标准化，生产过程合理化，企业专业化，以及将整个工厂转变为整个联盟的单一制造体中的巨大组成部分”。<sup>50</sup> 原材料和半成品将根据预定的规范准备。标准化生产将有助于制造廉价的农用设备，从而推动农业的社会化。标准化运动的基本模式将由比较系数通过参考世界市场来指导，其成功也将通过比较系数来衡量。

鉴于他个人政治地位的弱势，托洛茨基试图通过赋予他的提案以历史法则——劳动生产率法则——不可侵犯性来增强其说服力。据说提高生产水平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sup>51</sup> 外部强加的必要性将迫使俄国首先赶上并最终超过西方的发展速度。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熟悉的俄国问题，正如托洛茨基试图在《总结与前瞻》中证明的那样。在1925年，他写道：“我们没有选择发展速度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之下。”<sup>52</sup> “我们知道历史的基本法则——最终那个确保人类社会更高经济标准的制度将获胜。”<sup>53</sup>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理论视为一种投机性的转移，一种试图在一个不可能有先验答案的领域寻找确定性的尝试。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各种政策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国际竞争中为俄国争取任何可能的优势；但历史最终将决定哪个体系将是胜利者，哪个是失败者。托洛茨基承认，“如果资本主义不仅有机会萌芽，而且在先进国家开始其生产力的长期发展，那么在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来假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结论可以得出：“首先为资本主义世界描绘一个奇特乐观的未来，然后绞尽脑汁试图从中找到出路，这是毫无意义的。”<sup>54</sup>

尽管他认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辩论本质上是空洞的，但托洛茨基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不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斯大林坚持将俄国的未来视为一个需要孩子般信仰和准神学诡辩的问题，那么党可能会因默认而输掉这场历史性的竞争。在他自己对斯大林强加于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定的评估中，托洛茨基特别强调了两点。首先他写道：

“认为在高工业水平上实现经济独立的道路会导致一个封闭的封闭在自身的国家-经济单位，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只有通过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才有可能赶上并超越世界经济。”<sup>55</sup>

其次，他认为，虽然两个阵营的学说正确地描述了当前世界的政治划分，但它与经济学无关：

“国际分工源于经济和历史原因。我们国家已经转向其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而人类的其他部分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事实绝不消除了国际分工或由此产生的联系和依

赖。我们革命最初几年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是封锁。摆脱封锁意味着恢复经济联系，这些联系是从世界分工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中产生的。”<sup>56</sup>

如果不是 1926 年与季诺维也夫的纯粹机会主义政治联盟，托洛茨基对工业化的分析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地被等同于这位前三巨头的学究气。事实上，这个联盟只是为持续的歪曲运动提供了额外的燃料。斯大林的宣传家们竭尽所能地灌输指控，称该国两位领先的悲观主义福音传道者已经进入了一种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合作。据说这种所谓的悲观主义反过来解释了对国家工业基础以不可能的速度扩张的疯狂要求。当托洛茨基的提议被比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有工业倡导者中最狂热的一位——的提议时，这些指控变得更加令人信服。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详细审查托洛茨基自己支持者的著作，但为了额外的澄清，有几点观察是必要的。

在与托洛茨基合作的众多次要人物中，可能以外交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最始终如一地认同融合主义观点。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中，托洛茨基和克拉辛经常进行私人接触，定期就审查中的议题交换手写笔记。克拉辛在 1924 年 7 月写的一张这样的笔记表明，资本进口是两人一直在讨论的话题之一：

“在国家领域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和主要是一个彻底重新装备几乎所有工业的问题。我们的生产资料即使管理良好，也已经无法提供廉价产品。没有外国贷款，没有对特许权政策的根本改变，我们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sup>57</sup>

自战时共产主义结束以来，克拉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推动外国贷款和特许权的机会。然而，上述这封信特别有趣，因为它表明克拉辛可能在鼓励托洛茨基重新审视他许多早期观点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到 1925 年夏天，贸易垄断的两位最杰出的捍卫

者都同意需要克拉辛所说的“慢性商品干预”。<sup>58</sup> 如果克拉辛没有在 1926 年初秋去世，有充分理由怀疑他最终可能会加入托洛茨基，公开反对斯大林。

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工业投资委员会才华横溢的主席皮达可夫，同样对当前陷入孤立主义的趋势持批评态度。他估计一个五年工业计划每年将需要价值 2.5 亿卢布的机器进口，他认为俄国对欧洲的依赖是不容置疑的：

“党绝不能忘记，苏联的经济只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发展。一个正确的指令……关于采取果断措施旨在系统地增加我们的出口，只能被解释为增加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因此，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在未来将不得不……增长……这种对世界经济依赖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殖民或半殖民地依赖的增长，而主要是与其他国家贸易联系的增加……这意味着作为买方和卖方，苏联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扩大了。这些其他国家是……资本家。”<sup>59</sup>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为比皮达可夫或克拉辛都更高产的作家，在他最近被翻译的著作《新经济学》中对工业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他基本上认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概念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方案；它是一个经济“法则”，与在市场上运作的“价值法则”形成对比。他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即没有贸易垄断，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对对外贸易作用的精确观点，特别是他对进口的态度，很难确定。在一个地方，他赞成从国外购买机器，认为重工业的快速扩张将需要投资于“鉴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存在，其建设绝非首要重要性”的企业。<sup>60</sup> 然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

“我们可能限制我们的资本支出并更快地发展轻工业的想法，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这个想法……是通过与 1921 年的类比来维持的，那是一个我们的工业才刚刚开始从前所未有的崩溃中恢复的时期。”<sup>61</sup>

虽然这句话旨在启发布哈林-索科利尼科夫学派，但它仍然暗示了与托洛茨基在重点上的重要差异。还有其他理由认为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紧密。在1923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首批支持拉林商品干预提案的人之一。到了1925-1926年，他的热情就不那么明显了；与托洛茨基不同，他认为消费品的进口很可能产生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原则上，外国商品的进入对苏联工业构成威胁，尽管它们的销售利润可以提供急需的收入来源。在托洛茨基寻找一个安全阀的地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害怕在农民需求的压力下打开一个闸门。<sup>62</sup>

此外，他对特许权的看法自热那亚会议之前几乎没有改变：“这项[政策]的结果可能是……注入国家经济体内的特许权剂量过大可能会开始破坏它，就像它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破坏了较弱的自然经济一样。”<sup>63</sup>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参与了巴黎和伦敦的贷款谈判，同样对更直接的财政支持前景持怀疑态度。他对帕斯沃尔斯基-莫尔顿著作的反应与索科利尼科夫一样充满忧虑。他认为，如果苏联在热那亚的呼吁成功了，由此产生的利息支付将是无法忍受的。俄国“不仅会被阻止发展，而且在经济上甚至会比目前的情况更倒退”。<sup>64</sup> 由于这些原因，《新经济学》过度强调了内部积累。托洛茨基在1923年可能认同这种态度；但在1925年他肯定不认同。

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一些文件倾向于证实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一种潜在的紧张状态下合作的猜想。1926年5月，托洛茨基写道，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法则与价值法则之间在国内进行斗争的概念是研究苏联经济“最高度富有成效的，更准确地说，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但除非给予正确的解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方法与孤立主义显著兼容。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有必要在一个封闭的苏联经济范围内开始这项研究。但现在危险正在增长，这种方法论方法将被转化为‘一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成经济前景。”必须努力表明“经济联

系和相互依赖的增长为工业‘独立’做好了准备”。他还必须仔细探讨来自俄国高工业品价格对贸易垄断造成的威胁：

“价值法则和社会主义积累法则的相互作用必须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然后就会清楚地看到，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价值法则被来自外部价值法则的日益增长的压力所补充，而外部价值法则出现在世界市场上。”<sup>65</sup>

1927年1月，托洛茨基的担忧再次被察觉：

“我们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资本主义包围圈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法则与‘我们的’价值法则的决斗被世界价值法则所包含，而世界价值法则……严重改变了这两个法则之间的力量关系。”<sup>66</sup>

在许多方面，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合作类似于他1920年早期与列宁的合作。在劳动动员的第一阶段，列宁和托洛茨基倡导了许多相同的政策，尽管他们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以同样的方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热情地支持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增长的要求；但他不认同托洛茨基的融合主义。充其量，他认为比较系数的概念是“一个富有成效的问题框架”，即如何将俄国与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sup>67</sup>因此，当他的敌人们一贯断言他希望遵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中提出的著名类比，通过像宗主国剥削其殖民地一样剥削农民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时，托洛茨基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

“布哈林几乎所有针对我的论战……都是这种类型。他没有采纳我本人所描述的、具有其内在联系的思想，而是诉诸一种只能被称为文学掠夺的方法：他抓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一个短语或片段，添加一些东西，然后宣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短语，加上布哈林主义的扭曲，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他从我未校正的速记稿中撕下几个词——忽略了我演讲中完

全明显的含义——然后用所有这些东西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充其量只是布哈林观点的反面；它当然不代表我自己的观点。”<sup>68</sup>

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隐藏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悲惨的后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几乎完全参照俄国内部经济来解释农民问题，即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则在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下看待同一个问题，将其与走私的危险以及从俄国境外对其施加影响的力量联系起来。他抵制任何可能导致苏联工业品价格上涨的措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如在 1923 年一样，他认为工业化（在其内部融资的程度上）必须基于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农业税。作为这些直接补贴的交换，农民将享受到工业品价格的降低，这部分是通过商品干预实现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工业的狭隘依恋和对内部积累的完全承诺，使得托洛茨基的行为看起来越来越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反常。当斯大林最终认识到高工业品价格应该被视为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工具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背弃了反对派。然而，在考虑托洛茨基新观点的灾难性政治影响之前，首先应该提及它们可能的经济含义。

## 托洛茨基的融合主义评估

尽管托洛茨基的工作基于历史而非理论洞见，但他对比较系数的讨论揭示了对对外贸易中固有的潜在经济收益的深刻理解。只要苏联的生产成本反映了要素禀赋和社会成本，这些系数就会产生一个理性的贸易模式，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回报最大化。通过生产自己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并进口其他商品，俄国将获得许多通常归因于自由贸易的好处。由于苏联的成本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也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支持一个温和保护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会给予现有工业恢复失去的效率的机会，并允许较新的“幼稚产业”扩张和实现规模经济。然而，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逻辑失败了。这些系数旨在鼓励对外贸易更系统的规划，从而帮助发展一个整体的计划经济。如果后者导致价格结构以有利于优先

部门的方式确定，那么系数的成本方面将变得完全人为化。简而言之，为了理性地运作，这个系统需要国内市场与计划贸易的结合。而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曾主张，社会主义政策的目的必须是吞噬市场并消除它。

一个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涉及托洛茨基提出的允许系数影响投资决策的建议。资本支出将以严格的顺序安排，以防止资源分散得太稀薄。只要托洛茨基使用这种推理来抹黑对重工业的投资，他就不存在不一致的危险。一般来说，生产者商品工业将获得次要优先权，而世界市场则作为储备。问题在于如何为轻工业制定一个明确的方法。在这里，进口也将缓解国内的短缺。但由于担心有人会试图破坏贸易垄断，托洛茨基曾将系数比作一个“压力计”，含蓄地倡导在轻工业中采取“宽广战线”战略。苏联工业的总体状况是，大多数轻工业系数将是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在这个部门会出现一种将资本分散得非常稀薄的诱惑——事实上，稀薄到如果不进行相当大的裁量，这个系统很可能表现出至少一种有限形式的自给自足倾向。即使建立了并遵守了严格的投资顺序，工业战线上“薄弱点”的相继消除也将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

不论存在这些逻辑上的困难，托洛茨基所阐述的目标是完全值得称赞的。通过进口大部分新的工业机械，他将避免斯大林的自给自足计划注定会产生的复杂问题。对重工业的投资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成熟，这延迟了任何缓解商品荒的严肃尝试。尽管苏联的工程能力在 1925 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事实仍然是，许多类型的重工业设备在俄国从未生产过，这将需要昂贵的新建设。不可分割性，或者出于经济考虑而发起足够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在重工业部门最为突出。互补性现象也增加了开支。新工业必须获得重要的服务。相关的制造过程通常必须位于彼此合理接近的区域，或者进行重新安置。因此，扩展工程工业最

终需要大量的补充投资，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进口来避免或推迟。即使是为一个工业自给自足计划提供必要的材料，也取决于最初对冶金业进行大量资本分配以实现现代化。

托洛茨基战略最独特的特点是它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制定了一条中间道路；也就是说，在重工业投资政策和一种言语上支持轻工业但行动上并非如此的政策之间。托洛茨基的建议可能允许在不过度激怒大多数农民的情况下实现高工业增长率。到 1927-1928 年，粮食市场的崩溃最终消除了任何关于农村在没有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售粮食和材料多久的疑虑。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粮食销售量仅达到革命前的一半；而且，除非传统上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能够从该国其他地方获得食品，否则原材料生产无法完全恢复。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倡的社会主义道路都逻辑地导致了一个僵局，这个僵局必须在 1929 年之后通过强制集体化和农村阶级斗争的重新爆发来克服。

托洛茨基的论点是出于他目前的信念，即在苏维埃政权八年之后，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就像欧洲和俄国的利益一样，最终已经趋同。与此同时，他认为俄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不会在没有得到制成品作为回报的情况下提供粮食和其他出口产品。而国内消费品的生产也无法在没有通过出口支付的机器进口的情况下得到令人满意的增加。在某个时刻，这个循环必须被打破。托洛茨基希望 1925 年这个丰收年将提供必要的突破。商品干预、特许权和其他形式的资本进口旨在服务于相同的目的。核心问题似乎是启动一个适当的贸易周期，然后让它获得自身的动力。托洛茨基总结了拟议周期的基本轮廓，其方式强烈地让人想起索科利尼科夫在 1923 年对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讲话：

“我们的经济系统已经成为世界系统的一部分。这使得交换链中有了新的环节。农民的粮食被换成外国黄金。黄金被换成机器、工具以及城镇和乡村所需的其他消费品。用黄金购买并通过粮食出口支付的纺织机械为纺织工业提供了新设备，从而降低了运往农村地区的

布料价格。这个循环变得非常复杂，但基础保持不变——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sup>69</sup>

如果俄国遵循了这样的战略，工业化很可能在没有回到镇压和粮食征收的情况下发生。然而，到 1925 年底，情况可能已经恶化到即使是托洛茨基的计划也会遇到严重障碍。工业和农业都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但商品荒仍然存在，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粮食罢工威胁。旧的战前“比例”已不再足够。与战前时期相比，俄国正在经历农村对农产品消费率的显著提高。贫农，他们消耗了他们产出的大部分，并且经常是市场上的净买家，人数大幅增加，这为可上市粮食盈余的扩大制造了障碍。作为可销售农产品的供应者，地主庄园已经被数量多得多的富农和中农农场所取代。富农和中农有粮食可卖，但考虑到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普遍存在的贸易条件，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仅靠市场不足以既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充足的食物，又留下盈余用于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税可能会被上调，直到通过试错确定适当的水平。商品干预和更低的工业品价格会使财政压力对富农来说更可忍受，或许能维持出口并帮助提供一个答案。毫无疑问，一个大规模的外国贷款可以极大地促进整个工业化进程。

在 1926-1927 年期间，俄国在寻求贷款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从德国获得了 1.4 亿卢布，从维也纳市政府获得了 5000 万卢布，以及其他各种短期和中期信贷，总计达到 6 亿至 7 亿卢布。<sup>70</sup> 特许权政策带来的资本流入微不足道，主要流入采矿业。约费（Joffe）代表主要特许委员会，在 1926 年秋季将总额定为 4880 万卢布。<sup>71</sup> 资本进口的真正潜力无法确定。斯大林将特许权和贷款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相提并论，有效地劝退了大多数投资者，使他们不敢冒因国有化或债务违约而再次蒙受损失的风险。因此，如何为工业化买单的

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这个问题，连同关于工业不同分支之间资源分配的更基本辩论，为1926年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主要来源，并导致托洛茨基公开谴责“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 七、托洛茨基对“一国孤立”社会主义的攻击

1925 年底，托洛茨基避免了直接与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结盟，他希望斯大林对工业的热情最终能使其认识到布哈林孤立主义的危险。然而，出口计划的失败反而说服斯大林，将俄国所谓的自给自足奉为党的教条。商品荒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1925 年 12 月初，李可夫在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表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目标必须下调。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他提到了一份来自格卢克的笔记，其中带有有限的乐观色彩。但在 1926 年 2 月，捷尔任斯基提供了一份关于紧缩必要性的详细报告，预见到工业将“有序地缩减”，并强调轻工业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托洛茨基一直以日益增长的担忧关注着斯大林-索科利尼科夫的辩论，他现在担心商品荒会恶化。他认为，富农是“对规划者的威胁”；除非有所行动，否则俄国可能会被判处真正的“蜗牛般速度的孤立”。经济危机最终说服托洛茨基采取行动。他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汇集了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但其异质性从一开始就使其脆弱。托洛茨基相信，为了从长远上重新定向苏联，党的领导层必须改变。然而，他对俄国孤立的批评只起到了巩固他自己作为融合主义倡导者地位的作用。反对派的其他成员谴责斯大林对富农的半心半意抵抗，但质疑托洛茨基融合主义计划的政治和经济可行性。

### 1926 年的进攻与反攻

1926 年初，托洛茨基迈出了他流亡生涯的第一步。中央委员会定于四月召开全体会议。为了在危机气氛持续期间改变党的观点，托洛茨基提议即将到来的议程应集中讨论经济问题。他自己的笔记显示了他希望提出的事项。首先，必须通过增加产量来降低高昂的工业成本：

“我们出口困难的基础是农业和工业生产之间的不成比例。这并不是说农村生产得太多，而是城市生产得太少。工业生产的高成本与其产量不足密切相关。”<sup>1</sup>

在工业产出扩大之前，耐普曼将继续依赖稀缺性价格而繁荣，转售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品以用于资本主义积累。投资也必须以一种方式进行，以尽量减少对贸易垄断的危险。“比较定量和定性系数的问题，”托洛茨基写道，“……是我们经济发展命运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速度不仅取决于运动的速度，还取决于其方向。”<sup>2</sup> 国内资源必须从不那么重要的政府部门转移出来，并且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来吸引外国技术。不重视高速度的必要性将是“疯狂的”。“世界市场不会等待。农民也不会等待。”<sup>3</sup>

当李可夫在四月初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党的官方立场时，托洛茨基认为他最坏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尽管决议正式承认了商品荒和购买外国机器的必要性，但它也要求“采取系统措施，使我们的经济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特别有力的措施”将被用于“发展那些我们对外国依赖感最强的[重工业]经济分支”。计划对农业税的累进税率进行大幅提高。然而，斯大林关于“储备”的号召也得到了批准，以便在未来出现计划错误时提供一些灵活性。<sup>4</sup> 李可夫最近含蓄地低估了1925年的困难，他解释说必须避免紧张的计划，“因为之前计划中轻微的不一致[就会]在整个经济环境中造成紧张”。<sup>5</sup>

托洛茨基将该决议视为在富农投机者面前的隐蔽退却。他提交了相当于他自己的报告，警告说，重复前年秋天发生的事件将导致“带有负号的社会主义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将取得对社会主义的优势”。为了与私人制造商竞争，国有工业需要新设备。李可夫盲目地在“决议中将一方面发展出口（和进口）的要求与另一方面‘独立’的要求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矛盾”。“工业化的速度，”托洛茨基告诉中央委员会，“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国际条件制约的。”<sup>6</sup>

在十五页的打字修正案中，他逐点列出了他的反对意见。外贸计划的中断导致了对工业增长步伐放缓的过度反应。如果允许工业继续原地踏步，结果将是“农民与外贸垄断，即与社会主义工业的斗争”。商品荒是“明显且无可辩驳的证明，表明国民经济资源和储蓄在国有工业和经济其他部分之间的分配……没有获得必要的比例性”。国家预算的累进税将成为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支持工业的主要杠杆。“农村上层”，即富农，应该被迫提供更大份额的资源，以确保工业的领导作用。作为接受这一额外负担的诱因，应该允许农民享受商品干预的好处，而这现在变得“不可避免”。还可以尝试通过实验性地提高某些批发价格来转移新经济政策中的人们的利润。但任何零售价格的上涨都完全不可接受；党必须“想方设法降低它们”。除了商品干预，进出口计划的构建主要应着眼于加速工业的技术再装备。<sup>7</sup>

拟议修正案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涉及储备问题。托洛茨基将世界市场视为唯一真正的储备，他接受了外汇基金是“我们对世界生产权利的保障”的观点，特别是当出口依赖于不可预测的收成时。然而，目前俄国无法承担积极的贸易顺差；货币储备将不得被牺牲。预算盈余，作为考虑的第二种储备形式，如果有了适当的财政政策，将是多余的。旨在避免计划紧张的备件和材料储备同样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的计划对于一个商品荒时期来说已经过于松弛。任何进一步的改变都将是“极小主义”，并将不必要地阻碍增长速度：“只有当我们的工业与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产品产量、成本和质量方面的差距得到清晰且切实的缩小，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迈进才能得到保障。”<sup>8</sup>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被否决是预料之中的事。斯大林无法承受在支持工业化方面被托洛茨基彻底超越的场面。为了保持与布哈林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在工业和农业之间保持平衡，这使得托洛茨基成为一个激进的工业化者和对党的团结构成威胁的人。斯大林以李可夫为代言人，计划采取一种温和和妥协的姿态，以将托洛茨基暴露为一个不可救药的

农民敌人。如果不是一个意外，这个策略在 1926 年春天可能完全成功。问题在于斯大林没有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两位前三驾马车不愿意在新一轮工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排除在外，他们对李可夫的决议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再次像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一样，将富农的危险放在首位。然而，现在，自 1923 年以来一直坚持需要从农民经济开始的两人，认为富农的力量是工业弱点的反面。托洛茨基从一个最不可能的方面获得了支持。这两个立场之间的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斯大林立即问道：“这是什么？一个集团？”<sup>9</sup> 这个问题是过早的，因为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加米涅夫提出的替代方案因“对索科利尼科夫同志的某些让步”而存在缺陷。<sup>10</sup> 然而，李可夫的决议甚至更不可接受。当他自己的提案被驳回时，托洛茨基有保留地投票支持了加米涅夫的提案。不久之后，托洛茨基与他的老对手们会面，讨论他们的共同点。然而，在讨论结束之前，他再次发烧，不得不前往柏林进行为期六周的治疗。

党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修改他们的策略。1926 年 5 月，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在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支持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批准下，发起了一场广为人知的运动，通过行政命令降低零售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力图证明反对派夸大了商品荒的程度。作为《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支持这一策略，并强烈谴责那些要求过高农业税的“超工业化者”。

<sup>11</sup>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利用季诺维也夫对与西方妥协的敌意，在萌芽阶段就分裂这个不太可能的联盟。在 4 月 13 日对列宁格勒听众的一次演讲中，这位党的书记猛烈抨击“奴役性贷款”和“奴役性特许权”。他重复了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的论点，声称：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现自己身处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如果它不为自己生产设备和生产资料，如果它停留在必须将其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线相连的那个发展阶段，它就无法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停留在这一阶段就是放弃我们自己并屈服于世界资本。”<sup>12</sup>

仅一周后，一场全面的反攻正在进行中，其主题是苏联的独立性，显然是在暗指托洛茨基。4月21日，《真理报》刊登了米柳京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称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俄国的工业增长受制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控制”。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们”是错误的。俄国将操纵资本主义世界来刺激自身发展：

“声称我们发展的速度必须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来决定，意味着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外部包围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实际上并不存在，并且希望永远不会存在。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通过发展……我们的工业，为我们的经济争取更大的自力更生。”

李可夫在4月23日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某些同志”曾提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自相矛盾，因为它既倡导发展贸易又倡导经济独立。他解释说，出口和进口将使俄国能够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并总结道：“在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丝毫不会排除，而是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我们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扩张。认为工业化进程意味着某种经济‘自我封锁’的必要性，这是不正确的。”同样不正确的是忽视了在国家内部发展“那些其增长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苏联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独立性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必要性。<sup>13</sup> 5月，布哈林补充了李可夫的言论，声称“如果我们永久地从国外进口产品，最终我们将陷入对外部世界的奴役性依赖”。<sup>14</sup>

7月10日，这场新闻宣传运动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的社论。这篇党的喉舌文章表面上是在攻击工人反对派，但却揭示了该团体领袖之一梅德韦杰夫在1924年写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曾敦促通过鼓励特

许权来抵消销售危机导致的工业收缩和失业。<sup>15</sup> 《真理报》对这种失败主义措施被考虑感到愤慨，它惊呼，梅德韦杰夫的政策将导致“通过允许特许权资本挤压，来清算[我们的]独立国有工业”。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特许权人和外国银行家在我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国际资本将开始支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业将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私人领地和子公司，而我们数百万的无产阶级将成为外国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当然，党并不反对所有特许权，只是反对“无限制的特许权……[即]将我们的工业拱手让给国际资本”。这将是一种“道威斯化……这是资本主义回归的序曲”。国家必须在四月决议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厄克特奴役”之间做出选择。提及厄克特似乎是故意为之，旨在提醒季诺维也夫他在1924年讨论与麦克唐纳的谈判时所持的立场。

从表面上看，这次精心策划的宣传策略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到1926年，人格暗杀已成为党报的主要任务之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有了足够的机会对《真理报》的侮辱变得麻木。然而，攻击不仅限于宣传。从1926年1月的第一周开始，莫洛托夫领导的一队斯大林代理人，在列宁格勒党的组织各个层面清除并替换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伏龙芝在一次手术中于十月去世，他曾接替托洛茨基担任战争人民委员。随着伏龙芝被迫同意手术的谣言流传，剩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正从军队中被清除。在2月中旬于列宁格勒举行的一次特别党代会上，布哈林驳斥了所有关于领导层堕落的言论。他坚称，季诺维也夫的所有错误都源于一个来源：

“我们认为有必要果断地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提出的一个立场……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得到来自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经济帮助，我们将因技术落后而灭亡。”<sup>16</sup>

斯大林和布哈林通过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犯有相同的罪行和缺点，帮助将这两个团体联合在一起。1926年7月中旬，当党的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十一位支持者共同提交了《十三人宣言》。新反对派的领导人要求对富农采取联合的“强有力的税收压力”，并警告说，最富有的农民现在控制着“数亿卢布”。<sup>17</sup> 第二份文件也呼应了这一指控，并辩称“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的角色和政治上的自信”。<sup>18</sup> 季诺维也夫谴责斯大林对党的机器进行“宗派”滥用，并宣称托洛茨基在1923年警告机器政权威胁时是正确的。在具体的工业问题上，皮达可夫再次呼吁建立比较系数制度。随后的辩论中，双方情绪激动。捷尔任斯基对批评者发表了尖刻的控诉，随后倒下，死于心脏病发作。托洛茨基在回忆这次全会时简短地写道：“一项关于对全球发展进行比较控制的修正案被否决了。”<sup>19</sup>

尽管反对派领导人努力维持他们的攻击，但《真理报》关于右倾危险的社论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显然产生了一些影响。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季诺维也夫似乎要求托洛茨基收回他关于特许权的挑衅性观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反对派领导人否认有任何意图接受将“国有工业拱手让给”外国资本。他们宣称：“如果我们不破坏我们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我们的经济计算在任何程度上建立在外国特许权上，将特许权给予……一个主导或……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将是不可想象的。”<sup>20</sup> 托洛茨基在1926年9月写的一份手稿提供了他策略性退让的额外证据：“特许权可以而且必须在我们的经济中占据一个严格有限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将特许权的限度扩展到某一点之外，给予外国资本对我们经济一个主导甚至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企图，都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背叛。”<sup>21</sup>

这种反驳对社会主义不忠指控的努力反而引发了更恶毒的攻击。7月28日，布哈林告诉列宁格勒的听众，梅德韦杰夫的立场无异于“要求毫无保留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拱手

让给外国资本”。他断言，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中间阶段，它基于“对在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导致了“彻头彻尾的清算主义”。托洛茨基相信，“如果国际革命没有胜利，反革命的农民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在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中发展出的基本立场。”<sup>22</sup>

在 1926 年的夏天和秋天，为了安抚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显然避开了资本进口问题，而将他的火力集中在富农身上。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事态现在进一步削弱了反对派的公信力。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收获，富农释放了他们的粮食库存。政府最近的开支削减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到八月，党的官方声明充满了乐观情绪。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6-1927 年的控制数据预见到国有工业的支出将达到 8.45 亿卢布。几周后，政府将这一预测提高到 9 亿卢布，如果包括电气化则超过 10 亿卢布。进口计划被明确制定出来以满足工业需求，机器进口将增加三倍。接替捷尔任斯基担任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的古比雪夫声称，百分之八十的进口账单将用于工业和工业生产的原材料。1926 年 10 月，当党召开会议时，粮食价格比一年前低了整整百分之十二。采购量大大超过了去年的数字。这所有迹象都表明，反对派在危机即将过去的那一刻感到恐慌。对公众和普通党员来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和解似乎是一次纯粹的、毫无原则的互相拯救尝试。

坚信当前的改善仅仅是周期性的变化，托洛茨基对党的领导人的自满感到震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催生了一种基于虚假和危险的安全感的“犯罪性自满”，这种信念认为“一旦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了政权，它就可以将自己排除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之外”。这位党的书记创造了“一种令人沮丧的理论”，“一场意识形态的化装舞会”。<sup>23</sup> 此外，斯大林所说的不是一个经验事实，即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仅限于“一个”国家；他是在谈论“一个单独国家的社会主义”。<sup>24</sup> “新理论的捍卫者，”托洛茨基写

道，“……以封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前提……他们除了‘孤立的经济成就积累’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对‘欧洲和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事件视而不见。他们‘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发展方案’是‘民族局限性加上地方主义自负’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布哈林‘小市民式的、尾巴主义的工业化关系’。”<sup>25</sup> 在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夕，托洛茨基写道：

“实际上，我们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方向恰恰在于我们终于摆脱了我们封闭的国家-经济存在，并正在与欧洲和世界市场建立日益深刻的联系。将我们发展的全部问题简化为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并认为正确的政治策略……可以使我们摆脱世界经济的依赖，意味着陷入可怕的民族局限性。不仅是理论上的考量，而且出口和进口的困难也为此提供了证据。”<sup>26</sup>

如果俄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没有被利用来促进社会主义，那么“欧洲工业以廉价商品的形式对我们经济的压力……将获得一种无法忍受的性质”。<sup>27</sup>

将近两年时间，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关键理论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在1926年深秋，他终于决定展开斗争。很难想象一个时机选择得更糟糕的决定。1926年7月，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在党代会前不久，托洛茨基也同样被罢免。加米涅夫失去了候补委员资格；布哈林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皮达可夫被最高国民经济会议解雇。从这一刻开始，战争将仅限于言辞。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限制，并面对经济上明显（尽管是暂时的）的改善，托洛茨基甚至未能明智地选择他的言辞。

## 第十五次党代会

当会议召开时，加米涅夫领导了反对派的攻击。他演讲中唯一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发现，“发展速度的滞后不仅会以无畏舰和大炮的形式对我们造成伤害，而且……也会在价格和……进出口等简单问题上造成伤害”。<sup>28</sup> 同样，季诺维也夫问道：“能否说我们只受到

武装干涉的威胁？不，绝对不能。世界市场的法则对我们施加着一定的力量。”<sup>29</sup> 尽管他们做出了这些努力，但两人都未能掩饰他们与不断革命理论家的联系所带来的不自在感。加米涅夫温顺地承诺，他永远不会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来反对列宁的观点，并最后强调他准备好接受党的纪律。

托洛茨基期待已久的演讲同样缺乏新意。他惊呼，对超工业化主义的指控与他所谓的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一致：“我问你们，如果我们不相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建议被动地等待欧洲革命，并且如果有人愿意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建议掠夺农民？目的是什么？这让人无法理解。”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是基于不断革命理论的，而这个理论与目前的争论无关：

“同志们，我完全不打算提出不断革命理论的问题。这个理论与目前的争论没有关系——无论它是对的，还是错误的、不完整的——它与目前的争论没有关系。我已说过几十次。无论如何，无论是 1923 年的反对派，还是 1925 年的反对派，都……对这个不断革命理论没有丝毫责任……我本人很久以前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归入了档案。”<sup>30</sup>

托洛茨基偏离了对融合主义的一致阐述，转而回到他那些可疑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大力推广的学术技巧：引用语录。他指出，列宁曾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它需要至少几个主要国家的积极合作，其中我们不能包括俄国”。最近关于“独立”问题的宣传浪潮排除了任何解释这种“合作”目前可能通过与资本主义欧洲的临时和解来实现的努力。托洛茨基没有深入阐述这一主题，而是将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义为农村-城市矛盾、住房短缺和失业都已被消除的社会。

直到他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当他转向布哈林的“蜗牛速度”理论时，他才试图阐明他对政策的真正看法。

“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什么是出口？……什么是进口？……你看。在进口和出口问题上，布哈林同志的整个理论……立刻瓦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取决于速度，而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目前最直接地……由材料和设备的进口决定。当然，一个人可以‘脱离’外汇短缺，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只能做一次。这样的‘脱离’无法重复。我们的整个建设都是受国际条件制约的。”

托洛茨基补充道，忽视世界经济将像在隆冬时节赤身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一样愚蠢——试图忽视寒冷。<sup>31</sup>

至少，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可能会期望他用对革命未来的有力信心表达来否认悲观主义的指控。他拒绝如此绝对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暗示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之前在西方发生。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再存活五十年，俄国将窒息。在演讲的初稿中，托洛茨基曾更仔细地概述了这一推理。他认为，欧洲持久的经济复苏将扩大粮食出口，增加农民购买力，并使贸易垄断面临不可抗拒的压力。如果欧洲衰落——但只是逐渐衰落——那么苏联的出口将萎缩，发展速度将减慢，社会主义工业将变得容易受到美国竞争的影响。<sup>32</sup>通过对会议提供一个对他立场的不足解释，托洛茨基留下的印象是，他像季诺维也夫一样，不“相信”革命。事实是，他认为“相信”或“不相信”、“信心”或“悲观主义”这些所谓的选择是太微不足道而不值得讨论。在1927年3月，他写道：

“关于速度、关于一方面是‘蜗牛速度’另一方面是‘超工业化主义’的争论有什么普遍意义？这不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或不可能的争论，而是关于哪种政策能带来成功的争论。在我看来，首先有必要提出并强调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因为这符合现实；其次，因为这是阐明速度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我的基本信念是我们只能……通过明智地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来加速我们自身的发展，那哪里来的投降……？”<sup>33</sup>

托洛茨基的日记笔记，日期为 1926 年 11 月，进行了如下分析：

“工业和农业价格之间的关联（剪刀差）必须是决定农民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农产品出口使内部剪刀差受到世界市场的控制。

我们的工业产品比外国产品贵 2 到 3 倍。考虑到质量，我们的工业产品比世界市场的产品吸引力低 3 到 4 倍。

只有当这种关系改变时，外贸垄断的保留才有可能……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那种认为可以脱离世界市场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是破产的。”<sup>34</sup>

在另一个场合，托洛茨基指出：“……甚至提出任何特定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都是……不可容许的。这个问题是由两个系统、两个世界阶级之间斗争的动态决定的。”<sup>35</sup> 斯大林已经超越了科学预测的范畴，他炮制了一种神秘的信条，并自封为宗教裁判官，以铲除异端。通过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拒绝在斯大林的层面上进行辩论，托洛茨基浪费了他最后一次在全体党员面前嘲笑其敌人的机会。他的演讲更像是一种辩解而非攻击，这招致了学究式的回应。

奥辛斯基，一位最近重获尊重的昔日反对派成员，声称托洛茨基低估了俄国战前增长的程度。四十年的资本进口为持续发展准备了所有必要的条件。托洛茨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障碍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市场对发展的这种限制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但这并没有剥夺它们独立经济增长的可能性。”<sup>36</sup> 拉林故意通过声称反对派对“超工业化”的要求逻辑上暗示着“对外国资本增加可塑性”来加剧混乱。这一事实的证据可以在反对派领导人未能与索科利尼科夫撇清关系中看到，“他对外贸垄断持否定态度，并有将国有托拉斯转变为与……外国资本合资的……企业的想法”。<sup>37</sup>

会议决议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它毫无顾忌地重复了指控，称反对派的政策将提高工业品价格并引发新的销售危机。当同一决议呼吁购买机器以加强工程工业并减少俄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时，当地的党代表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超工业化主义者会反对。难道这不正是无论西方发生什么都能保证俄国生存的最可靠方式吗？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绝对否定的。在党代会一个月后，他更积极地解释了原因。

## 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上诉

1926年1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理论上，共产国际是其每个成员党的最终裁决机构。托洛茨基因宗派主义指控被开除出俄国政治局后，他要求并获得了上诉权。他从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出发，通过提出一个反对经济孤立主义的全面论点，弥补了他在党代会演讲中的弱点。

他解释说，工业社会倾向于本质上相似。此外，它们不可避免地通过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相互联系。“这是基本事实，因此，即使是试图将一个单独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从它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联系和相互依存中撕裂开来，这种做法也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由生产力对民族国家反叛引起的。“回到孤立国家的道路已不复存在。”俄国自身从沙皇时期受益于法国资本进口的历史演变，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而俄国的过去将会在社会主义的未来留下它的印记：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这些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杠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同意。但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工厂和车间的技术设备实际情况如何。根据统计计算……战前我们工业的63%的设备由进口机器组成。只有三分之一是国内制造的，即使这三分之一也由最简单的机器组成；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项目来自国外。因此，当您

环顾我们工厂的技术设备时，您亲眼看到了俄国——以及苏联——对世界经济的物质化依赖。”<sup>38</sup>

斯大林的孤立主义源于一个假设，即资本货物是一种自然资源。在重建时期，当旧政权的革命遗产尚未付诸行动时，这种原始的天真情有可原。现在重建时期已经结束，党代会认识到需要进口机器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机器必须主要考虑到轻工业来规划：

“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基本资本，它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任何想象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建造我们所有的设备，甚至是大部分设备的人，都是一个梦想家。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意味着……不是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减少，而是相反，是其增长，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设备和它的经济日益增长的依赖。”

作为历史力量的产物，苏维埃俄国的工业构成了世界分工的一个经验性体现。拒绝用进口来填补苏联设备中的“空白”将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内，俄国的冶金和工程可能使自给自足变得可行。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非同寻常的降低……此外，发展速度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迄今为止，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于记者和决议制定者的梦想中。”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将对所有组成部分行使控制，“即使其中一部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任何讨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而忽视我们的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合作’和斗争这一事实的人，都在从事空洞的形而上学。”

向共产国际的上诉真正表明了托洛茨基的想法，但它没有赢得任何支持者。布哈林和李可夫都坚持认为，托洛茨基只看到了辩证矛盾的一个方面，他没有掌握“依赖”将如何产生“独立”的方式。斯大林再次采用了他一年前与索科利尼科夫交流时的大部分语气：“没有人否认我们的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依赖。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也从未否认过。”

更没有人打算忘记出口和进口：“将社会主义经济描绘成某种完全自给自足和完全独立于周围民族经济的东西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俄国不是黑山，甚至不是保加利亚；而苏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将避免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齿轮”。当托洛茨基谈到资本主义控制时，他是否意味着银行应该被非国有化，工业和交通应该被交出？据斯大林所知，这些政策并未被提倡。但他随后承认：“我不知道……他们在总特许权委员会里在想什么。”<sup>39</sup>

这一阶段冲突的最后公开发言权落在了布哈林身上。在1927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演讲中，他再次辩称，“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增长同时也是我们独立性的增长”。托洛茨基将国际分工与自给自足对立起来，好像自给自足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这不是真的；最终，一个计划经济将出现，它将囊括整个世界，甚至管理分工。当无产阶级专政在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时，将没有必要坚持某个特定的工厂或工厂必须建在我们的“俄国街道”上。“我们到那时的工作将是以一种考虑最有利的地理、气候、交通、技术及其他条件的方式来指导和合理化我们的生产。”有了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工业可以根据纯粹的经济标准来布局：

“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现在世界经济，不幸的是，并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我们正在并且必须努力变得更加独立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当我们听到……我们的‘民族局限性’就在于这个[信念]时，我们只能感到好笑。我们的独立是一种阶级性质的独立，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

布哈林现在确信，俄国的孤立可能会比稳定理论最初似乎表明的持续更久。国际革命因世界被划分为“三个巨大的领域”而停止：“帝国主义世界、正在崛起的东方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这三个领域重新统一之前，可能“会过去一个伟大的历史纪元”。

因此，苏维埃俄国必须为日益增加的战争或封锁的可能性做好准备。<sup>40</sup>

托洛茨基的个人笔记显示，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和之前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中，他最愤恨的是声称他这个红军的缔造者没有认识到进一步军事冲突的威胁。他对那些关于他的“无望、怀疑主义、缺乏信念以及所有其他”的历史性提及感到厌恶，他回忆说，他在1925年就已经解释了贸易与国防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我解释说我们已经重建了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这种依赖将会增长，并且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这是……加强我们对抗军事干预可能性以及对抗持续运作的廉价商品‘干预’的自然途径。我解释说，在当代环境下，国家经济自给自足的问题不能通过建造一堵中国长城来解决，我举了德国的例子……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启示是，我们不需要世界经济的‘独立’，而是需要高生产率的劳动，这只有通过快速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广泛而有见识的利用。”<sup>41</sup>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挑衅并促成与欧洲的贷款和其他协议，托洛茨基最近主张不要干涉英国大罢工。这次罢工于1926年5月爆发，激发了苏联对革命再次崛起的希望。一年前成立的英苏工会委员会被用来向兄弟般的罢工者输送财政支持。托洛茨基嘲笑这个委员会，声称它维持了温和的英国工会主义者的权力。<sup>42</sup>

转而谈到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他为自己辩护如下：

“世界市场每天都在控制着我们的落后，无论是在整体生产方面还是在每个特定分支方面。如何控制？通过价格的变动。斯大林同志试图将我关于世界经济控制的观点……解释为……某种形式的非同寻常的威胁……例如以特许权的形式。当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时，一

个人只能耸耸肩。这个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决定的。列宁说，世界市场将审视我们。”<sup>43</sup>

至于布哈林提及的依赖与独立之间的辩证关系，托洛茨基认为，真正只看到问题一半的是布哈林，他继续用他“孤立发展的奇特方案”来思考。“确实，”他写道，“如果你追问布哈林寻求答案，他会开始‘承认’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但他所有的论点、结论和观点都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经济方案之上的。”布哈林没有看到国家就像商业公司一样——它们要么竞争，要么灭亡。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表明技术设备在两个方面会磨损，即物理磨损和技术磨损。这两种形式的磨损都必须被摊销。一个为安装新技术做出充分准备的资本家，将以低成本的形式获得超过同等的回报。那些没有这样做的资本家则从第一流滑落到第二流，到第三流，并最终走向清算。即使没有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有在“我们不仅达到我们自己的发现和发明，而且也达到世界技术的进步”时才能取得胜利。<sup>44</sup>

以技术变革形式表达的劳动生产率规律，决定了文明的前进运动。资本主义之所以与民族国家发生冲突，是因为“技术创新与民族国家边界之间存在不符”。既然社会主义将在各个方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并且既然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明显结果，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扩展和完善世界分工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种选择是依赖“被遏制和驯化的生产力，也就是……[依赖]经济落后的技术”。<sup>45</sup> 1928年11月，托洛茨基用国际贸易来定义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将意味着对经济基础本身的根本重组，以适应一个更具生产力的国际分工，而这才能为一个社会主义秩序创造真正的基础。”<sup>46</sup>

不久之后，托洛茨基从这个论点转向了公开断言，即官僚主义堕落的苏维埃国家在国际革命到来之前实际上无法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属于预期之外的内容。

鉴于他坚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 1927 年春天，他质疑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建议是否有意义，即俄国应该一直保持孤立，直到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的回答与第一批融合主义者的想法完成了呼应。1920 年，李可夫曾反对劳动动员；他建议恢复贸易将为俄国之后与社会主义欧洲的合作铺平道路。托洛茨基的立场现在与此完全相同：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包围圈内的国际交流兴趣逐年增加。这种交流将通过外贸垄断的方法得到严格的监管。有了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交流将获得一种计划性。这两种制度之间没有鸿沟……相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和进口的适当规范性增长，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控制生产时[将盛行的]商品和产品交流的要素做了准备。”<sup>47</sup>

通过发展与西方的对外贸易，俄国既可以预见也可以为世界革命做准备。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忽略了托洛茨基的融合主义，他们发现将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拒绝与要求俄国仓促工业化协调一致，是令人尴尬的困难。无数的文章和小册子都提出，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可以开始独立建设社会主义，但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对托洛茨基来说，这种分析方案是陌生的（至少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俄国与欧洲的统一将在西方革命发生之前很早就开始；俄国将“融入”欧洲，这种经济共生关系随后将在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联邦中找到政治表达。

为了促进工业化，俄国将不得不系统性地开发其巨大而未被触及的自然资源。在孤立状态下，这是不可能的。“库尔斯克的磁铁矿矿床、乌拉尔的钾矿矿床，以及我们所有巨大的资源，都要求应用国际储蓄和世界技术。”利用西伯利亚的经济潜力将是一个“巨大的国

际任务”。<sup>48</sup> 同样，特许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最近几个月进行了宣传运动，但在1927年3月，托洛茨基再次要求在工业领域给予特许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国资本必须被吸引到那些与世界工业相应部门相比表现出最大落后的工业部门。”<sup>49</sup> 在将与欧洲的关系制度化的同时，俄国也将与欧洲在亚洲、印度以及整个东方的殖民地建立联系。这将为以苏联为枢纽的巨大欧亚联邦创造先决条件：

“我们……相信欧洲的合众国和我们的苏维埃联盟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我们相信……苏维埃联盟是[未来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和亚洲联邦之间的一座巨大桥梁。我们不相信……自由的印度和社会主义的英国会以一种封闭的方式，彼此独立地存在。它们之间的价值交换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种价值交换甚至在推翻英国资产阶级之后仍将继续，并将在一个伟大的联邦范围内完成。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北方的印度——西伯利亚。”<sup>50</sup>

帝国主义理论、稀缺资本问题、对俄国历史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愿景：它们共同推动了托洛茨基的想象力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1927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将特许权等同于沙皇主义和奴役。<sup>51</sup> 与此同时，反对派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分裂，其原因正是如何为工业化融资的问题。

## 分裂与失败

工业定价政策问题是反对派内部关于特许权作用分歧的对应体现。尽管各派系都准备对富农征收更累进的税，但许多追随托洛茨基加入大联盟的人同时呼吁提高工业批发价格。他们对特许权或贷款的信心越少，他们就越倾向于大声倡导内部积累。托洛茨基本人曾同意进行实验性改变，但在1926年9月他写道，“批发价格的上涨必须打击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如果零售价格也开始上涨，我们必须加以控制。”<sup>52</sup> 我已经提到过，这种对定

价问题的谨慎评估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可能产生分歧的根源。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反复主张必须立即提高批发价格。相比之下，季诺维也夫似乎同样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考虑这种政策。<sup>53</sup> 然而，正如季诺维也夫所偏爱的那样，强调直接向富农征税，则会招致超工业化和反农民偏见的指控。

作为反对派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主要兴趣是反驳这项指控，同时保持他的同事们的团结。在 1927 年 2 月，他似乎决定采取战术上的改变，通过与党的领导人一起投票支持批发价格下调来回应他的批评者。他为这个决定辩护时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反对派的“战略路线”一直是降低市场价格。“目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他继续写道，“使得推迟价格下调在战术上成为不可能。”<sup>54</sup> 困难在于，托洛茨基愿意采取这种特定策略，而这超出了他的几位支持者的容忍限度。

斯米尔诺夫和民主集中派立即放弃了他们于 1923 年首次加入的联盟。在斯米尔诺夫看来，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 2 月全体会议上的演讲是所有演讲中“最平淡无奇的”：

“所有尖锐的问题都被故意回避了。没有提及一个关于失业的词，也没有一个关于计划不足的词。相反……他强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在 1926 年 4 月提出的反对派计划。”<sup>55</sup>

随着最近采购活动的成功，投资目标被提高到一个近似于托洛茨基一年前在四月全体会议上所主张的数字。托洛茨基抓住了时机，声称党的领导人已经勉强地证明了反对派的正确性。斯米尔诺夫则更为坦率，他坚持认为以目前的政府收入，该计划永远无法实现。他将托洛茨基的策略解读为意识形态上的倒退、机会主义和投降：“托洛茨基只能向反对派建议一件事——等待，等待，直到他所称的‘革命掘墓人的候选人’斯大林……开始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然后加入他。怎么能说……这是一个策略而不是投降？”<sup>56</sup> 1927 年 7 月，分

裂最终确定。民主集中派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纲领，用批发价格上涨来代替资本进口，作为投资资源的来源。

民主集中派的叛离提出了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党代会后对策略的总体看法的重要问题。“等待”的想法是基于1926年9月中旬所做的一项分析，当时他将党内的统治集团描述为中心派和右翼之间不安全的联盟。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似乎不是一个威胁。斯大林缺乏思想，是一个抄袭者，一个他人提议的“整合者”。在政治上，他充当机器和摇摆不定的政治中间派的代言人。他的用处仅限于他作为“一个刹车，其倾向右倾的集团”的表现。以布哈林为主要代表的富农修正主义者被认为是主要敌人。即使斯大林不理解超工业化他确实表达了无产阶级利益。托洛茨基不怀疑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最终会导致它分崩离析：“阶级利益的逻辑比机器外交更强大。”<sup>57</sup> 反对派将通过从左翼为斯大林和中派的建设性举动提供积极支持，同时继续批评原则性错误来为党和无产阶级服务。尽管他对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仍然潜在的矛盾关系的洞察力值得称赞，但托洛茨基对这位党的书记真正重要性的可悲误解只能导致个人灾难。

在1927年春天，事态发展突然加快。在中国，斯大林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破产，蒋介石屠杀了他的共产主义“盟友”。对反对派来说，现在似乎是时候在所有战线上重燃斗争了。4月15日，托洛茨基就经济政策致信中央委员会、《真理报》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抗议最近全体会议的孤立主义决定。<sup>58</sup> “我们的对外贸易，”他宣称，“将不仅会绝对增长，而且也会相对增长；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是如此。”<sup>59</sup> 一个月后，俄国与英国的关系严重恶化。在对苏联贸易代表团进行搜查后，外交关系完全断绝。一夜之间，托洛茨基在政治上被摧毁。他的敌人迅速行动，将俄国的不幸解读为他们自己的成功。李可夫大声疾呼，英国证实了“那些断言需要……从加强我们经济对世界市场依赖性开始的同志们的立场是错误

的”。<sup>60</sup> 布哈林不慎惊呼，西方正在准备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sup>61</sup> 李可夫支持这一观点，并声称英国正在资助白卫军和保皇派阴谋。<sup>62</sup> 布哈林则回应说，喘息期已经结束，一个充满战争和攻击危险的新时期已经开启。<sup>63</sup> 8月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俄国与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是当前时期的“主要倾向”。<sup>64</sup>

最后的致命一击来自巴黎金融谈判的破裂。在1926年7月，法国接受了一项临时协议，涉及总额为4.5亿卢布和俄国石油出口。随后法国政府垮台。老敌手普恩加莱重新掌权，谈判被推迟。到1927年5月，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普恩加莱提出了解决战争债务和因国有化而对法国损失进行赔偿的熟悉要求。苏联代表拉科夫斯基努力将这个问题摆在法国公众面前，这让他变得尴尬。在1927年10月，巴黎要求将他召回莫斯科，理由是他曾签署一份反对派文件，呼吁外国士兵在发生战争时对无产阶级俄国保持忠诚。实际上，拉科夫斯基的返回标志着与欧洲第二大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终止。苏联媒体随之引发了一波近乎歇斯底里的浪潮。

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可能的境地，反对派领导人决定他们唯一的防御就是攻击。在8月，季诺维也夫曾声称党的领导人正计划承认俄国的债务并废除贸易垄断，以求摆脱战争危险。在拉科夫斯基被召回前不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回应说斯大林正试图通过购买苏联安全来弥补共产国际的悲惨失败。列宁主义的政策不排除局部退却，但斯大林被说成是正在计划进行一次“总”退却。<sup>66</sup> 10月12日，一份集体反对派宣言宣布，普遍承认债务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超工业化的更大延误……外国资本力量在我国经济中威胁性的增长……将我们的国家被外国资本奴役”。<sup>67</sup> 斯大林本应在提供一个体面的妥协方案时与法国达成协议。

这份宣言显然是一项政治举动。该文件在拉科夫斯基被巴黎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五天后，以及契切林同意法国撤回其特使的要求当天，被提交给了政治局。反对派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们希望可以获得政治优势。斯大林回答了这些指控，强调他一直多么理智：他将他的决定建立在“你给——我们给。你提供信贷——你从我们这里获得与战前债务有关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不给——你就不获得”的公式上。<sup>68</sup>

在9月底，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演讲。10月23日，他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为自己辩护。“驱逐我，”他挑战道，“但你们无法阻止反对派的胜利。”<sup>70</sup>他和季诺维也夫都被驱逐了。11月7日，在革命纪念日，他们试图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向公众上诉。工人们冷漠地旁观；党的积极分子诉诸于有组织的镇压。1927年11月15日，两人因煽动反革命示威而被开除党籍。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派不复存在。

在1927年秋天，党的排外情绪肆无忌惮。10月12日，布哈林将托洛茨基的命运作为经济孤立必要性的证明而喝彩。<sup>71</sup>10月26日，他谴责“我们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正统派”对所谓“民族局限性”的反对。<sup>72</sup>在这两次演讲中，他都滑稽地辩称，那些主张废除俄国对资本主义依赖的人，逻辑上应该致力于废除贸易垄断。否则，他们如何才能发展与西方的最大贸易联系？一笔数十亿卢布的外国贷款不会证明出卖俄国的社会主义长子权以换取对外国人的束缚是正当的。

然而，此时，布哈林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为了诋毁托洛茨基而煽动战争恐慌，他同时也在恐吓整个国家。结果是恐慌性囤积；商品荒加剧；富农罢工。流向城市的食物减少到涓涓细流。布哈林突然意识到他自己的政策导致了一个死胡同。在一篇预示着他即将与斯大林决裂的演讲中，他将这场危机归因于投资计划的结构：

“如果我们把资本投资……在轻工业，那里的回报以成品的形式实现得更快，这能加快资本的周转……并缓解商品荒——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摆脱当前局势的出路……在非常大型工厂的投资，例如在冶金等等方面，只有在几年后才能产生回报。结果是我们收钱并进行投资；但消费品市场感受不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快或那么直接的影响。”<sup>73</sup>

一年后，与斯大林的分歧导致了公开决裂。在他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笔记》中，布哈林警告说，斯大林正在用“未来的砖块”建设工业，而忽视了维持“动态经济平衡”的需要。党正在忘记农民、商品荒及其对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sup>74</sup> 斯大林注意到了布哈林的“恐慌”和“困惑”，将这些悲观态度归因于未能理解超工业化需要新的阶级斗争方法。

布哈林并非唯一一个接受新右倾修正主义的人。在 1927 年 12 月，李可夫告诉第十五次党代会，俄国事实上的孤立意味着需要发展重工业。但这项政策将意味着忽视轻工业，并会带来“我们整个商品周转危机”的危险。只有一个解决方案。俄国必须严重依赖机器进口：

“整个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一点是对外贸易。在五年计划中，有必要从以下事实出发……国家超工业化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这种依赖将体现在需要进口外国机器来装备我们的工厂。”<sup>75</sup>

对扩大进口的关切在当时为大多数苏联计划者所认同。然而，李可夫的言论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他像布哈林一样，开始将农民报复的危险与斯大林演讲中似乎隐含的那种投资结构联系起来。因此，一种在托洛茨基的案例中被贴上“超工业化”标签的态度，很快转变为“右倾”，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清洗期间针对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的指控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

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斯大林通过坚持自给自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要来驳斥他的批评者。当前针对苏联的阴谋表明，稳定时期终于要结束了。他借鉴托洛茨基的观点继续说：

“生产力增长与市场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市场问题成为资本主义根本问题的基础……严格来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工厂和企业的利用率不足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加强关税壁垒只会火上浇油。资本主义在现有市场的范围内变得过于拥挤……和平解决市场问题的尝试无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sup>76</sup>

反对派最后的官方声明，呼吁从富农那里强制征收粮食，暗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可能补救措施。斯大林宣布农业必须集体化（通过“示范和说服”的方式）。他承认，商品荒是不可避免的；轻工业必须等待。通过革命合法性措施，必须强迫农民出售粮食——“但这当然不排除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措施。”<sup>77</sup> 从1928年初开始，这些必要的行政措施被自由使用。

1928年春天，斯大林辩称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出口储备。我们需要为工业进口设备。”他早已放弃了降低工业品价格的尝试，现在他采取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立场：价格剪刀差是“一项……为了超工业化利益的补充税”。<sup>78</sup> 听到这个评论，布哈林惊呼卡米涅夫：“斯大林是一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他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为了迎合眼前的需要而改变理论。”<sup>79</sup> 这个洞察来得太晚了。革命已经转了一圈；而向政治和经济极权主义的灾难性冲刺即将开始。

## 八、失败与流放中的融合主义

在这项研究的开头，曾提出托洛茨基对苏联经济政策的评估应从两个时期来看待：战时共产主义和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正如我们现在所展示的，在这两个时期中，托洛茨基观点的独特性都集中在俄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发现自己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多数意见，要么是心照不宣地，要么是公开地，处于冲突之中。当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别无选择只能孤立时，他的对手们却赞成融合。当托洛茨基认可融合时，其他人则主张俄国孤立。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紧张局势，将这种奇特的辩证归因于托洛茨基有意的或无意的个人反常是很有诱惑力的。反对派中一些更著名的成员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他们认为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消除了早期争端的所有实质性原因。对富农的系统性镇压、新经济政策的消除以及对工业的大规模投资：这些政策似乎不仅满足了反对派的要求，而且还保证了俄国向社会主义的迈进。甚至艾萨克·多伊彻在他著名的传记中也提出，托洛茨基已成为斯大林主义超工业化的“真正的启发者和倡导者”。<sup>1</sup> 在大多数同时代人看来，斯大林似乎已经看到了他自己，特别是布哈林，行事方式中的错误，从而使党的左派和中派的政治和解成为可能。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完全专注于内部问题。在流放期间，先是在中亚的阿拉木图，然后从 1929 年 1 月起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上，托洛茨基认为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他被革命滑向专制主义所恶心，他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即斯大林正在将国家引向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对托洛茨基流亡期间的经济著作进行全面研究，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计划。另一方面，由于我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并未在 1927 年底突然消失，因此在这里结束讨论将是误导和不恰当的。托洛茨基职业生涯中许多最大的讽刺，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变得明显，当时战

时共产主义的形式、方法，甚至态度都得到了复兴。快速的技术变革带来了重要的质的差异，但历史相似性不难发现。随着方法的相似，类似的社会矛盾和对立也随之而来。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角度看待这些，托洛茨基比前几章中所阐述的立场更进了一步。他本质上是在批评斯大林那些曾引发他自己与列宁在“突击手”和工会问题上冲突的政策，他得出结论，在国家的政治孤立结束之前，社会主义无法在俄国完全实现。政治退化被认为是经济错误的主要原因。而政治复苏则需要来自一场成功的国际革命的复兴性启发。

### 评估斯大林的“左倾路线”

心理上受到“党性”原则的影响，即使是最坚定的反对派分子也对被排除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之外准备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 1927 年底之前就承认了错误。到 1928 年 3 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斯大林的“左倾路线”描述为“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新政治事实”，并敦促托洛茨基告诉《真理报》，目前的决定是正确的。<sup>2</sup> 斯大林的批评者曾一度冒险犯下“悲观主义”的错误。在 4 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辩称，“我们现在必须冒险偏向乐观……我们必须走向与党派的和解；否则我们面临的将是转变为一个小小的‘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宗派，就像过去许多宗教宗派一样”。<sup>23</sup> “我们在一些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实际问题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减少”是显而易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现在是时候“在新路线的基础上与党的大多数人言和”。<sup>4</sup> 影响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认为斯大林采用社会积累排除了进一步获得外国贷款的任何机会：“苏联政权的反富农政策，伴随着对新经济政策拥护者的压力，只会加剧我们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减少我们本已微不足道的外国工业化信贷机会。”<sup>5</sup> 皮达可夫在 1928 年 2 月与斯大林言和。卡尔·拉狄克认为反对派应该提供斯大林“支持”来对抗右翼，并含糊地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号召，接受“在农村

承担左倾路线的责任”。<sup>6</sup> 1929年初，一次在斯大林条款下的屈辱投降让这两位前“托洛茨基主义者”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托洛茨基徒劳地警告说，斯大林的转变只是一次“之”字形路线，如果反对派在批评上变得松懈，将导致“向右急转”。<sup>7</sup> 他建议，为反对派纲领继续斗争，是“能够给予任何中央的进步举措的唯一适当、严肃和诚实的支持”。<sup>8</sup> 在给拉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支持……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加倍努力争取马克思主义对实际问题的定性；其次在于毫不留情地批评中派左倾主义的要素，意在帮助批评者中最好的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更快地转向布尔什维克立场。不可能有其他支持……我们不仅完全不能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笔记中所说的那样，被动地在中派左倾路线面前排成一列，同样也不能像拉狄克暗示的那样，试图将自己转变为讨好奉承的说客……就像一只没有尾巴的猴子仍然不是人一样，一个基于好建议而把尾巴放在一旁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不是一个中派。此外，斯大林的文章表明他并没有寻求好的建议。”<sup>9</sup>

凭借他一贯的政治敏锐性，托洛茨基认为他的“之”字形预言早在1928年7月就得到了应验。中央委员会决定减轻对富农的压力，似乎预示着李可夫战胜了斯大林，从而证明左倾路线只是一个“插曲”。然而，随着集体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向前推进，在1930年初，很明显“之”字形路线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左官僚冒险主义的纲领。<sup>10</sup> 斯大林已经决定将富农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来消灭。

托洛茨基反对集体化，其原因我已经在另一个语境中提到了。当农民抵制宰杀牲畜的运动时，政府无法提供机械设备作为补偿性马力。托洛茨基认为劳动生产率将严重下降；个人激励将会消失；党最终将被迫进行一场准备不足的撤退。“不可能，”他写道，“用农民

的木犁来创造大规模农业……就像不可能通过把渔船叠加起来创造一艘船一样。”<sup>11</sup> 全面集体化将导致“田地里到处都是杂草”。<sup>12</sup> 如果斯大林坚持这项冒险，资源将从工业中被转移，且在几十年内没有合理回报的前景。只有大规模进口拖拉机、犁和其他机械，才能使少数有盈利潜力的农场站稳脚跟。在 1930 年春天，托洛茨基声称，有了外国机械，“集体化农业可以更容易地度过幼稚病时期，并且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实现大大改善的收成，其出口储备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谷物市场图景……集体化浪潮与技术状况之间存在的巨大失调，直接源于苏联的经济孤立。”<sup>13</sup>

当斯大林在 1932 年春天试图重建农业激励制度时，他通过创建一个集体农庄市场来做到这一点。一旦向国家交付了产品，农民就可以出售他们剩余的任何产品。托洛茨基，作为 20 世纪 20 年代新经济政策最顽固的批评者，称赞这个决定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全面集体化……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可获得的劳动激励……对这一威胁的回应是贸易的合法化。换句话说，……有必要部分恢复新经济政策，或者自由市场，它被废除得太快也太彻底了。”<sup>14</sup> 为了保持一致性，斯大林还应该解散那些目前正在耗尽政府资金而没有任何有益目的的农场：

“为要前跳，必须后退。” 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必须帮助农民加强和发展在实践中经得起考验的可行、稳定的集体农庄。那些对集体农庄感到失望的农民必须尽快被给予权利，返回个体耕作。<sup>15</sup>

应该允许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家庭返回商业化农业。

计划的工业条款部分受挫和混乱的后果也引发了类似的敌意批评。对重工业不均衡的过度强调，重新提出了比较系数和贸易垄断的问题。随着“狭窄点”或瓶颈数量的增加，托洛茨基断言，通过商品干预，将有可能“克服局部危机，削弱局部不均衡，平衡不同部门的

动态均衡，并以此方式保障发展的高速度”。<sup>16</sup> 在 1932 年 10 月，他提出，即使是稀缺商品的最小限度进口，也可以纠正供应中断，并重新激活苏联巨大得多的资源。为了追求自给自足而放弃这些优势，是追随希特勒而不是马克思。<sup>17</sup> 至少的常识让步将要求 1933 年被用作第一个和第二个计划之间的缓冲年。缓冲年的目的是完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危机工作，“清算不合时宜的建设；将资金和资源集中在头等重要的建设上；在工厂有序运行；恢复设备”。<sup>18</sup> “我们将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在六年、七年，甚至八年或更长时间内完成五年计划，如果能缓解不均衡，如果能提高群众的福祉，为经济上的结合扫清道路。”<sup>19</sup>

如果说托洛茨基对计划实际困难的估计源于他在 1925 年制定的超工业化战略，那么他对此刻的计划态度本身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被当前这股“计划狂热”浪潮所带来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所震惊，他开始考虑以“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可能性。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他曾试图通过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倡议来平衡中央指令。但五年计划是盲目的；它没有提供反馈机制，没有根据其自身运作的后果进行调整。因此，对富农的无情攻击在它自身的过度行为中滋生，并直接导致了 1933 年的饥荒。责任完全在于官僚机构，托洛茨基无情地嘲笑他们试图制定“从麦子公顷数到背心扣子”的计划。<sup>20</sup>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验表明，在已有的知识水平下，全面计划是官僚想象的产物。在一篇题为《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强调了在计划和供求之间建立互动的必要性：

“经济中无数的活生生的参与者，无论是国家和私人，集体和个人，都必须通过规划委员会的统计计算，以及通过供求的直接压力来宣布他们的需求和各自的强度。计划……必须得到市场的检验，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来实现。”<sup>21</sup>

在制定一个全面且内部一致的计划之前，苏联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卢布必须对社会主义建设行使双重控制。资本主义的货币核算制度必须完善，不仅要确保经济理性，还要在社会主义中建立一个广泛的激励体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兴趣”必须通过以现金衡量的物质鼓励来激活。通货膨胀已成为苏联经济官僚式无组织化的主要工具之一。

在一份写于 1933 年但未出版的手稿中，托洛茨基对索科利尼科夫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给予了最高的赞扬。他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的发行量必须由黄金储备和“商品货币周转速度”共同决定。随着计划方法的改进，货币发行可以与生产和交换计划成功协调，货币可以脱离其黄金基础。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完全废除黄金和货币。然而，苏联经济中现有的不均衡证明，在整个过渡时期，货币必须保持“一种普遍等价物，因此必须以贵金属为基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实物平衡和行政价格无法替代黄金的公正性：

“铸铁可以用吨来衡量；电力用千瓦来衡量；布料用米来衡量。但如果不将所有部门都归结为同一个价值公分母，就不可能创建一个普遍的计划。如果公分母本身是虚构的，如果它是官僚自由裁量的产物，那么它就消除了和实施过程中检验和纠正计划的可能性。不受稳定货币控制的固定价格，为计划领域的官僚主观主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sup>22</sup>

托洛茨基在经济基础上呼吁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他也毫不回避承认这种制度的政治影响。如果中央集权的决策垄断要被市场所削弱，那么政治影响的某种多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社会的复兴取决于党和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以及创建一个受控的政治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同的社会利益可以竞争。俄国尚未实现一个无阶级社会。因此，基本的政策问题——国民收入的划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工资表的确定——将不得不通过“阶级

斗争和包括无产阶级本身不同阶层在内的社会群体的直接行动”来解决。最终，“有兴趣的数百万人”将利用他们可支配的机构，向决策者表达他们的要求：

“以一种新的计划要素形式出现的切身利益的斗争，将我们引向政治的作用，而政治是集体的经济。苏联社会各群体的装备是（并且必须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只有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在过渡时期为经济提供适当的领导。”<sup>23</sup>

正如货币将为经济决策的调节提供一个共同分母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将确立政治竞争应在其范围内进行的界限。对于群众的意识和意愿，对于“由劳动人民自己日复一日地检验、讨论和批评的集体经济经验”，斯大林的官僚们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命令来替代。

“这，”托洛茨基断定，“是所犯错误的主要政治原因。”<sup>24</sup>

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些错误是目的论计划体系本身所固有的，他试图通过使用野蛮武力来克服社会抵抗。为了审查农民的行为，他建立了一个隶属于新机器拖拉机站的“政治部”网络。在1920年，政治部问题在劳动动员引发的争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十三年后，在1933年，托洛茨基轻率地谴责斯大林的举动，将其定性为“根据（当前）党路线而加强的强制和命令”。<sup>25</sup>

随着苏维埃失去他们最后的独立残余，以及党本身被扼杀，只要斯大林主义政权持续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境遇就不可能比农民更好。在1920年，另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涉及平等问题；托洛茨基的批评者曾要求“均等化”，而不是“突击性”。现在斯大林正在倒退回战时共产主义，将平等视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并在工厂中建立严格的计件工作制度。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项措施也是“经济落后矛盾”的一种表现；俄国并没有向着一个社会

主义的未来迈出大胆的步伐。相反，“经济发展已经与发生在其限制范围内的政治条件产生了矛盾。”<sup>26</sup>

对工会的最后打击是它们在 1933 年被官方“国家化”。劳动人民委员会被废除，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吸收了它的职能和许多人员。劳动纪律和生产增长成为工会的官方责任，优先于传统的保护职能。有组织的劳工成为国家的工具，这与托洛茨基在战时共产主义后期月复一月倡导的政策几乎相同。然而，在 1933 年，托洛茨基复活了最初由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提出的论点：

“工会的相对独立性是苏联国家体系中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纠正，该体系发现自己处于来自农民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之下。在阶级被消灭之前，工人——即使是在一个工人国家中——也必须在他们的专业组织的帮助下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只要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强制机构，工会就仍然是工会。工会的国家化只能与国家本身的非国家化同时发生。因此，随着阶级被消灭而使国家失去其强制职能，导致它自行消融到社会中，工会也同样失去了它们的特殊阶级职能并消融到正在消亡的国家中。”<sup>27</sup>

托洛茨基已经便利地忘记了他自己对工会独立性的原始捍卫者的回答。在早先的辩论背景下，他曾辩称，在国家消亡之前，它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最无情的国家，它专横地涵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sup>28</sup> 只有在斯大林正在复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有限意义上，才能说托洛茨基是苏联超工业化的启发者。托洛茨基本人仍然关心孤立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会以完全的蔑视来对待这种微不足道的赞扬。

## 对苏联实验的最终判断

到他流亡开始时，托洛茨基对热月政变式蜕变的恐惧，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善世界劳动分工的信念融合在一起。这两种对待“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共同作用，加

剧了他对斯大林理论及其实际后果已然尖锐的敌意。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确定，怀疑国家政治保卫局可能对他有图谋，被斯大林的傀儡在所有国家中诽谤和污蔑，并被朋友抛弃，托洛茨基渴望定义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以确保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与那些“追随者”的观点差异不容置疑。为了划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证明他在思想界留下的印记让他的诋毁者相形见绌，托洛茨基现在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决定：他亲自认可了曾被敌人用来摧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

甚至在离开阿拉木图之前，他就曾批评一项新的共产国际纲领，声称“只有当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我们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俄国国内的矛盾或许可以通过“正确的内部政策来调节和缓解”；但它们只能在国际背景下最终解决。<sup>29</sup> 一旦到了国外，他发表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就是一篇题为《不断革命论》的煽动性文章。他宣称，他的目的“绝不是……要说我对革命的构想在我的所有著作中都遵循同一条毫不动摇的路线”。但这句免责声明是多余的；托洛茨基所要做的正是如此，他要展示“不断革命论，即使是在我最早的著作中提出的，尤其是在《总结与前瞻》（1906年）中，其渗透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也远远超过了……当前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回溯性智慧，因此更接近列宁的历史路线”。<sup>30</sup> 尽管他在1905年及之后年的对手们认为俄国尚未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托洛茨基现在声称自己早已预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以及“民族社会主义”的局限性。<sup>31</sup> 在他同样写于1929年的自传中，他坦承：“我喜欢并欣赏纪律和系统……我无法忍受无序”。<sup>32</sup> 在努力为自己的思想注入秩序的过程中，他现在宣称革命在国际意义上必须是持续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更新、更广阔的意义成为了一场不断革命；它只有在新社会在我们的整个地球上最终胜利时才能达到完成。”<sup>33</sup>

他将不断革命论与帝国主义理论相协调，断言因为“生产力……再也无法与民族国家的框架相协调”，因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设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sup>34</sup> 阶级斗争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对不断革命论的修正解释意味着无法在民族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案：

“将无产阶级革命维持在民族框架内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尽管正如苏联的经验所示，这种状态可能是长期存在的。在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内部和外部矛盾必然会随着所取得的成功而增长。如果它保持孤立，无产阶级国家最终将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它的出路只在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sup>35</sup>

尽管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在性质上是正确的，但在数量上是错误的。俄国别无选择，只能超工业化；然而，斯大林正在以过快的速度和错误的方向扩张工业。同样，社会主义农业是不可避免的；但斯大林再次表现得理想主义，试图立即改造整个苏联农业，而不顾客观的物质限制。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并从斯大林的过度行为中解救出来，苏联目前正在采取的许多举措将确保向社会主义的迈进。然而，鉴于俄国的政治蜕变，错误是不可能纠正的。结果，托洛茨基看到这个国家无助地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矛盾和对立旋涡中：城乡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党和它自己的书记机构之间，甚至在机构本身内部。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他坚持认为苏联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国际舞台：

“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从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均衡，从它们相互的经济依赖，从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方面的差异，从当代生产力的动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结构只能通过一个经济螺旋体系来建立，只能通过将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部矛盾带到一整群国家中，只

能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服务，以及通过它们各自工业和文化不同分支的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只能在世界舞台上。”<sup>36</sup>

“农村俄国，”他在同一著作中补充道，“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sup>37</sup>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将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带到其最高发展阶段”。<sup>38</sup> 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没有看到对外贸易是最小化俄国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斯大林持续的孤立主义根源于他完全无法掌握不断变化的国际现象的意义；特别是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意义有着巨大的误解。

在 1920 年，托洛茨基将孤立主义和劳动动员与他对资本主义迅速崩溃的预测联系起来。斯大林现在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对稳定理论感到失望之后，1928 年之后，斯大林根据“第三时期”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未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被分为三个阶段：

(1) 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危机时期；(2) 逐步稳定时期；以及 (3) “世界经济矛盾快速发展”的最终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达到最大程度的尖锐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sup>39</sup>

托洛茨基对他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最终修正，他尖锐地谴责了斯大林的整个论点。在这次大萧条的国际性中，他看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国家经历复苏而另一个国家经历衰退的那种脱节发展已经结束的证据。经济团结在逆境中得到了恢复；资本主义困境的普遍性表明，世界经济终于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周期性增长模式。因此，衰退之后将会是复苏。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当前的危机具有世界性。这意味着在战争年代不复存在的世界经济，已经冲破了关税壁垒，并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表明，它是一个强大的现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下一次

走向复苏的经济状况变化也将……具有世界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已经恢复。”<sup>40</sup>

资本主义可能存活的事实表明，长期合作的条件仍然存在。西方新出现的市场问题为寻求外国信贷提供了理想环境。在一篇题为《世界失业与五年计划》的文章中，托洛茨基承认“系统和包罗万象的经济合作”只有在国际革命之后才可能与欧洲实现。然而，这场危机可能会扩大俄国获得世界储备的机会：“如果危机进一步发展，那些以数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政府（即社会民主主义）可能会被夹在这样的夹缝中，以至于他们将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向与苏联的经济合作让步。”<sup>41</sup> 在给俄国反对派残余的一封信中，他建议利用“失业日益增长的威胁，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来换取计划性订单的信贷，用于购买农业设备、机械等等，以换取集体化农业的产品”。<sup>42</sup> 当共产国际将这些想法定性为反革命时，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种“愚蠢的荒谬”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然结果。<sup>43</sup>

从对托洛茨基后期著作的简要考察可以看出，他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日益增长的理论不妥协，只起到了重申其融合主义的作用。然而，通过在斯大林的理论 and 《总结与前瞻》之间构建一个人工的二分法，托洛茨基认同了官方的苏联神话。通过试图定义他在历史中的位置，他留下了一个谜。对他后来的继承者和官方的苏联历史学家来说，这令人困惑。

近期的苏联历史著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减少这种困惑；它们未能超越既定正统的界限。<sup>44</sup>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用以下评论总结了当前苏联对托洛茨基-斯大林辩论的理解：

“在解决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时，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右翼机会主义者和  
其他反对派团体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们的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压力。反对派分子否认最初在我们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与农民联盟的稳定性，因此他们试图使党偏离其列宁主义路线。”<sup>45</sup>

在 1966 年 12 月，当被问及平反托洛茨基的可能性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先生宣称：

“我们的党，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谴责了它，现在也依然谴责它。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sup>46</sup> 这就是党对托洛茨基的判决。

托洛茨基自己对斯大林主义政党及其所作所为的最终评价，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给出。该书写于 1936 年，即斯米尔诺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叛国罪并处决前不久；于 1937 年出版，同年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在大清洗中丧生；并在 1938 年，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拉科夫斯基也面临同样结局时，广泛流传。其主题是革命已经蜕变为一个极权主义独裁政权，由一个看似是新阶级的官僚阶层所支持。托洛茨基推断，蜕变的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与强加于其上的先进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矛盾。官僚机构在贫困和匮乏的条件下充当最高仲裁者。通过控制商品的分配，它创建了一个基于计件工作和奖金的工人贵族阶层。

托洛茨基通常不会用定义来解释社会现象。但现在，是时候对苏联实验做出判断了。他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体系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曾写道，即使是共产主义的较低阶段也比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的水平。但这不能用来形容俄国。“更真实的，”他断定，“……是把当前的苏联政权，在其所有的矛盾中，命名为非社会主义政权，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预备政权。”<sup>47</sup> 为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托洛茨基付出了他的一生。